



践行和平 歌吟生命

——全球和平妇女十周年纪念文集

Pathing Peace, Celebrating Life

-- Commemorating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PeaceWomen Across the Globe

主 编：刘健芝

执行编辑：赵玲

美 编：靳培云



目 录

出版说明.....	赵玲	1
前言：和平妇女 耕耘希望.....	刘健芝	2
中国和平妇女活动大事记	赵玲	10
十周年系列活动		
百万和平妇女伙伴交流座谈会成功举行	赵玲	19
穿越沙漠，穿越时空	赵玲	21
钦佩和亲身见证“和平妇女”	欧阳丽娟	23
青年“爱故乡”行动系列活动		25
行动与思考		
扎根日常生活 行出和平力量	陈顺馨 陈惠芳 赵群 罗燕	27
在香港，我理解了和平的含义	高富强	33
致丽 20 年：不能被遗忘的伤残农民工	谭深	36
我们始终在以反思之名拒绝反思	戴锦华	40
从电影《星际穿越》看食物伦理和生态文明	刘健芝 田松 潘杰	49
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新范式	林子敏	57
2016 元旦纪事——中国石门坎	汪永晨 文图	67
丽水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庄启俭	79
花开朵朵 ——百万和平妇女故事选		
' 95 一路走来	张李玺	88
农家女探索有机农业之路	段锁兰	92
从黄河下游到黄河中游的乡村建设	何慧丽	96

合初人朱艺说“我们才是最现实的！”	刘家路 黄健彬	102
一名女硕士的返乡之路	彭月丽	108
传统手工艺继承人薛继芬老人访谈记	贾雪梅	114
我是一棵山树	尹海霞	117
致丽惨案四女工 奇妙恩典二十年	冼丽婷	124
生命当如夏花	王茜	130
1967年10月9日，一个不平凡的日子	郭兆英	139
把乡土文化引进课堂	王小平	146
给女儿的一封信：我希望你是女权主义者	段玉	160
给“情怀”找一片土壤	邢雯	164
倾听沉默的另一面		
——百万和平妇女故事及伙伴征集启事		166

出版说明

2015年是中国提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20周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成功举办20周年，也是“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活动的十周年。其实从2004年开始，香港、大陆和台湾的许多热心的专家、学者、作家、记者、公益工作者、志愿者等等，已经开始不计报酬地参与到整个活动的筹备和推进当中（详见本文集中的“中国和平妇女大事记”）。十余年来，我们不仅见证了成百上千名有血有肉的姐妹、伙伴以及她们所服务和支持群体的生命历程，更是与中国当代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妇女以及社会公益事业一同发展起来，经历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

在我们“和平妇女”这个大家庭里，一大批坚韧而有能力的基层妇女，她们在推动生态、生计、文化及城乡互动发展方面尤为积极，已然成为乡村建设的中坚力量。她们不仅肩负着祖母、母亲、妻子及女儿的家庭责任，也勇于担当起带领底层群体追求环境、社会公义，挑战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社区领袖的重担。这些为日常生活的和平、社区家庭的和谐默默奉献的女性，数十年如一日的扎根于乡土大地，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社会经验和人生智慧。同时，学者及志愿者们与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妇女们协同前行，参与到和平妇女的故事搜集、交流互访、行动研究中，先后出版了书籍《多彩的和平——108名妇女的故事》（2007，中央编译）、《扎根于生态、生计、文化的“和平妇女”行动研究》（2013，社科文献），在《读书》杂志、《新华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内部印刷了《日本核危机专题资料集》、各年度通讯，并制作了十余部纪录片。十余年来，我们不断地推动知识分子与基层妇女的互动及相互支持，致力于促成有力的社会行动与新的知识生产。近年来，我们还联合了更多伙伴机构及志愿团体发起了“百万和平妇女计划”，通过生命故事分享会、专题工作坊等活动，发动公众参与搜集、分享和书写自己与身边妇女们的生命故事。

这本十周年文集的组稿及编辑前后历时一年多，没有来得及在十周年纪念活动前后完成，似乎有些迟到，但其意义已远远超过对过去的纪念。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希望这本文集不仅能呈现“和平妇女”组织落地生根的历程，更能通过一个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为大家搭建一个与生命对话、对社会反思的平台。因为我们每一位妇女姐妹的生命都是如此鲜活，每一天所面对的自然及社会环境都是全新的。不管我们今天身处何方，我们职业、身份、年龄有何不同，“多彩的和平”仍然是我们共同追求和坚持的信念。让我们在不断地生命对话、行动反思与社会实践中开启新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赵玲

2016年9月

前言

和平妇女 耕耘希望

刘健芝

十年前，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的活动，不因没有获奖而结束。2005年12月，中国两岸三地几十位“和平妇女”聚首昆明，相识相知。我带着聚会的激动，走进2006年。

十年后的今天，如十年前一般，新世纪的动荡、苦难、暴力、疯狂并没有减缓；相反，五个世纪的殖民者的掠夺仍在以各种方式延续。尽管经历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金融资本霸权照样肆虐；每天美国资本市场里“交易”的资金达三万亿美元，95%以上与实体经济无关。然而，这不意味对资源的抢掠已近尾声。占全球人口4.5%的美国，单是石油每天耗用两千万桶，占全球用量近四分之一；对产油国的侵略与操控，是美国国策，尽管它以各种口实为其军事和经济霸权辩护。全球对能源的需求有增无减，面对气候变化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而“清洁能源”的加速开发，却又带来各种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作物能源抢夺了亚非拉穷人的土地和口粮，核电站像计时炸弹一样置于人烟稠密的城市边上。2011年福岛核灾难发生后，德国、意大利全民投票，决议2020年前取缔所有核电站，日本民众百分之七十反对核电，可是，在其他很多地方，似乎没有响起警号；时隔三年，日本政府对福岛核反应堆爆炸后遗留的废墟仍然束手无策的同时，土耳其率先购买日本东电公司的核技术，原因是土耳其是地震带，日本在地震带建核电厂的技术是最“适用”的。

当战争无日无之，中东难民危机难以化解的同时，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分化越演越烈，饥饿贫穷每年吞噬超过一千万人的生命。在人均国民产值上升的数字粉饰下，金钱至上、经济至上、物质至上、消费至上，象征了“文明人”的自由、身份和尊严。经济利益、经济考量高踞一切。

如果我们“理性”地放眼世界上强权肆虐的大逻辑，看到人类整体越来越深陷泥泞不能自拔，那么，似乎没有理由不悲观犬儒、沮丧沉溺。然而，希望却顽强地陪伴着苦难中的人们，孕育着生之勇气。于是，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中，往往开辟出现在新的可能性，出其不意地超越“理性”的逻辑。

我们的妇女怀着希望

2005年12月昆明和平妇女聚会引发的激动，正是“理性”的逻辑所不能解释也不能理喻的。

昆明聚会在众多与会者噙着泪水相互拥抱中闭幕。那说不出的感动，和静静伴着这感动的希望，带着我走进2006年。马素密 Brian Massumi（德勒兹 Deleuze 和加塔利 Guattari 著作的英译者）说得很好：希望与悲观乐观无关，希望深植于当下，让我们重新相信世界。聆听和平妇女的故事，与她们相处，尽管只是几天，但已让我深深体会到：希望不在于未来，而在于现在，在于当下正发生的人与事之中。来自香港协助组织昆明聚会的志愿者，兴奋地对我说，“和平妇女”真人比照片更美！是的，她们很美，我说。



美在哪儿？我想，是她们焕发着一种神采，不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大时代英雄那种壮烈崇高，而是让人感到亲切触动的、过人的坚忍执着，刻苦但不苦涩，在现实那往往让人以为昏天黑地、前无去路的时候，却充满创意，就地取材，另辟蹊径。这些和平妇女的故事有一个“欠缺”：她们欠缺了对社会主流名利权势逻辑的拥抱。

昆明聚会上，与会者相互感动的，是自己那平凡的生活实践出来的人生哲理，竟遇到那么多共鸣。境遇不同，哲理却如此相近；要表达的话，也只能找到最为普通的、毫不惊人的语词——相信善良，实践仁爱。

仁、爱这两个字，置于和平妇女生活中的实践，是以血以泪来呵护着的。今年十周年的聚会，在北京，在内蒙古，在宁夏，又再次见到她们的微笑，尽管长年累月挑的担子千斤重：



王选：与日本律师和东亚慰安妇控诉日本政府的战争罪行，成立了三个民间组织，推动中日战争受害者自发办展览馆、出版文章、书籍；带大学生做浙江烂脚病的田野调查，形成村民口述历史，再现战争对普通老百姓的影响。



郭新志：著名脑瘫医师，不仅治疗残疾人疾病，还推动政策改变，为残疾人高考创造条件，参与妇女儿童保护工作，举办母亲文化节，提倡家庭教育。



董秀玉：关注农村儿童辅助性的人文通识教育，推动贫困学校的文体音教育，培养青年教师。



谢丽华：农家女发起者，关注三留人员：妇女、儿童、老人。成立农家女书社，进行妇女培训，成立妇女自组织，培训创业妇女；做社会企业，让创业妇女在其中学习；成立两家社区养老院，希望在农村成立养老院进行试点。



尚秀云：北京海淀区的法官妈妈，从事未成年人法制教育工作，撰写了《法官妈妈给父母的 90 个建议》等书。



张淑琴：从事服刑人员子女帮扶工作，已建立九个太阳村，推动政府对服刑人员子女的保护及儿童福利制度建立；准备成立太阳村公募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和社会企业，已经开展农场、二手超市及影视作品的拍摄。



徐纪英：长期从事茶树花研究，推广农村培训，将茶树花的技术转交给茶农，提高技术和产值，以增加农民收入。



马新兰：创办了宁夏同心县韦州镇回民女子学校，让女童复学率达到 98%，任教 37 年后退休，之后继续在当地为没有文化的妇女扫盲，总共 2000 户，年纪最大的 70 岁。



杨海澜：1996 年承包一片沙漠，经历了三次死而复生，现在以生态、科技、农业为基地，打造了宁夏集科技生态园、体育运动休闲、教育体验的亲子乐园。



殷玉珍：嫁到内蒙古几十里内无人家的大沙漠里，靠两口子经年劳动，治沙造林 6 万亩。



田桂荣：曾任河南新乡的村妇女主任和女村官，推动环保村庄，拍摄农村妇女保卫黄河的纪录片，参加各种环境会议。

赵玲：十年前的大学生支农志愿者到今天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中国和平妇女办公室主任，负责联系和平妇女和志愿者，推动城市消费者支持和学习乡村妇女的传统手工艺、健康饮食文化等，促进社会对和平妇女的认可和尊重。



谭深：2005 年前关注农民工及妇女议题，建立流动的合法性，2005 年后关注留守/流动儿童、进城务工人员的城市接纳，及农村凋敝等问题，也整理知青简史。

张华：放弃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接任她所在延安山村唯一的小学老师，一干就是十多年。村上的学校撤了之后，送走最后一位学生，再进修大学文凭，现在镇里当幼儿园老师。



这些女性，在各种现实的限制中以智力毅力和韧力打造生机。她们不以“成功”“失败”来衡量自己的努力；或是挫折重重，或是柳暗花明，前路并无蓝图标志，但无限创意在发挥。

孕育和平的土壤

我们珍惜相互间的信任和尊重，不是出于抽象的女性特质或姐妹情谊；我们呵护的善良仁爱也不是什么普世的、浪漫的价值。它是在相互关系中形成的生活实践态度，让心灵相通并从中得到养分滋润。我们在苦难困境中挣扎着、坚毅地寻找着出路的当中，感悟到如置身汪洋大海般渺小，事态十之八九非我们所能掌握，但每每渡过难关之时，我们又如沐浴在恩典中，因为当中依靠多少因缘巧合，多少善心的扶持相助。尽管在众多走出当前困境的实践中，因人因地因环境的不同而走出了不同的合作群体，孕育了不同的尝试，但众多不同的轨迹在相遇时却能闪耀着心灵相通的喜悦和鼓舞。在拥抱中，大家在拥抱着体悟渺小的智慧及从中生出的毅力。我们在拥抱中感受到让我们心灵相通的仁爱之心，是缘于对我们

的渺小的体悟，它让我们懂得尊重生命及让生命成为可能的条件，它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因渺小生成的恐惧，它让我们懂得通过互相依靠和信任去安抚恐惧，避免让自己陷于恐惧的泥淖中，不能自己地要以排斥、控制、征服的手段去求安稳。

从文化角度来看，今天的全球化可说是美式生活的全球化，即身体是为了消费存在，美其名是现代文明的成果，高科技为我们带来了舒适的生活、健康的保障、长寿及层出不穷的新经验；但和平妇女通过各自的努力和实践，对这样的全球化说不。她们用她们的身体，跟大地——地球的身体、大自然——缔结了不一样的关系，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泛起了越来越广的涟漪，缔造着不一样的全球化，缔造着对人的尊重、对大地的尊重，成就了不回报、只因感动而施与的心灵相通。这样的心灵相通为大家带来了新力量新启发，开创出之前不能、不敢想象的可能性，让当下的困境、苦难的经历不致凝固为怨愤的历史包袱，而是转化为创造历史的希望的土壤。

是的，我们从人生的挣扎、经历的苦乐、执着的实干中，在活生生的个人和社群的历史中，在无法理性地、有先见地、有计划步骤地筹划未来的不确定中，就在每日由偶然因素碰撞出的我们立足的错综纠缠的现实中，因为我们有行动的能力，这些行动有牵引、碰撞、激发其他行动的可能性。于是，我们不断培植着希望由之产生的土壤。微弱的星火似瑟缩着，燎原时刻这星火也许已无迹可寻；但星火坚持存在，是要给自己、给自己的族群一点光和热。这一丁点儿的光和热，燃着希望。犹记得，十年前，昆明会议后，来自香港一行 7 人，到金沙江畔探望 80 高龄的白族和平妇女王品松。金沙江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民风纯朴；如果虎跳峡建起水库，将淹没十万村民万亩良田的家园。开发商要他们开出条件，当地村民的回答是：我们的土地是无价宝，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没有条件。王品松的长孙萧亮中，学有所成在北京做人类学研究，不忘乡亲的哺育，奔波反对建水库，2005 年 1 月 5 日 32 岁英年猝逝。我们在亮中坟前放上鲜花，在火塘边无言地伴着品松奶奶。渡江离去之处，村民竖立的“金沙江之子”纪念碑，守护着静静的金沙江，守护着纯朴的人民。当地妇女晚上排练歌舞，朗读的诗句萦绕在耳：“这里的土地 / 养育了这样的一个您 / 这里留下了 / 永远说不完的故事 / 太多的人 / 习惯了把欢乐和愁伤 / 种进了 / 肥沃的泥土”。

十周年纪念

“全球千名妇女争评 2005 年诺贝尔和平奖”联会，在 2006 年改名为“全球和平妇女联会”（PeaceWomen Across the Globe），继续推进活动。和平妇女活动，成功引起全球社会极大关注，取得了不少奖项，包括著名的西班牙“格尔尼

卡”（Guernica）和平奖。毕加索名画“格尔尼卡”悲愤地描绘 1937 年 4 月纳粹军屠杀格尔尼卡小镇的情景，今天的“格尔尼卡”成为欧洲不忘战争灾难、力求和解和平的象征。

在过去十年，“全球和平妇女联会”推进各种活动，把 2200 页的《全球千名和平妇女》一书译为多种语言，并在全球做了超过千次“千名和平妇女”图片展，包括 2006 年 2 月纽约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大会开幕礼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夫人及多国政要出席的展览。为了促进和平妇女间的交流分享、进行学术研究和推广工作，联会选取了两大主题：1. 战争冲突的缓解；2. 生态与生计的关联。

第一主题针对显性暴力。响应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行



动计划，推动妇女积极参与战争和冲突的谈判和缓解，在十周年之际，全球各大洲在 10 月中旬同时进行十一场“和平圆桌”；在尼加拉瓜、巴西、马里、肯尼亚、苏丹、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泰国、印尼，冲突各方代表坐下来，面对面增加谅解，探寻和平出路；“和平圆桌”举行前后，是漫长痛苦的梳理错综复杂关系的过程，尽管艰难，“和平圆桌”还是要进行下去。全球和平妇女联会推进各地的谈判和解进程，以后每年都会在十月举行几十场的“和平圆桌”。

第二主题针对隐性暴力。生态与生计问题在资本主义进入金融资本肆虐的时代，变得更为严峻。从福岛核电厂灾难污染土壤水源，到气候变化带来旱灾水灾作物失收和大量物种消失，底层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解决办法也不能限于本地的努力，而是要有各方以至跨国的努力。中国和平妇女办公室在过去十年，负责

带动生态与生计这个主题的活动，除了促进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有机耕种妇女社区的交流学习外，也安排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欧洲的和平妇女代表到中国访问交流，中国和平妇女代表团也参加了在墨西哥举行的首届世界女农民大会，西班牙举行的蓝色经济大会，等等。

2015年10月23日，“全球和平妇女联会”在瑞士首都伯恩一个古堡晚宴上，宣布正式启动“从千名到百万和平妇女”全球计划，推动全球各地以各种语言书写百万和平妇女的故事。十年前，被提名争评诺贝尔和平奖的千名妇女里面有一位“无名氏”，她，代表了千千万万默默无闻缔造和平的妇女，她们不应无名无闻，她们平凡人生里的不平凡贡献，应为世人所知，并成为我们日常生活里的榜样。她们，就在我们身边。“维基和平妇女”网站为此启动，以多种语言（英文、中文、俄文、法文、西文、葡文、阿文、日文、韩文等），记录妇女的事迹，让和平妇女的努力得到全球各地社会大众的认同，激起更多建设和平实践的涟漪，耕耘着希望。

（此文发表于《新华月报》2015年12月号第23期）



中国和平妇女活动大事记

整理：赵玲

2003年，“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联会在瑞士成立，邀请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刘健芝教授参加国际委员会，并担任中国和蒙古地区统筹。

2004年2—5月，岭南大学群芳文化研究与发展部“妇女与日常生活”研究专题，负责中国和蒙古的统筹工作。陈顺馨教授为负责人，组成中国工作团队，筹组评审顾问团。在岭南大学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项目的提名细则及表格。

2004年8—10月，经过各地评审顾问会议，审定大陆、港澳台及蒙古地区推荐提名名单。刘健芝出席“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第三次国际委员会会议，审定全球千人提名名单。



2004年11月—2005年4月，在香港及北京分别举行各类工作坊、组织者工作会议，妇女与和平交流会。获得岭南大学研究经费，进行“从日常生活再思妇女与和平——以‘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香港被提名者为案例”研究。



2005年3—7月，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收集及编辑108位和平妇女资料并翻译成英文，用以制作明信片、《全球千名和平妇女》(1000 PeaceWomen Across the Globe)书籍及网络发布等。

2005年6月，在岭南大学举行“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地区提名发布会，公布中国108人名单。超过四十个国家同步公布全球千人名单。组织志愿者开展各地访问及书写工作，筹备出版中国108位和平妇女的故事。



2005 年 8 月，与“三联书店”及《读书》杂志合办大陆地区被提名妇女交流会，21 位和平妇女参会，由央视《半边天》节目主持人张越主持会议，温铁军、戴锦华等多位评审顾问及志愿者出席。



奖结果的公布作出回应，并对如何继续推动和平运动进行交流。

2005 年 11 月，岭南大学举行《全球千名和平妇女》(1000 PeaceWomen Across the Globe)新书发布会及全球千名妇女图片展览。

千種推動和平文化教育的方式
A Thousand Ways to Educate a Global Culture of Peace

建設公義的環境和安全的生態
Women's Effort on Behalf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為生存而戰：少數民族與原住民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Minoritie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正義與和平
Justice and Peace

停止針對婦女的隱性暴力：婦女、健康與和平
Stopping the Hidden War Against Women: Women, Health and Peace

和解與重建
Reconcili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政治與管治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經濟權益與生計
Economic Rights and Livelihood

和平的文化理念
A Cultural Conception of Peace

婦女權益 - 通往性別民主的人權道路
Women's Rights - Human Rights on the Way to Gender Democracy

全球千名和平婦女圖片展

1000 PeaceWomen Across the Globe Photo Exhibition

主辦 Organizer :

嶺南大學群芳文化研究及發展部
Kwan Fong 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Lingnan University.

日期 Date : 2006年2月12日-3月11日

時間 Time : 11am - 8pm

地點 Venue : 集成畫廊 A-LINK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02-308號集成中心高層商場
Upper Ground Floor, C C Wu Building, 302-308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2005 年 10 月，《读书》

10 月号刊登戴锦华、刘健芝及陈顺馨的一组有关妇女与和平的文章。10 月 7 日在岭南大学举办“不会终于颁奖的和平运动——‘全球千名妇女争评 2005 年诺贝尔和平奖’座谈会”，就当日和平

2005 年 12 月，在昆明举行中国及蒙古“妇女、生活与文化”交流大会，有 46 位和平妇女、多位专家学者、记者及高校志愿者参加。瑞士联会理事文哲博士（Dr. Menz）出席。

2006 年 1 月，“全球千名妇女争评 2005 年诺贝尔和平奖”联会改名为“全球和平妇女”联会，刘健芝获邀为理事。岭南大学群芳文化研究与发展部“妇女与日常生活”研究专题，负责东亚的统筹工作。

2006 年 5 月，《读书》5 月号刊登戴锦华、刘健芝、陈顺馨、钟秀梅的一组有关妇女与和平的文章。

2006 年 6 月，开始制作纪录片《让世界看见》和《不可能之可能:和平、妇女、诺贝尔奖》，分别记录中国大陆及香港的和平妇女提名过程及故事。

2006 年 7 月，组织者、志愿者、和平妇女之间开展多项互助、互动的活动，包括募捐资助延安乡村教师张华完成大学课程，为宁夏海原县马志英女生之家的女学生募捐，技术支持银川杨海澜的生态建筑项目等。

2006 年 8 月，全球和平妇女中国大陆办事处设在河北定州翟城村“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内，与乡村建设工作相互配合。

2006 年 9 月，全球和平妇女联会及中国办事处在世界和平日宣布展开“101 伙伴计划”（Partnership Project），邀请社会上的个人和团体参与记录百名妇女的故事，让更多妇女事迹显影。

2007 年 2 月，香港和平妇女举行新春团拜，观看和讨论《不可能之可能:和平、妇女、诺贝尔奖》和《让世界看见》两套纪录片以及交流未来活动。

2007 年 5 月，岭南大学群芳文化研究与发展部“妇女与日常生活”研究专题举办研讨会：“Peace, Women and the Everyday: Across Borders, Beyond War and For Change”，正式公开首播两套纪录片，并发布《多彩的和平:108 名妇女的故事》一书。

2007 年 6 月，召集志愿者商议“101 伙伴计划”的具体工作，发动每个志愿者在身边或社区寻找百名和平妇女并记录她们的故事，并将故事上载网站发布。志愿者和相关团体陆续开始搜集和书写“百名农家女”、“百名母亲”、“百名教师”等故事。

2008 年，组织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十二名和平妇女及学者、志愿者，在银川海澜生态园举行“生态、生计、文化与可持续和平”行动研究工作坊。此项行动研究持续到 2011 年，目的是整合三地基层妇女的知识和经验，确立新的知

识系统；重新诠释和平的理念和意义；从妇女的行动中建立一套既可持续生态资源，又可维持生计的生活模式。

2009年2—5月，探访北京、河南、安徽、四川、重庆、陕西、山西的19位从事乡村及基层工作的和平妇女；参观新乡村建设的典范南马庄、阜阳南唐村农民合作社，拜访西安进步青年中心、山西农大“农民之子”社团等组织，推动各区域和平妇女与民间组织建立联系。

2009年6月，台湾成功大学举办“反转思维——重新连接生态与经济的另类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全球和平妇女秘书长马恩（Maren Haartje）、西班牙和平妇女麦切（Mercedes Garcia）、刘健芝，戴锦华、赵玲等参会。会后，多位中外学者到北京、河南、宁夏、内蒙、陕西，先后与22名和平妇女及各地志愿者交流。

2009年8月，全球和平妇女总部理事文哲（Christine Menz），瑞士历史学者林恩（Lynn Blattmann），刘健芝、戴锦华及多位和平妇女到山西太原、平遥、大宁、陕西西安、湖北襄樊、北京等地探访交流，先后近二十名和平妇女及志愿者参与。



2009年12月，全球和平妇女中国办事处正式挂靠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原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2010年6月，岭南大学举办“我行，我歌，我创造——中国妇女书写和平”活动：包括“和平妇女展览揭幕仪式暨中国妇女书写和平影片首映和公开论坛”，程炜、运建立、汪永晨、张淑琴、徐纪英5位和平妇女以“中国环境保护行动的策略与成就”及“与中国弱势群体共事的策略与成就”为主题作公众对话，举行“和平妇女茶话会——中国饮食健康文化”的讲座，寇延丁导演介绍纪录片《程炜：通往大山的路》、《殷玉珍：沙漠里的绿色梦》拍摄初衷。

2010年10月，志愿者到安徽阜南县王老村，与王殿敏的老人协会成员联欢共度重阳节，开展农村妇女手工艺项目调研访谈。争取到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的小额资助，支持王殿敏带领乡村妇女外出参观和学习，及志愿者们到村庄开展故事搜集和支农活动。

2010年11月，生态、生计领域的和平妇女程炜、田桂荣、王殿敏、王树霞、王华连，及两位蒙古和平妇女——蒙古妇女农民协会主席 Byatshandra Jargal，蒙古信息教育及交流中心（IEC）理事长 Odonchimeg Puntsag，参加了人民大学的“农民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全国社区支持农业（CSA）经验交流会”。几位和平妇女还应邀参加了“第三届百位全国女村官论坛”。

2011年7月，在人民大学举行了“和平在哪儿——生态与生计座谈会”。刘健芝、中国社科院孙歌、温铁军分别主讲有关欧洲生态运动、日本核灾难、中国农业生态等问题。在京的和平妇女齐心、谢丽华、汪永晨、张淑琴、董秀玉、及百万和平妇女李秋荣到会分享。



2011年10月，田桂荣，段锁兰、戴北春到京参加了“新农夫新城乡——第三届全国社区支持农业（CSA）经验交流会暨新农村建设产学研基地2011年成果汇报会”。陈顺馨、陈惠芳在小毛驴农场播放段锁兰探索有机农业的纪录片《果树下的草场——山西汾阳栗家庄生态故事》和香港和平妇女探讨食物与社区关系的纪录片《厨房有社区，社区有厨房》。

2011年12月，第一届可持续实践南南论坛的专家到河南，与开封市长助理何慧丽，和平妇女田桂荣等有机生产者、消费者一起探讨国内外食品安全。在岭南大学的第一届南南论坛“阶级、性别与社会生态”分论坛上，陈顺馨主讲了中港台和平妇女生态与生计实践。



2012年4月，邀请王殿敏等手工艺代表到对外经贸大学惠禾三农协会、中华女子学院农妇会开展“和平妇女高校行”活动，并到梁漱溟中心、小毛驴市民农园、农家女办公室、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天下溪自然学园、绿之盟

生活馆等交流；协助沈阳从事居委会工作的和平妇女，“小巷总理”李军到北京农学院、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交流和演讲社区工作的经验和方法；初步建立城乡妇女相互支持的网络。

2012年7月，在人民大学组织了日本核危机与生态、生计研讨会。上海和平妇女王选、刘健芝、孙歌、清华大学汪晖、北师大田松、日本批判知识分子羽根次郎、亚洲学者交流中心黄德兴分别做了主题发言，播放了纪录片《核电站事故以后的有机农家之声——依然要播种》。在京和平妇女李小溪、汪永晨及相关NGO、大学生、中学生志愿者到会参加讨论。



2012年12月，在西南大学举办第二届南南论坛——“乡村建设与可持续实践国际研讨会”，邀请了运建立、程炜、田桂荣、王殿敏、王树霞、郑冰、杨海澜、王华连、刘忠训、陈玉英，印度和平妇女团体自雇妇女协会(Self-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秘书长Rehana Riyawala参加，并做主题发言。

2013年3—6月，赵玲分别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与社工专业学生分享和平妇女的理念及案例，鼓励青年人参与妇女社会工作。邀请王殿敏、安徽返乡青年刘全



影及擅长手工艺的韩兰英到北京开展交流活动：在北师大农民之子社团、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社工系、一元公社分享生命故事，到华德福幼儿园、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等做手工布艺和健康饮食工作坊，并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公益新榜样》栏目录音。许多城市的父母和孩子、大学生、《中国妇女报》等媒体朋友被她们的故事深深感动，并对传统手艺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2013年12月，出版《扎根于生态、生计、文化的“和平妇女”行动研究》（2013，社科文献），并于成都召开新书发布会，包括半天的专题研讨会和一天的分享与示范活动。该书的四名作者和参与行动研究的几位和平妇女到成都参加了活动。



2014年3—5月，参与到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基地建设，探访重庆合川人自然农园、忠县残疾人自强服务站、国仁打平伙社区食堂，协办了重庆首届乡村生态市集。以生态市集为平台，推动了在地生态农夫、新农人交流农业生产技术，促使生产者、消费者代表及相关支持

机构座谈，总结市集经验和探讨未来的合作。

2014年6月，邀请郭新志，齐心，李小溪，程炜等和平妇女，刘健芝、温铁军、戴锦华、孙歌以及相关志愿者到北大交流座谈。针对中国当前严峻的生态环境及社会问题，和平妇女们分享了十年来在生态、文化及社会发展领域的实践经验，大家一起探讨如何保护我们共有共享的资源，形成可持续的社群文化。交流会上正式向大家提出了“百万和平妇女计划”。

2014年9月—2015年3月，向全国的和平妇女、相关志愿团体推广“百万和平妇女计划”，探索与各团体的工作结合（如爱故乡人物中的妇女故事、合作社案例中的妇女、返乡青年及乡建人才计划中的杰出女性等），将已有的案例及故事推荐和整理出来。

2015年3—11月，联合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中国爱故乡文化发展促进会（筹），共同发起“青年‘爱故乡’行动系列活动之分享生命故事，对话我们的时代！”活动，举办各种生命故事分享会、专题工作坊，推动公众参与搜集、分享和书写自己与身边妇女们的生命故事。



2015年5月，赵玲拜访江苏常州姬山书院，参加无锡春晖青年公益发展论坛，探访昆山“青澄计划”、上海和平妇女王选、华东师大乡土建设学社、山西太原母亲文化研究会、山西农大“农民之子”等，与各伙伴机构分享生命故事和实践经验，最后在西南大学邀请了合初人朱艺共同以“与妇女乡土同行，让生命有力扎根”为题与大学生们交流分享，鼓励大家参与百万和平妇女故事搜集。

2015年6—8月，在北京小毛驴农园、内蒙乌审旗玉珍沙漠生态园，宁夏银川海澜金沙生态园分别召开“全球和平妇女十周纪念活动——百万和平妇女伙伴交流座谈会”。北京座谈会上，来自上海、山西、北京的八位和平妇女分享了十年来为和平作出的不懈努力，刘健芝、温铁军、孙歌、戴锦华，《1000小时的电影：生的故事》纪录片导演简艺，“爱故乡”公益活动黄志友，小毛驴“乡土学园”严晓辉，上海高校的宾慧中和闫爱宾老师分别发言分享。从内蒙到宁夏的和平妇女探访和交流，穿越毛乌素沙漠到腾格里沙漠，见证了西北地区的“百万和平妇女”在艰苦条件下的辛勤耕耘，数十位当地妇女和伙伴的故事以及在生态农耕、教育、医疗等各方面的工作成绩让人们感动不已。



2015年9—10月，正式发布百万和平妇女的故事系列在以下网络平台：

全球和平妇女中国网站 <http://1000peacewomen-cn.org/>

维基和平妇女网站 <http://www.wikipeacewomen.org/>

微信公众号：和平妇女 peacewom

十周年系列活动

百万和平妇女伙伴交流座谈会成功举行

赵玲

为了纪念“全球千名妇女争评 2005 年诺贝尔和平奖”暨“全球和平妇女联合会”成立十周年，让更多妇女及伙伴们的实践经验交流和共享，2015 年 6 月 13 日在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召开了“百万和平妇女伙伴交流座谈会”。

当天上午围绕“回顾和前瞻”的主题，首先由全球和平妇女瑞士总部理事兼东亚区主任委员刘健芝介绍了“全球千名妇女争评 2005 年诺贝尔和平奖”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发展历程。接着，来自上海的王选分享了二十年为日本细菌战受害者开展民间诉讼，带动受害者整理口述史，建起民间展览馆等工作，近年来还带大学生做细菌战遗留烂脚病的调查，并发动民间医疗救助。山西省残联及母亲文化协会的郭新志介绍了通过调研和政协提案推动政策改变，为残疾人高考创造条件，呼吁大病救助、流浪乞讨儿童救助，以及提升母亲素质、倡导家庭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北京的董秀玉介绍了退休后开展乡村儿童辅助教育、大学人文通识教育的经验和反思。谭深介绍了自己从农民工、妇女问题的研究到留守和流动儿童问题、进城务工人员的城市接纳问题及农村凋敝的问题的研究，近年来还从事知青调查，整理知青简史。“农家女”机构创始人谢丽华谈到了“农家女”在关注三留人员——妇女、儿童、老人方面的工作，从成立农家女书社，进行妇女培训，成立妇女自组织到推动进行流动家庭妇女微创业，创办社区养老院等。从事了近三十年茶树花研究的徐纪英介绍了 2005 年加入和平妇女以来的收获，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并在乡村推广培训，将茶树花的技术转交给茶农，发展出许多“茶树花和平妇女”的宝贵经验。致力于服刑人员子女帮扶工作的“太阳村”发起人张淑琴谈到当前推动政府对服刑人员子女的保护及儿童福利制度建立，准备成立太阳村公募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和社会企业几方面的工作。七位和平妇女发言结束，《1000 小时的电影：生的故事》纪录片发起人简艺导演介绍了项目的初衷和意义。最后由和平妇女顾问、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做总结和点评。

中午的生态午宴之后，大家参观了小毛驴市民农园。下午，和平妇女中国办公室的赵玲和陈晨介绍了“百万和平妇女计划”，和平妇女合作伙伴“爱故乡”的黄志友、小毛驴“乡土学园”的严晓辉分享了各自的情况，和平妇女顾问、社科院孙歌老师介绍了日本核危机及相关生态与发展问题，来自上海高校的宾慧中

和闫爱宾老师介绍了古村落保护及生态建筑领域的工作，最后由和平妇女顾问、北大戴锦华老师进行了总结和点评。

此外，还有北京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一元公社等相关公益组织、教育、艺术机构的伙伴和志愿者们参加了此次会议。当晚，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和平妇女“法官妈妈”尚秀云和北师大的田松老师还参加了晚宴交流。尚秀云法官介绍了多年来从事未成年人法制教育的工作经验和心得，并向和平妇女办公室赠送了自己撰写的《法官妈妈给父母的 90 个建议》等书。大家都为和平妇女们克服种种困难，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精神所感动，在伙伴们的真诚分享和交流中获得了继续前行的力量。



穿越沙漠，穿越时空

——全球和平妇女十周纪念活动之内蒙宁夏交流会手记

赵玲

为了纪念“全球和平妇女联会”成立十周年，搭建城乡互助平台，我们于2015年8月20—25日经陕西榆林前往内蒙古毛乌素沙漠腹地的鄂尔多斯乌审旗玉珍沙漠生态园，宁夏银川永宁县海澜金沙生态观光园、吴忠市同心县韦州镇举行了百万和平妇女伙伴交流互访活动。全球和平妇女瑞士总部理事兼东亚区主任委员刘健芝、中国办公室总干事赵玲、河南新乡环保志愿者协会和平妇女田桂荣、陕西延安和平妇女张华、江苏常州姬山书院百万和平妇女褚粉霞、唐青云，岭南大学欧阳丽娟、苏婉媚、苏婉筠等全程参与了此次活动。



8月21日，我们与乌审旗妇联、萨拉乌苏村妇代会主任兼农副产品长丰合作社负责人周子艳、旭日明英民间艺术团负责人王秀英，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通道街回族小学马红霞校长，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志愿者口皓等一同参观了和平妇女殷玉珍的劳模事迹展厅，观看了三十年治沙历程的纪录片，并举行了经验交流座谈会。在真诚的生命故事分享中，大家相互感染着鼓励着，对年轻志愿者思想触动很大。22日，乌审旗老年体协慰问团给我们带来了具有内蒙、陕北地方特色的精彩演出。我们还了解了生态园7万亩治沙规划蓝图，走访了种养殖区及景观区，进行了采摘、滑沙、篝火晚会和志愿者交流等活动。

8月23日，我们与殷玉珍及家人依依惜别后开启了宁夏之旅。当天下午，与宁夏的三位和平妇女杨海澜、李继跃、马新兰，以及百万和平妇女杨翠霞、王冬梅等三十人交流座谈。几位从事乡村妇女儿童教育事业的伙伴分享尤其让人感动，特别是马新兰老师及另外三位来自韦州镇的穆斯林妇女，更让我们了解到回族女性的精神力量。25日上午，我们拜访了吴忠前锋清真大寺女学正在讲课的金梅花阿訇，看到了不分老少甚至带着孩子来学习的回族女性们。下午，我们的车在同心县到韦州镇的山路上颠簸绕行了几个小时——正是马新兰求学时步行两天的同一道路，真实感受到求知的艰辛。韦州虽小，却是丝绸之路上的一盏明灯，有400年阿拉伯语教育和100年女子经学教育的历史。我们参观了民族幼儿园、女子讲经堂、东阳职业技能学校及妇女儿童中心。

此外，24日我们交流团还前往了中卫市的沙坡头景区，见证了黄河“几”字大拐弯两岸从沙漠到绿洲的奇迹，发现我们正是从中国第五大沙漠——毛乌素沙漠，穿越到了第四大的腾格里沙漠。唐代诗人王维在此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名句。陕西、内蒙、宁夏——这一路走过的，既有汉唐边塞，也有丝绸之路，曾是烽火弥漫的沙场，也是农耕与游牧文化交融的地方。而中国回族的起源也是在隋唐时期，亚洲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商人通过海上“香料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来华交往形成的。几千年来，沙漠绿洲，繁华落寞，多少英雄豪杰、儿女情长……三十年前殷玉珍从靖边嫁到沙窝，还有杨海澜、马新兰以及众多百万和平妇女们，正是用自己的青春与执着换来了沙漠与人心的绿洲与和平。



钦佩和亲身见证 “和平妇女”

欧阳丽娟

从香港到蒙古，再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我们四人组成的香港团队参加了二零一五年全球和平妇女联会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出发前，我们在飞机上怀着忐忑的心情去重温了《多彩的和平——108名妇女的故事》里有关这次活动的主角和平妇女们，并热切期待着与她们见面交流。

八月二十日，我们从广州抵达陕西榆林，前往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河南乡无定河镇的“殷玉珍沙漠生态园”，并得到治沙英雄——殷玉珍女士的热烈欢迎。

在与其他团队成员集合后，我们一行二十多人便浩浩荡荡踏上征途。车上聊天时，豪迈的殷大姐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她现在是人大代表。有一天，她发现身边的小学老师的月薪只有二千元人民币，根本不足以过活，于是她在人大会议中提议国家提高老师月薪至三千元，最后获得通过。”

殷玉珍是中国治沙的女性第一人。在艰巨的条件下，她凭一己之力，动员家人在茫茫的黄沙海中默默种树，慢慢让沙漠变成绿洲。这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流过无数汗水与泪水，以无比的坚忍造就出今天七万亩治沙的面貌。

可是她对于自己的成就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没有伟大的鸿图大计，只是发现到身边人的需要而去帮助，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令我想起甘地的一句名言：“要改变，就要从我们自己身体力行。”

她治沙的原因，是因为回娘家的路上太阳太过猛烈，沿路连一棵遮荫的树都没有。“所以我决定种树来遮挡阳光。”她的初衷其实很单纯，只是从心底里想改善自己与身边人的生活；结果在不经意间由在路上种树遮荫，变成了内蒙古治沙的女英雄。我们在她的农场居住了几天，与世界各地来的朋友一同庆祝“和平妇女十周年”纪念活动，我们深切感受到她的个人魅力，并在会上广结善缘，互相交流。

在我们逗留的最后一天，在落日的余晖下，殷大姐在塔上自由豪放地高歌一曲，我们都为她感到骄傲。

数天的相聚后，我们离开七万亩治沙区。在沿着公路的农地上，麦子向我们摇手；桃子在风中点头；羊群声声说再会；牛群劝说多停留；黄沙细语话别离。

这一切的美丽令人难以忘怀，我们只好在依依不舍下匆匆前往宁夏去探望另一位和平妇女朋友。

她是在宁夏银川永宁县“海澜金沙生态观光园”工作的杨海澜女士。杨女士最初是在当地沙漠中一块占地 520 亩的小小绿洲——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胜利乡里种植葡萄并酿制葡萄酒，取名“海澜金沙”。那里本来盛产葡萄，但受到当地气候的极端变化影响，本来的事业受到重创。庆幸经过艰难转型后，她现在主力种植有机山药，而且成果不俗。杨女士的外表娇小玲珑，说话斯文温柔，然而骨子里的傲霜毅力，不可言喻。在她温文尔雅的外表之下，藏着不畏困难、不屈不挠的精神。而她不仅是一位能成功从事业危机中走出来的职业妇女，她对婆婆的孝顺照顾，更是令我深深体会到现代女性不单需要在工作上全力以赴，更要在家庭中坚守着自己作为一个母亲、妻子、媳妇的岗位，做到全方位的全力以赴！当然，杨女士亦因为得到丈夫在背后的无限支持，才可得到今天的成就——在沙漠里长出一个五彩斑斓的梦。

八月二十五日，团队继续前行到访银川吴忠市的前锋清真大寺，并在那里探望第三位和平妇女——第一位伊斯兰教的“女阿訇”金梅花。在她的课堂里可以看到大批不分老少、甚至带着孩子来学习的回族女性。只见金阿訇戴着橘色的头巾，挺着高大的身材向我们介绍她的学生，她在儿子买给她的房子里腾出空间，利用上午的时间教授回族妇女读书。透过诵读回教经文，让女子读书识字。她坚持以一己之力勉力为族中妇女“扫盲”，甚至一边照顾孙子一边讲课，目的就是希望让回族妇女把握更多知识从而改变命运的机会。究竟是哪一种力量令金阿訇拥有这份伟大的坚持和高尚的情操，在推动着这一个五十多岁的祖母继续孜孜不倦前行？

当天下午我们经过一大片荒漠草原，来到韦州同心县参观了民族幼儿园和女子讲经堂。最使我们感动的就是参观了马新兰女士推荐的“百万和平妇女”——杨翠霞女士兴办的东阳职业技能学校及妇女儿童中心，希望在回族父权社会下，能让妇女学到职业技能，建立自己的女性尊严。

殷玉珍、杨海澜、金梅花等杰出的“和平妇女”的事迹都写在《多彩的和平——108 名妇女的故事》中，杨翠霞的故事也发表在“百万和平妇女维基网站”上。我有幸透过这次纪念活动，亲身见证这些传说中的人物的成就，内心钦佩之情实在难以言喻。

青年“爱故乡”行动系列活动

分享生命故事，对话我们的时代！

“我是 90 后大学生志愿者……”

“我是 80 后公益组织工作者……”

“我是 70 后返乡打工妹……”

“我是 60 后乡村民办教师……”

“我是 50 后上山下乡的知青……”

我们都曾迷茫和探寻；

我们也曾挫败和沉潜；

我们都是“爱故乡”的行动者；

我们也是扎根土地的“和平妇女”。

我们以“平常心”做着“平常事”。

我们走上理想的道路，正与更多平凡而坚韧的生命紧紧联系；

我们的躬耕前行，正受益于行动和对话中所获得的生命力量。

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我们所做的“平常事”正在开创新的历史！我们诚挚地邀请成长中的年轻人、公益组织、志愿者团体、教育及社会服务机构等，一起来分享生命的故事，对话我们的时代！

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

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

承办单位：

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

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

全球和平妇女中国办公室

协办单位：

中国爱故乡文化发展促进会（筹）

活动时间：

2015年5月—11月

活动方式：

1，专题工作坊：愿意参与此活动的机构及团体提供场地，并至少有一位代表现场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可以根据具体专题，例如乡村文化的传承、青年人的精神家园、离乡与返乡等，邀请一位或多位“和平妇女”或“爱故乡人物”到场分享故事，展开对话和讨论。

2，网络讨论会：每月一次进入网上“YY 教室”进行分享和交流（具体时间待定）。

3，故事书写与对话：请将成长中的经历和困惑、对理想与现实的思考书写成自己的生命故事，或如实地记录身边令您感动的妇女的生命故事，发到邮箱：globewomen@163.com。我们将及时与您回复交流。

活动联系人：

赵玲 17093860960, 15810181219

史淑俏 13520597369, 18801299075

魏春燕 18514282698

新浪微博： @和平妇女 @爱故乡计划

网站：

全球和平妇女中国办公室：<http://www.1000peacewomen-cn.org/>

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http://www.3nong.org/>

爱故乡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175307963>

行动与思考

扎根日常生活 行出和平力量

陈顺馨 陈惠芳 赵群 罗燕

“和平妇女”是谁？

2003年3月，一个名为“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活动在全球展开，目的是在全球提名一千名女性争评诺贝尔和平奖，从而引起世人讨论何谓“和平”，并确认女性对和平的贡献。发起这项活动的欧洲议会和瑞士国会议员维尔莫一文高博士说：“和平不可能是个人可以达到的，因此妇女走在一起，结成网络、团体和联盟。从每天的工作，她们看到，和平并非仅仅是战争和军事冲突的消灭……而是获得安然的日常生活。”

和平不仅是没有战争，而是获得自在和安全的日常生活。而且，只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地创造各种条件，和平才能持续。在大多数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中，男性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女性的角色被视为无关宏旨。诺贝尔和平奖从1901年设立一百多年至今，只有13名女性获颁和平奖，就是一个例子。文高博士认为：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样的暴力——包括个人和制度层面的暴力——跟战争中出现的暴力息息相关，而女性往往是暴力的受害者。但是，女性也是日常生活的守护者和和平的缔造者。从守护家人和维护自身权益，到扶助弱小、结连社区和保护生态，女性都是在建立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也是在消除暴力的根源。

“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活动突显了“和平”更广阔的含义，以及女性在创造和平上的重要角色。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也有108名女性获得提名，被统称为“和平妇女”。但无论是1000名世界各地的女性还是108名中国的女性，她们不仅代表自己和伙伴的贡献，也代表更多女性群体。这些女性很多身处社会底层或边缘，但却有坚韧不屈的精神，并且一直为家人、邻舍以至社会追求更美好和更公义的生存环境。因此，“和平妇女”这称谓不限于获提名的一千名女性，而是指所有通过日常生活实践，缔造和平的女性。

“和平妇女”的实践十分多样化，以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为例：有长期致力于维护劳工和弱势社群权益的，有从事生态和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扎根乡土为村民谋幸福的，有孜孜不倦以教育下一代为己任的，也有通过文字、影像和音乐关爱众生的。

自 2008 年起，两岸三地的十多名妇女和她们的社群参与了“生态、生计、文化与可持续和平”的行动研究计划。这些“和平妇女”中，有的来自偏远的农村，有的来自繁华的城市。她们生产环保清洁剂，从事生态 / 有机耕作，制造具传统特色的食物，推动“社区支持农业”（CSA），在沙漠植树造林。总之，她们以各自的方式，守护家人和社区的生计和健康、保护生态和建设本土文化。

为何要将和平的讨论扎根于生态、生计、文化的关注或议题上？

这项行动研究的目的，是探究两岸三地的“和平妇女”在生态、生计与文化等方面所面对的暴力，以及她们处理 / 响应这些暴力的行动经验、策略和困难。

日常生活的各式暴力跟战争中出现的暴力息息相关。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对自然资源的攫取，直接导致一些国家的内战和对平民的侵害，但即使没有战争或军事冲突的地方，百姓也并未获得“安然的日常生活”。事实上，随着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人们却越来越感到危机处处，如环境和食物污染、职业病、工伤意外、粮食危机、社会不公、文化单一、传统失落等等。

过去几十年，因为追随西方的工业发展道路，崇尚发展主义的经济逻辑，两岸三地农村的人力、产品和自然资源，很多为了满足工业生产和城市发展的需要，但带来的却是环境和食物的污染，危机四伏的工作环境和粮食价格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土地成为投机工具，农田日益荒废，农村逐渐失去自给自足的能力。“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生活改善并未减少社会不公，相反贫富悬殊的问题日益严峻，而只讲究物质利益的社会文化则令人际关系更为疏远，文化和精神生活更为贫乏。

如果“和平”是指和谐及安全的生活环境，那么当今社会出现的种种生态危机、农民和基层市民生计困难、社区解体、人心浮躁不安等，正显示没有战争不等于“和平”，暴力不限于军事或武力冲突。而且，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暴力，往往就是战争的直接和间接原因。因此，要获得持续和真正的和平，就必须关注人们如何受到这些问题影响，他们怎样面对这些问题，以及他们的行动带来什么改变。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可持续和平”必须建立在可持续的生态、生计和文化（包括关系、价值和知识）上。这三者息息相关，互相作用。简单来说，可持续的生态是有机的、平衡的和循环的，即顺其自然的；可持续的生计以尊重自然规律的态度、平衡的生产与消费关系和公平的流通，获得足够的物质资源维持生命和生活；可持续的文化则包含对人、土地和传统的爱护和尊重，重新建立被切割

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崩溃的价值，促进性别平等，生产（包含积累和流通）横向的、富创意的和解放性的知识等。

一直以来，大多数女性承担着照顾家人饮食起居的责任，在维持家庭生计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此，不论是生态、生计还是文化上的危机，都对女性构成直接冲击，而女性也以各种方式做出响应和寻求出路。



可持续和平的条件和愿景

基于“和平妇女”的经验，我们总结可持续和平的条件和愿景四点如下：

1. 从日常生活做起

战争与日常生活暴力的性质是相同的，源头也是相通的，那就是日益短缺的地球能源和土地资源的争夺、霸权主义的格局与意识形态（包括国际与国内政治、跨国资本与全球化经济、男权等）、竞赛或竞争（包括军事、科技、经济等方面）的心理、文化偏见与冲突（包括种族、宗教、阶级、性/别、地域等）。战争其实是日常生活常态及秩序的捣乱和破坏，让人民的生活空间变成战场，生命进入危难的状态，同样，非战争时期的日常生活的危机，其实已是战争的前奏。因此，和平行动远远超乎停止战争引发的直接暴力的和解努力，或战后的补救举动，而是从日常生活入手，防止制度和文化等间接暴力的出现。和平研究学者约翰·加

尔通将前者称为“被动的和平”，后者称为“主动的和平”。主动和直接介入日常生活的危机，如保护生态环境、珍惜与共享资源、促进民主与平等、实践互助合作精神、搭建关系、放下偏见与执着、促进了解等，会间接减低战争爆发的机会。

2. 重视妇女的智慧与行动力量

生态女性主义曾经指出，人类对地球的压榨，跟男性对女性的压制是出于同样的霸权逻辑的。因此，了解在主流性别秩序中处于劣势的妇女的处境，重视其生活与行动的智能和价值，不仅可以促进性别平等，还能恢复生态平衡。从参与这次行动研究的每一位“和平妇女”身上，我们都能看到妇女拥有的生活智慧与行动力量。她们的智慧与行动力量除了有性格的因素外，主要是来自对生活的观察与投入，还有由多样情感所激发的能量，包括对家人的爱、对土地的联系、对自身处境的感知、妇女之间的认同感与姐妹情谊、对下一代的关注、对平等与正义的向往、对理想的执着、对自我实现的渴望等。这些在强调客观理性的男权社会中往往被忽略或压抑的妇女智慧与力量，是维持和平行动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3. 打破身份、地域界限

暴力很多时候是由人为的隔阂造成的，例如身份、地域界线等。

研究者与行动者的界限

在这次行动研究中，我们试图打破的第一重界限主要是围绕研究者与行动者的身份的，视研究团队的工作为和平行动的组成部分，而行动中的“和平妇女”也是研究者。换句话说，研究与行动不应分开。研究团队成员对于自己是在执行和平行动有一定的认知，例如意识到与“和平妇女”之间需要建立“去权力”化的关系等，但是否能做到与“和平妇女”共同推动行动计划，并协助她们共同记录、讨论和反思自己的计划，成员中间存在一些困惑或疑惑。无论如何，虽然实践上存在某种局限性，打破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身份界限，仍然是我们的和平愿景之一。

地域上的界线

第二重我们希望打破的是两岸三地“和平妇女”在地域上的界线，以及包含在内的城乡界线。虽然这些界线的形成，存在我们无法逾越的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但我们看到，在整个行动研究的过程，“和平妇女”之间不仅没有

出现矛盾，还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与合作关系。在“和平妇女”互访交流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一些不自觉的不对等关系的出现，源头也是上述的城乡、地域分隔问题。我们最初构想分别在两岸三地举行三个工作坊，正是希望提供机会让妇女们在各自的生活情景中互相看见，借此消解大家对对方错误的想象，比如，大陆乡村生活的和平妇女在看到香港社会的巨大不平等后，打破原来对香港繁华都会比中国内地农村优越的印象，已很好地说明了打破地域隔阂的重要性。当然，根深蒂固的地域界线仍然影响着我们的认知，但这次“和平妇女”的行动过程告诉我们，性别间的认同、情感的建立以及对生态、生计和社区文化的共同关怀，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域界线造成的障碍，而存在于两岸三地的差异性，更带来不同的知识碰撞机会。

和平的逻辑及价值的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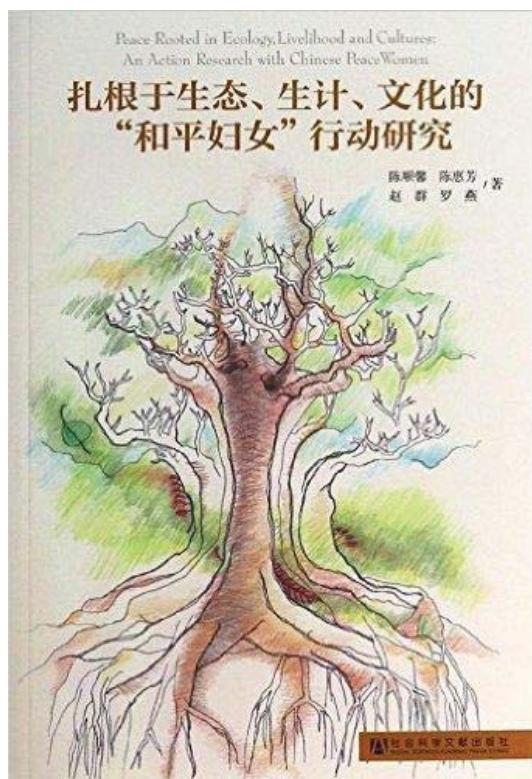
“和平妇女”在行动中体现的另类逻辑与价值重建，如果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并且成为人类的普遍价值，便能为可持续和平提供关键的文化资源。以下这些我们在“香港工作坊”总结出来的和平逻辑与价值，希望能为抗衡战争的逻辑和资本主义、发展主义等主流价值，提供参照：

- 对生命/传统/不同文化的尊重；
- 对土地的情感；
- 对身边的人宽容、接纳、真诚、互助、开放、付出；
- 对自身信念的坚持；对个人能力抱有自信和获得发挥的机会；
- 快乐生活是自给自足，互相依存、分工合作、动手创造、身心合一、文化多元；
- 社区精神来自本土、参与、民主、共融、文化传承、各种关系的搭建；
- 集体价值与集体生活再被确认；
- “农”的价值及其作为生活方式再被确认；
- 小型社区经济代替大型扩张性全球经济；
- 从小事做起，回应大环境；
- 每个人都是知识的主体。

研究团队制作《妇女、和平与可持续生活》纪录片系列，并出版《扎根于生态、生计、文化的“和平妇女”行动研究》一书和这个研究报告的网上版，是众多传播这些价值的途径之一，我们希望中国“和平妇女”扎根于生态、生计与文化的和平行动，能为人类面对的各种危机，带来行动的动力、启发与希望。

行动，就是和平的开始，也是和平得以持续的基石。

（此文节选自《扎根于生态、生计、文化的“和平妇女”行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陈顺馨：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生态、生计、文化与可持续和平”行动研究项目统筹人；

陈惠芳：资深农村发展工作者、“生态、生计、文化与可持续和平”行动研究计划推动者；

赵群：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罗燕：“生态、生计、文化与可持续和平”行动研究计划研究助理）

在香港，我理解了和平的含义

高富强

2010年12月6日，我第一次来到了香港，准备参加一个名为“生态、生计、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会议。会议由香港岭南大学群芳文化研究及发展部“和平妇女”项目主办，参会者是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和平妇女们。当然，我是已“编外”的身份前去参加的。

要说和平妇女，则要追溯到七年前的2003年。那一年，由瑞士国会议员维尔莫·文高博士发起，在瑞士成立了“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联会，开始推动“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活动。

我还记得，在2004年，由“农家女”机构推荐的几名参评妇女的资料，就是我具体负责填写的各种表格。不过，“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的后续活动我就没怎么再关注。这倒非我不关注女性问题，而是在我的内心，“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活动失败了——尽管2005年1月26日，瑞士驻挪威大使亲自将候选人名单递交到了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但最终的结局却是，200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由一个名叫穆罕默德·巴拉迪因的男人摘获。我只是隐约地知道，我们《农家女》杂志的资深读者王树霞，曾入围了千名妇女名单。入围争评者名单，与最终脱颖而出，距离远着呢？很长一段时间，我确实这样想。

真正对和平妇女产生兴趣，是2010年10月。那月月初的国庆长假还没结束，我就接到了王树霞的邀请，让我到她们村（山西省汾阳市栗家庄乡栗家庄村）参加由她和段锁兰组织的“有机果品品尝会”。王树霞确实不简单，别看她只是一个风来来雨里去的普通农村妇女，能量却非常大，在那次果品品尝会上，邀请来的专家和学者，都是我在报纸和电视里才能见到的。

然而，山西之行，却让我的心情极为沉重。为啥要这样说呢？因为我看到王树霞和段锁兰在她们的村子推行有机的理念太难了。这种难，不是我们想象的村民们不理解不接受，而是代价太大了——段锁兰为了探索有机道路是否可行，用自家的四亩果树做试验，全程不施化肥，不喷农药，结果四亩梨树几近绝收，而去年梨子赶上了好价格，我粗略地算了一下账，段锁兰损失最少有两万多元。代价既然这么大，王树霞和段锁兰为啥还要这样做？她俩的回答让我肃然起敬：化肥农药会破坏土地和水，用化肥和农药种出来的水果对人类的健康有害。

两万元，对一个靠土地生活的农民来讲，可不是一笔小数目。私下里我问段锁兰：“今年损失这么大，明年你会继续下去吗？”段锁兰想都没有想，说，“当然会！要不今年不就白损失了吗？”我再追问：“如果明年还出现这种情况，咋办？”段锁兰好像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略微迟疑了一下，说：“那也没办法！”毫无疑问，段锁兰在有机种植上，是要一条道走到黑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王树霞和段锁兰成了坚定的有机种植者呢？通过与她们两位的交流，我得知，是“和平妇女”的精神，给了她们百折不挠的决心。“和平妇女”项目究竟给了她们什么精神支柱？这，是我对“和平妇女”产生兴趣的原因。

后来我听王树霞说，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结束后，“和平妇女”的项目还在继续进行，2008年8月，包括段锁兰在内的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十多名“和平妇女”在宁夏银川举行了行动计划，重新诠释了和平的理念和意义：从妇女的行动中，建立一套既可持续生态资源，又可维持生计的生活模式。该项目到2010年12月结束，此次两岸三地十多名“和平妇女”相聚香港，就是要总结银川行动计划之后两年来的成果。

在基本弄清楚了“和平妇女”项目及和平妇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后，我不禁对这个群体的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平妇女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女人呢？除了王树霞和段锁兰，我在香港还见到了大陆的王华连。王华连是江西省万载县白水乡永新村的妇代会主任，曾经开着一个效益不错的饲料店。2008年银川会议之后，接受了“饲料喂猪不有机”的观念，毅然关闭了饲料店，而饲料店当时是她家唯一生活赚钱的地方。

优内和法内，是两名来自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中缅边境上的哈尼族妇女。两名少数民族姐妹虽然不善言辞，但通过幻灯片，我还是基本了解了她们做的事情。银川会议之后，她俩组织村里的姐妹们在村里开展了绿肥（把青草割来沤肥）种植试验；还成立了妇女小组图书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她俩还组织姐妹们在村里开展了一项名为社区漫步的活动，让村民们发现了村里的环境和健康存在诸多问题：随处丢弃的垃圾、天地里乱扔农药瓶子等。

写到这里，肯定有很多读者要问，绿肥试验也好，社区漫步也罢，这究竟与“和平妇女”项目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这也正是我香港之行受教育的地方。在主流价值观念中，与“和平”相对应的概念是“战争”，这似乎是男人们的事情——女性被排斥在了主流价值之外。而“和平妇女”，倡导的则是另一种和平的概念，人与人和谐相处是和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是和平。

细细一想，确实是这么一回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人们提供了丰厚的物质；但与此同时，却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仅举一个例子：农药的滥用，杀死了害虫，也杀死了益虫，污染了水源，也威胁到了人类的健康。而法内和优内推行的绿肥试验，或王树霞和段锁兰搞的有机果品种植试验，都是在探索一条有机循环的种植道路；像王华连关闭饲料店，主要的原因就是饲料不有机。这，往小了说，她们是在用自己的良知为人类提供健康食品；往大了说，则是在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在拯救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生态、生计、文化与可持续发展”，其实我刚才只是讲到了生态。那么，这些关注生态问题的姐妹们，生计问题如何呢？显然并不理想（香港和台湾情况要好一些，大陆也有成功的案例，以后我再讲述）王树霞和段锁兰我已经介绍了，遭受到了损失；法内和优内开展的绿肥试验，则大大地增加了妇女们的劳动强度；王华连我也说了，关闭的饲料店是她唯一的生活来源。

这，虽然是残酷的现实，但前来参会的“和平妇女”们却要将这项和平的事业进行到底！

2010年12月13日晚，为期一周的总结会议就要结束了，两岸三地的姐妹们又将再一次别离。在晚上举行的联欢活动中，姐妹们流下了伤感的泪水。段锁兰深情地说：“城市化的推进，让大量的耕地变成了楼房；化肥和农药滥用，破坏了我们的地球。两岸三地的和平妇女加起来，只有十多名，我们的力量太小了！”

是呀！这样的姐妹太少了！其实，正因为少，才能感到这些姐妹们的可贵。

但，谁又能保证，星星之火，不能燎原呢？

回过头来再说“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失败的问题，通过会议，我终于悟了出来：她们无论最终是否争评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参与了这次活动，并把和平的理念贯穿到了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正如北大教授戴锦华所云：“这是一次象征性的行动，更是一次真实的行动。”

致丽 20 年：不能被遗忘的伤残农民工

谭 深

1993 年的致丽大火，曾经震惊了全世界、震动了中国政府高层。这场大火伤亡之惨重，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劳工权益问题的关注；由于致丽是一家出口加工企业，在追究责任过程中，一个全球化生产的利益链条也被清晰地展现出来。当时国内外的反映可分两条线路，一是国内政府和官方组织，追究相关者的法律责任，开展大规模的消防安全检查；另一是国外包括香港的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关注和帮助受害者，并将矛头直指跨国公司的责任。

我本人正是在同年开始做农民工研究的。1995 年有机会随学者常凯到致丽旧址，并访谈了保外就医的致丽原中方厂长黄国光，而后得到常凯在火灾现场收集的各种文件、信件，写成《打工妹的内部话题》；事件 6 周年前夕，组织了北大、人大的学生分四次在重庆和河南寻访致丽受害女工和死难者的家庭，其中我本人与 AMRC 的调查员一起在重庆做了调查。这几次寻访的名单交给持续帮助致丽受害者向上游的跨国公司索赔的香港民间组织，并将寻访经历写成报告《泣血追踪》。对致丽的调查是我十余项农民工调查和项目中震动最大的一项。十几年来，我无数次打算再去重庆，重访那些受苦受难的致丽姐妹兄弟，可是终未如愿。

如今致丽劫难已经过去了 20 年，死者已矣，伤者也回归日常生活。这 20 年，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80 后、90 后农民工的新世代成长起来，他们面对的问题与当年致丽女工一代有很大的区别。与致丽女工同样作为第一代的农村外出打工者，相当数量已经返乡，成为“后劳工一代”。然而回乡，并不意味着打工生涯影响的结束。特别是那些因伤残而返乡的打工者，他们的伤痛跟随他们伸延到家乡，给他们自己的生活和他们的亲人带来持续的影响。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伤残返乡打工者的数字也在不断增加，他们已经构成农村一个最弱势的群体。

以我的调查为例。2004 年我在四川一个外出大县组织了一项伤残返乡打工者的调查，包括外出期间受到各种伤害致病、致残、致死的情况，共登录了 346 人，其中死亡 113 人。而该县一个外出比例最高的镇，当时常年在外者 1 万多人，调查到的受害者就有 242 人。再如 2000 年底和 2002 年底我们在不同范围曾做过有关调查，显示受过工伤的比例分别是 11.9% 和 25.3%，曾有过职业病的情况分

别是 1.7% 和 9.8%，均远高于四川调查的比例。以后我在设计和参与的各种调查中，都加入了询问在外期间有无受到身体伤害的问题。结果是只要询问到的村，无一例外都有外出伤亡的事情，工厂的情况也是同样。目前还没有见到官方的全国性数据，但仅就以上零星的调查已经令人不安，一些媒体报道的典型案例更是触目惊心。官方认可：农民工、外来工成为伤亡事故的主体，约占伤亡事故总数的 80% 以上。

外出打工却遇到伤亡事件，今后个人的治疗和家庭生活将面临沉重压力，保险或赔偿至关重要。这方面，致丽受害女工还算幸运的。一则这场事故震动高层，被当地各级政府作为专项处理，尽管补偿数额不高且不公开，但基本到位；二则作为全球生产模式下亚洲地区的第二场大火，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香港市民的捐助。特别是香港劳工组织 AMRC 和基督教工业委员会持续的关注和帮助，为受害女工和他们的家庭争取到 CHICCO 的赔偿，成为向跨国公司索赔的成功案例。

但对于更多的伤残打工者来说，索赔是一件极为艰难的过程。在 21 世纪初国家职业病、工伤保险等法规及高层一些安全生产的文件出台之前，农民工工伤的索赔基本以私了为主。从前述四川的调查得知，因矿难死亡者多得到赔偿，但 2001 年以前赔偿数额低且差异大，最低仅 2 千元，最高 3 万元和 5 万元各一例，其余呈正态分布。2002 年至 2004 年，赔偿数额增加，都在 2 万以上，但最高也止步于 5 万。工伤者索赔更为复杂，有近十分之一完全没有得到赔偿，其余从千元以下到 15 万元不等。由于没有保险，私了的数额往往是资方说了算，如果有争执，伤残者就会被赶出厂，生活无着。1999 年在周立太律师帮助下调查伤残打工者时，亲眼见到他们的绝望和无奈。进入 21 世纪以后，一个看似完备的针对农民工的劳动法律保护和政策体系建立起来，但是实践过程中维权之路依然举步维艰。从工伤的发生到获得赔偿，即使完全按照制度走，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何况每一步，工人都处于弱势地位，因此索赔不能到位是经常的事情。

而伤残打工者一旦回到家乡，就基本上遁出人们关注的视野，成为沉默的群体。但是他们的苦难并未停止。对于那些落下严重残疾的打工者，身体的痛苦往往要煎熬他（她）们的一生。《苹果日报》报道，致丽四位伤最重的女工，“烧伤的皮肤、筋骨，破了又合，合了又破。不时仍要想法子支付无尽的手术、治疗及更新义肢的费用。”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供给者，一旦丧失了劳动能力，或者劳动能力下降，给家庭带来的第一个冲击就是经济情况的逆转。四川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伤残者（没有包括死者）家庭，经济状况在本地为“上”的凤毛麟角，为“下”的占到一半，还有六分之一成为特困户。而对于伤残者来说，心理的压

力一点也不亚于身体的病痛和经济的困境。从健康人沦为残疾人，从支撑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变成需要照顾的对象，每一件对于伤残者来说都是非常残酷的，他们的挫折感、困顿感要比欠薪、超时加班更为严重。四川调查发现，有 1/3 或强的伤残返乡者精神状态属于比较好一类，1/3 不太好，1/4 精神状态非常不好，还有少量精神不正常；在外的人的精神状态与返乡者差不多，良好的比例占 1/3，其余都属于“不太好”和“很不好”。值得注意的还有大龄未婚和离婚的伤残者。这些年无论在何处调查，都遇到这样的人和事。伤残无奈返乡而又没有婚姻的支持，这些可能是一些从身体到精神都非常痛苦的人群。伤残的大龄未（离）婚女性比男性少，但是我们调查中也屡屡遇到这样的案例，她们比男性处境更为窘迫。因为按照中国传统性别分工，照料家人本来就是女性的责任，如果家中的男性有了健康问题，女性理所当然要承担日常的照料。而女性特别是已婚女性一旦丧失劳动力，她不仅不能承担原本属于她的家务责任，还要他人照料，这就需要家庭角色的转换。问题不是每个家庭都能作到这样的转换。女性的身体对于她履行性别角色所赋予的责任，比男性有更重要的意义，而这是金钱所无法补偿的。

伤残返乡者能得到哪些支持？按照现有的制度，可能包括：民政部门的低保和困难救济，工伤的康复制度，残疾人在就业、工商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减免农业税方面的政策，等。但是上述政策在设计时，主要还是针对农业劳动者和本地企业的工业劳动者，没有将大量外出劳动力可能的风险考虑在内，逻辑上认为外出者的工伤风险应当由输入地解决。四川调查中发现，伤残返乡者中有几人得到民政部门的救济，但是据说当时一个乡镇一个月的救济金数额，仅几十元而已。再如残疾人就业基金，是通过向本地企业收缴的，但是本地企业能力有限，所缴纳的基金连县城里的残疾人就业也不能都解决，对于这样一个更大数量的农村残疾人无能为力。

2011 年，农工党中央进行了“全国十省市伤残返乡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伤残农民工基本都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合作养老保险，但几乎所有人都没有获得社会救济、廉租房、低保、托养、五保等社会保障。同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根据这个纲要，“十二五”期间将残疾人普遍纳入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予以重点保障和特殊扶助。除了政府在社会保障、康复、教育、就业等方面的职能外，政府还将通过各种扶持措施鼓励各类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参与发展残疾人服务业。将志愿助残工作纳入国家志愿服务总体规划，鼓励和帮助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充分发挥残疾人在残疾人事业中的作用。说明一个残疾人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正在逐步建立。

而致丽女工小英创办的“自强残疾人服务站”就是这样一个先行组织。10年来，通过这个草根公益组织，原致丽伤残的工友们之间保持着联系，相互鼓励和安慰；2003年——大火后的10年，她/他们还有过一次聚会和回顾；服务站还把视野投向由于各种原因残疾的朋友，开办了倾诉热线、接待来访，联系各种社会资源，给予困难者以可能的支持。小英和服务站的经历，说明一个普通的打工妹，完全可以成为助人的社会工作者。相对于学者批评的“残疾人组织行政色彩浓厚、组织发展动力不足、组织功能薄弱”的现状，这样的草根组织更具真诚、更有活力，应当得到更多的肯定和支持。

致丽 20 年，在农民工数不尽的生命逝去和艰辛的维权过程中，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成长为了强大的经济体。如何善待那些为经济增长付出血汗、做出牺牲的伤残农民工，考验着社会的良知与正义。他们不应被遗忘，他们的权利再不能被漠视。



蘋果日報

我们始终在以反思之名拒绝反思

戴锦华

赵大伟 访问

摘要：80年代，我们曾尊崇并梦想确立的意义和价值突然变换了嘴脸，意识到，我们始终在以反思之名拒绝反思；中国的“进步”的确太经常地“以遗忘为先导”。



戴锦华在委内瑞拉乡间。近十年，她主要关注第三世界研究和考察。(2004年)

戴锦华简介：

北京大学教授，博导。1959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1993年调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专注于中国电影史，大众文化研究以及女性文学研究。著有《浮出历史地表》（与孟悦合著）、《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涉渡之舟》、《雾中风景》等。

“我一辈子没在上课时抽过烟，”戴锦华强调说。中学时期就开始“故作叛逆”学抽烟的戴锦华，高大健谈，深受学生仰慕，但她上课时吞云吐雾这点却是误传，“学生都知道我是臭名昭著的拖堂，但是我从不占用课间休息，因为我要跑出去抽烟。”

采访戴锦华时，烟没断过。她刚刚从釜山电影节回来，作为中国电影研究、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三个学科的拓荒者，她是目前国内最具权威的电影评论人，釜山电影节之行，她最在意的就是即将上映的贾樟柯电影《天注定》，“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她说。

“我的记忆力现在开始衰退了，”戴锦华现在看书看电影都需要做笔记，要不然就忘记了。看过的小说和看过的电影留下了“一种色调和基调，但是细节记不住了”，这样的结果是，写东西更加深思熟虑。而年轻时的她过目不忘，写文章、做研究几乎一气呵成。“不是我不明白，世界变化快。”她说。

从高中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戴锦华要求自己只睡四个小时，“现在想起来有点可笑，只因为说周恩来只睡五个小时，后来看到拿破仑睡得更少，”年轻时的她觉得不应该惯着自己，更应该勉励自己，苛刻的要求似乎也是她后来成就的注解之一。直到1987年一场重病几乎让她“九死一生”。

女性主义对我首先是个人生命经验

南都：1978年考到北大，选择中文系是你自己的意愿？

戴锦华：是我强烈的意愿。当时我报考大学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仍然坚信“文艺危险”，就觉得这是一种找死的活法，我在理科方面也算强，刚刚恢复的一些竞赛还会得一些名次，只有少数的老师支持我报考文科。最后，我认定这辈子还是该去做自己热爱和擅长的事吧，结果从理科班报考了文科。

南都：家庭环境对你的专业选择有影响吗？

戴锦华：我妈妈是小学的语文老师，爸爸是文学爱好者，对我影响很大。坦率地说，北大四年时间，应该说奠定了我整个生命的底色。当时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师都在一线教学，像林庚先生给我们讲《楚辞》——那是我最爱的课，上他的课经常会记笔记记到手指抽筋。

南都：但本科时期对如何走上学术道路了解应该不多吧？

戴锦华：那时很少谈学术，热衷谈思想。但开始读大学不久，我已经下决心以后要在大学里教书。当时的看法很简单，也幼稚，一个是觉得“自由价更高”，

相对来说，大学里面有时间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当然，思想的自由是没人能剥夺的。另外，当时环境下，我们最恐惧的是变得衰老和保守，我想象，如果始终能和年轻人在一起，抗拒精神衰老的机会会多一些。当时我也比较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搞”创作：写诗，写小说，我可以，但恐怕最终不入流；如果去做研究性的工作，我对自己还保有期许。

南都：你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浮出历史地表》开始关注女性主义研究，起因是什么？

戴锦华：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女作家研究，比较早地关注女性主义和女作家，原因说过很多次啦——长得太高，作为一个女性比绝大多数男性都高，因此有很痛苦的成长经验。再加上我讲话快，脾气直，所有这些都会被指认为“不像女人”。

我一直说女性主义对我首先不是理论，而是个人生命经验的需要。了解性别在社会整个结构中的位置和意义，是为自己的解惑。写《浮出历史地表》的起因颇偶然，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突然开始要求大学毕业生去到农村参加讲师团——形式介乎于思想改造和扶贫之间，孟悦当时参加讲师团在河南结识了李小江老师，当时李小江正在组织一套“妇女研究”丛书，她就替我认领了一本。

南都：这本书是你跟孟悦合写的，书稿你们如何分工？

孟繁华：我跟孟悦是同班，同屋，她帮我认领了这本书后，我又反过来拉上她，当时分工是说她写历史线索，我写作家作品论。但是接下来我就大病一场，几乎一命呜呼。这场病九死一生，极大地改变我对生命的看法。那是 1987 年，我 28 岁，发现时已经是三期肺痨，诱发多脏器衰竭，到了死神门口了。住进结核病医院三个月之后，医生才对我可能治愈表达了乐观，六个月之后病情开始好转，八个月之后，我自动出院。这之后变化很大，不再野心勃勃、急功近利。明白了，生命是一个极为朴素和脆弱的过程。

到我出院时，《浮出历史地表》已临近截稿了，没人会催我，大家还在为我活下来了而欢欣鼓舞。最后，《浮出历史地表》我只写了几章，尽管全书的布局、作家的选择乃至具体评价是我们共同讨论的。

关于这本书有一个插曲：初到电影学院，我在图书馆的一堆私人赠书中第一次读到了张爱玲和苏青，当时国内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她们的资料，我一度真以为我“发现”了张爱玲和苏青，当然书中这两个章节也是我写的。书出版后不久，张爱玲变得大热，我常开玩笑说，我又一次在不自觉间做了一回大时代的俗人。

南都：1987 年你们在北影创立了电影史论专业，应该非常辛苦吧？

戴锦华：那时候梦想大，对自己的期许也高，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常态。自己做翻译，写作、教学；开设新专业，要自己编写教材；当然，出席各种会议。发病前持续感到极度疲倦，我以为这是很自然的事。

南都：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北影，在那样一个很热闹的时代，你如何和电影结缘？

戴锦华：毕业的时候，我的同学都抱有直接入社会变革的热望，所以报社、出版社是首选，大学教职是等而下之的选项。而我一方面非常明确地想去大学任教；另一方面，的确想与社会实践性的东西保持某种距离，以为在相对距离之外会有更多的思考空间和自由。

去电影学院完全是别无选择。当时我喜欢各种艺术门类，唯独蔑视电影；加上当时的电影学院完全不见经传，去得可谓勉强，但事实上这成了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初到电影学院，暑期里举办第一届全国高校的电影进修班——今天很多的大学里面的电影专业的领军人物可能就是那个班里的学员吧，我作为助教，任务是坐公共汽车到北京各处给主讲老师送票，收获是拥有了一整套电影观摩票。到任教的第一学期，我大概连续看了100多部世界电影史上的名片，名副其实地叫做“falling in love with cinema”，一往情深。

我的学术道路基本是逆推式的

南都：最初在电影学院上什么课？

戴锦华：当时我的主课是艺术概论，也兼任各种文学课，包打天下的“万精油”。后来我统计过我在电影学院的课程：三十几门形形色色的课吧。同时以极大的热情跑去导演系、摄影系、录音系疯狂听课，尝试学电影。当时也就有十几本关于电影的书，一两个月下来就苦于无书可读。跑去北图查找外文书的时候，因为一本书的名字入眼，便借来复印了苦读。这是我的第二号幸运：这本名为《电影语言》的英文书，正是现代电影理论的法国奠基人克里斯蒂安·麦茨的名著《电影表意散论》的英译，结构主义电影符号学的开山之作。以我的英语和理论水平，当然如捧天书。所谓阅读，是逐字查字典，一句一句地硬译。这本书奠定了我全部理论与学术的基础和底色。盲打误撞，落在正确的起跳点上。

南都：你还曾提到《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在当时对你的影响也很大。

戴锦华：那本书不光是对我，是对这一代人影响都很大。但我最早接触到“结构主义”，是因为乐黛云老师——她是我一生的偶像。那时候她最早到美国

去访问，回来时带了几十箱书，当时是校园的美谈啊——崇拜里也有嫉妒。现在常有学生说起坐在窗台上听我的课，我当时是名副其实地在人满为患的礼堂里坐在窗台上听了乐老师的讲座，第一次听到了结构主义这个名词。

但当初选了麦茨的书，并非由于“结构主义”，而是因为英译名：《电影语言》(FilmLanguage)。当时整个人文社科界都处在渴望新语言的焦虑之中，电影语言之“语言”二字撞到我眼前来，此外根本不知此书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名作。我自己的学术道路基本是逆推式，经由麦茨，返回到罗兰·巴特，最后追溯到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女性主义理论也是如此。有人说我是最早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但事实是我是从电影的性别研究：从劳拉·穆尔维等进入，逆推回波伏娃、奥康纳、西苏……；另一边，追溯到拉康，逆推回弗洛伊德。

南都：11年黄金的青春之后，1993年你离开了北京电影学院，为什么？

戴锦华：1988年乐黛云老师第一次和我提到回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时候，我基本不予考虑，那时我还在和电影学院和电影的蜜月之中。1992年邓南巡讲话之后，整个社会一夜巨变，突然之间，变得只剩一件事、一个字：钱。周围的人大都下海而去，剩下的也忙着拍片、拍MTV、拍广告、拍卡拉OK带。我感到极为孤单，好像继续从事学术，不是愚蠢，便是荒诞。形而下地说，是学院没有人在授课了。经常我一天要上七节课，一周上五六天，回到家里感到自己就是一个空洞的皮囊，里面一无所有。到北大去看朋友，发现外面的变动对他们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千回百转之后，我就感伤地离开了电影学院。又一次没想到，这成了我再次的幸运机遇。

南都：这期间对学术的反思是什么？

戴锦华：整个在80年代，我们曾尊崇并梦想确立的意义和价值突然变换了嘴脸，自由的信念变身为欲望的哲学；而这类哲学对我，几乎是十足的恐怖主义。开始意识到，我们始终在以反思之名拒绝反思；中国的“进步”的确太经常地“以遗忘为先导”。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只有以退为进了。

南都：如何以退为进？

戴锦华：一个是我再回到女性文学的研究和写作中(《涉渡之舟》)，因为那是我一个个人的和亲切的“地方”。同时我自己几乎不自觉的一次转型——文化研究转型，却悄然开始了。其中的原因是，我一方面深感到电影不再能从自身得到充分解释——我已经无法用电影的理论以及逻辑来有效阐释文本的事实，需要更大的语境、更多的参数；另一边则是强烈地感觉到已经不再是电影或文学加入在中国这新一轮的剧变之中，相反是一些更为流行的文化与现象。比如

说“渴望冲击波”、毛泽东热、文化怀旧等等。而要分析类似文化，需要理论、思路、方法上的调整和改变。

文化研究帮我打开学术生命的困局

南都：《涉渡之舟》继续在女性主义研究上延伸，你跟其中的女作家们有过接触么？

戴锦华：很多是朋友啊。但这会违背我的“原则”：尽量与艺术家、尤其是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艺术家保持适当的距离。但和作家们交往，有始料未及的快乐。在与光影声音创作的导演们交往良久之后，和作家们共处的快乐之一，是对同一媒介：语言媒介的分享。在这份快乐和我的“原则”之间，我保持了文本中心、而非传统的作家作品论的写作方法。

今天回看，《涉渡之舟》更像是记录了一个过程，而不像是一部完整的专著——一则是写作到完成的时间跨度较长，二则是在写作过程中自己的思考也在发生着变化。最先处理、研究戴厚英、张洁等女作家的作品时，我自觉尝试去整体性反思 80 年代，但显然，彼时彼地，还远没有获得能痛定思痛的空间。记忆中的痛感太直接，现实的焦虑也太强烈，因此很多社会与文化定位有失准确，诸如，如何区别政治精英主义与文化精英主义？如何思考理想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怎样看待和处理当代中国的历史债务和遗产？很多时候，与其说在反思，不如说是在自讼。

南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吗？

戴锦华：原本的计划是继续做九十年代到世纪之交的女性文学，也累积了四五个作家的专论。没有写下去的原因首先是兴趣点转移——我这一生可以说是任情任性，率性而为；另外一个原因是新生代女作家，诸如卫慧、棉棉的作品等开始呈现了不同的文化、市场与社会格局。一边是女性写作与勃兴中的新中产文化之间的重叠和错位，一边是我经常找不到自己的发言位置：对其中太多的、可以说丰富、可以称杂芜的东西，我很难单纯地站队、表态。简单地说，是不便支持又不便反对。我一度很深入地徘徊在性别叙述之畔、之内的阶级表述及参数的相互抵牾和纠缠之中，也游移在单纯女性主义立场与更广泛的社会承担责任之间。最后，一个小秘密：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我始终试图区分我的电影、文学研究和大众文化研究，因为在我心中，无法抹除某种意义上的审美评判原则。面对世纪之交的女性写作，我们必须区别流行文本和我心目中的文学。结果是，我搁置了这个主题。我想，我还是会再度回访的。

南都：你到北大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所之后，乐黛云老师对你有什么要求？

戴锦华：当然有：就是发展你自己。乐老师会为你创造、争取所有必需的条件。当年乐老师在中国创建比较文学学科——很大程度上介入并影响了 80 年代的社会文化进程，到 80 年代后期，乐老师的理想，是使之成为中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一个综合的多学科、跨学科、共融互动的领域。乐老师选中我，是瞩目于我的电影研究，但我转型文化研究，乐老师只有全力支持。正是乐老师扶助了文化研究工作室——应该说是中国第一个文化研究的机构的建立。我获得过的几个学术奖是乐老师为我申报的，职称是乐老师敦促和玉成的。我此生再未遇到任何一位前辈可以像乐老师这样庇护、激励和扶助后人。她激励、从不指责，更不会划界。

南都：成立研究室之后对你的研究起到怎么样的作用？

戴锦华：文化研究工作室始料未及地实现了我当年的梦想，与学生之间的高度互动，带动我不断刷新自己的知识，打开或转移自己的文化视野。1995 年工作室成立，一方面我开设了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课程，一边则是文化研究工作坊每周与不同级次的学生、研究生共同讨论他们的文化——“喂养”、伴随他们成长的流行文化、亚文化，当然也包括高雅文化。总的来说，文化研究的整体诉求、思路和方法，拯救了战后人文学术的“贫穷”和困顿，打开了视野，拓展了疆域；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这门战后“显学”，事实上又始终处于某种边缘和尴尬的状态，在这轮高度学科化、技术官僚化管理的浪潮中尤其如此。对我说来，抛开人文与社会、学术与社会实践的命题不论，文化研究的学院力量在于跨学科。以某一学科为“根据地”——对我，始终是电影学，不断在“游击战”中打破壁垒、拓展疆域。你永远无法去定义何为“文化研究学者”。文化研究曾帮我打开电影学研究及我个人学术生命的困局，让我再次记忆并实践自己选择学术生涯的初衷。

因此，当文化研究开始在东亚、中国学科化的过程，我几乎没有获得动力。说过了，文化研究于我的意义是跨学科，借助不同学科的范式，激活文化的力量。一旦你自己成了学科，就意味着你要规范、定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这可能是画地为牢，或难免买椟还珠。

南都：没法突破这个矛盾？

戴锦华：我自己的选择是双向的：一边是我将自己的文化研究拓展到第三世界研究、全球社会运动研究和参与之中；另一边我以新的方式重回电影研究和电

影学。新的《光影》系列年书的编纂就是后者的结果。一进一退，是为了保持文化研究的张力状态，拒绝学科化对其张力的消解。

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转型

南都：近年来关注的方向是什么？

戴锦华：2000 年之后十年间，主要是第三世界研究和考察。我跟着一些做社会科学的朋友，去了几十个亚非拉国家，不是飞往大城市留在大学的报告厅里，而是进入深山、丛林、乡村，见过不同的基层组织、民众团体、甚至游击队。我也去了许多中国的贫困山区、接触到特困人群。

为此，我编译了《蒙面骑士——墨西哥副司令马科斯文集》，写了一些关于中国农村妇女和第三世界国家研究的文章。最近不少人问我为什么不再做学术，我很“委屈”啊。这中间其实极为“学术”，我曾渴望完成政治经济学转型，这之间读书、思考密度之大，甚至超过了我学术起步的时候。必须承认，这个转型并未真正完成，因为在深入了政治、经济学之后，我再度发现了它们自身的限定所在；真正的收获是，当我返回自己熟悉的领域和学科，我发现类似的过程的确已深深地丰富并延展我思考的天际线。

南都：但是出版作品的比较少是什么？

戴锦华：几个原因吧。一是这段时光的意义首先是个人的生命经验。改写一下鲁迅的说法吧，是为了走异乡行异路寻找别样的人们。出版《蒙面骑士》，也只是为了一种分享：我自己定位是，最高诉求是分享不同的思想资源，最低诉求则是分享自己的惊喜：在今天的世界——除了比尔·盖茨式的成功，还有另类人生也很精彩，但价值大不同。另一个原因，是我自己不喜欢将一切转换为学院资本或道德自恋。对种种社会实践的介入参与，是因为某种不能自己，是因为不做心不安，所以不以为必须转换为学术生产的形式。参与到农村妇女、新乡村建设的活动的时候，我只是一名志愿者——和所有志愿者一样，我理解、同情、认同，但我不以为自己多读了几本书，就有资格指点江山、哇啦哇啦。如果人们认识我，我愿意做任何事——给妇女小组讲电影或和支农大学生谈世界。如果没人认识我，那么我可以做杂事，很多杂事需要人做。很简单。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也有新时髦，在人文类论文的结尾，说点 N G O 或社会运动，我不喜欢，不该将他们为改善自己生命的努力和抗争变为一种学术噱头。也想过写专著，但老实说，对我，类似题目不如其他选择更娴熟、更快乐。

南都：还有哪些“快乐”的书写作品？

戴锦华：的确有些惭愧，我电脑里至少有六部完成大半的书稿吧，都停在某个瓶颈状态上了：有的是既有理论的诱惑太强烈，找不到自己的突破点，有的的确是太率性了，兴趣转移，便弃置了。例子吗？其中一本，是重访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电影，从“观视位置、方式”——简单地说是“看”、“看见”去谈30年间主体位置的困境与演变。当然是从拉康的“眼睛、欲望和主体”开始。进而把他们放入到更大的国际语境中去，从文化史与个体经验的双重参数中讨论电影与电影史。诸如第四代导演和苏联解冻时期的电影、他们和样板戏电影，当然也是“文革”历史的极为内在的关联；比如第五代与欧洲电影新浪潮、与社会主义制片体制、与他们插队落户的个人经验；或第六代与后冷战、国际电影节、城市与市场。我会讨论中国电影的“非看之看”与“无主句”。再比如有十几万字的吸血鬼电影研究丢下了，曾很投入地做了两年。很多朋友问起，我的回答是：趁兴而来、尽兴而归。但只要假我以时日，我最终会交卷的。

[同题问答]

南都：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几本？

戴锦华：克里斯蒂安·麦茨《电影表意散论》、詹明信《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

南都：你认为，要做好学问，最重要的是什么？

戴锦华：由衷的热爱，不忘初衷，定力。

南都：你个人最满意的著作是哪一本？

戴锦华：《雾中风景》。

南都：研究工作要经常到深夜吗？工作习惯是怎样的？

戴锦华：年轻时代的工作习惯是通宵达旦；中年以后是黎明即起，保证每天有质量的写作时间。

南都：学术研究之外，有什么业余爱好？

戴锦华：保持迷恋、游戏的能力和童心，DIY一些小物件。

（本文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13-10-17）

从电影《星际穿越》看食物伦理和生态文明

对谈嘉宾：

刘健芝，香港大学比较文学博士，任教于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岭南大学群芳文化研究及发展部生态生计与文化项目统筹。现任全球和平妇女联合会（Peace Women Across the Globe）理事；另类实践世界论坛（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副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与文化、全球化与可持续实践、批判教育学等。

田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伦理学等。

潘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员助理研究员。

（此次讨论主持人为潘杰，下文简称“主持人”，田松教授简称为“田”，刘健芝教授简称为“刘”。）



也谈食物伦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但是地球上不只有人类

主持人 我这次回北京看了个电影《星际穿越》，讲到环境问题带来的粮食危机和健康危机下，地球濒于毁灭前人类自我拯救的故事。这个电影有对现代化的

反思，可是遗憾的是反思里看到的仍然只是人类自己，其他生物的被灭绝并不在其反思之列。最近关于「食狗肉者」、「食鲸」等的争论一直都是热门的话题。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人与食物的伦理关系呢？



刘 确如你所说，电影《星际穿越》关心的只有人类自己，推到极端，主角关心的几乎只有他的女儿。影片一开始，人类面临的困境——沙尘暴、缺水、缺粮，这种灾难情景不需要任何解释交代，因为它已经是现代人的共识了。影片的一句名言是：「我们的任务不是拯救地球，而是离开地球」，地球已经被破坏得毫无拯救的可能。剧情围绕主角如何被骗——他愿意负起外层空间的任务，只因他相信他的女儿和地球上的人类仍可被拯救。而老科学家「骗子」却深知，转移地球人上太空的 A 计划根本不可能，从来只有 B 计划有一丁点儿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影片最终让人类获救，在外层空间某个星球上延续这个物种，但却是绝无仅有的机缘巧合所致。因为主角进入黑洞而不粉身碎骨这个不可能的事，成为人类获救的关键。话说回来，我还是挺喜欢影片里的执着精神，如葛兰西（Gramsci）所说，面对困境，理性悲观，意志乐观（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 optimism of the will），即以审视一切幻象的勇气，拒绝躲在自欺欺人的幻境中；打破幻象的勇气源于生命那不能压灭的火焰，在苦难、怀疑面前，毫不裹足，冲破一切虚无。

田 《星际》就人类的未来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不过，这部影片的总体倾向我并不喜欢，这是一个用「爱」包装起来的科学主义——人类最终的拯救在于解出了某一个方程。人与食物的伦理问题，这是一个好问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方向。怎么样的食物是合乎伦理的？这个问题可以从多个层面去思考。首先是物本身的伦理，这是最直接的层面，「物尽其用」、「暴殄天物」，说的都是物的伦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也有物的伦理的层面。在涉及到动物性食

物的层面，不可避免地涉及动物伦理。在很多文化传统中，杀生是一种在伦理上很严重的行为，人在杀生时是有罪恶感的。中国传统社会在杀鸡、杀猪之前会有简单的祭祀活动，穆斯林杀羊之前需要念经，这可以视为一种伦理上的拯救，使杀生这件事获得伦理上的认可。同时也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吃，各个民族有不同的禁忌。比如，忌吃狗肉是相对普遍的。据我所知，所有的狩猎民族都忌吃狗，南方所有的稻作民族也都忌吃狗。唯一说得上有吃狗传统的，只有朝鲜族。我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类学现象，值得研究。汉族对于吃狗相对模糊，虽没有严格的禁忌，但总体而言，还是倾向于否定的。俗语有「狗肉上不得席」。但是进入现代社会，有些传统需要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尤其是从当下普遍的环境危机与生态危机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比如日本人吃鲸，虽然是传统，但是未必符合生态伦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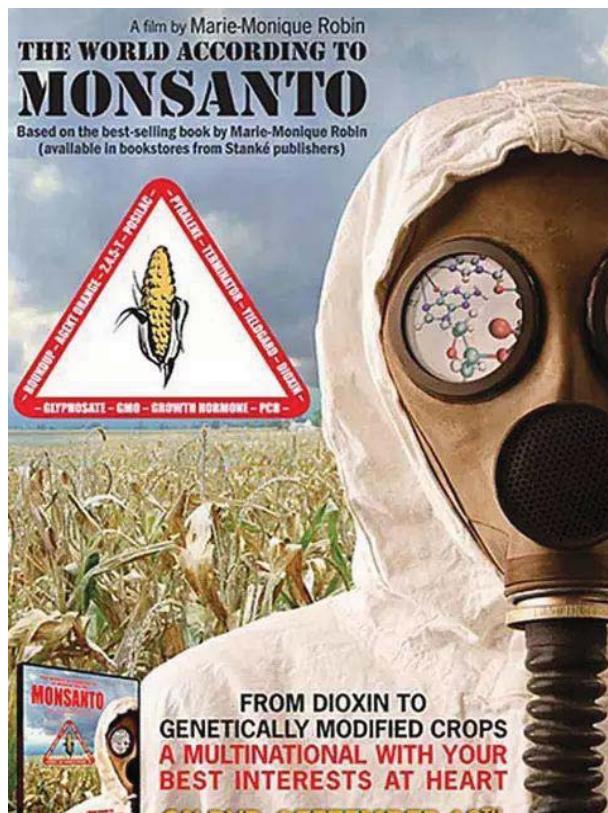
农业生产中的植物性食物也涉及伦理问题。这个可以从利奥波德¹的土地伦理或者生态伦理的角度去考虑。什么样的粮食是合乎伦理的？什么样的生产是合乎伦理的？利奥波德主张，把土地连同土地上的植物、动物、微生物都视为一个共同体，那么伤害土壤微生物的农业方式，便是不符合土地伦理的。从生态伦理的角度，生产过程对周边生态系统构成破坏的，是不符合伦理的。那些对周边生态系统影响不大，甚至使自身成为周边生态过程之一部分的农业方式，是合乎伦理的。所以结论很简单，工业化农业是不合乎伦理的。工业化农业生产出来的食物是不合伦理的，因而是不道德的。

饮食安全与政治：转基因为例

主持人 食物伦理确实是一个大问题。食品问题不只是吃什么那么简单，它与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谈到一个民族的饮食体系，背后又涉及到各种样的利益驱使和政治角逐。最近，内地关于转基因主粮及食品的争论引起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各种观点林立，不一而足。二位老师能否谈谈到底转基因的争论在争些什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转基因食品？

¹ 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的先驱，被称为「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他在《沙乡年鉴》(A Sand Country Almanac)一书中首次宣导土地伦理。

田 我对于转基因食品是坚决反对的。我们刚刚说到伦理问题。转基因作物是工业化农业的高级阶段，它是不合乎生态伦理的。同时，转基因涉及到对生命本身的改造，从生命伦理的角度看，也是存在伦理问题的。我曾专门写过文章，从历史（工业化农业）与哲学（机械自然观）的角度，论证转基因作物注定会对环境产生破坏，导致生态问题，也注定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伤害。转基因问题首先不是科学问题，而是商业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环境问题。必须把转基因问题从科学问题的狭小范围中提出来，才能看清转基因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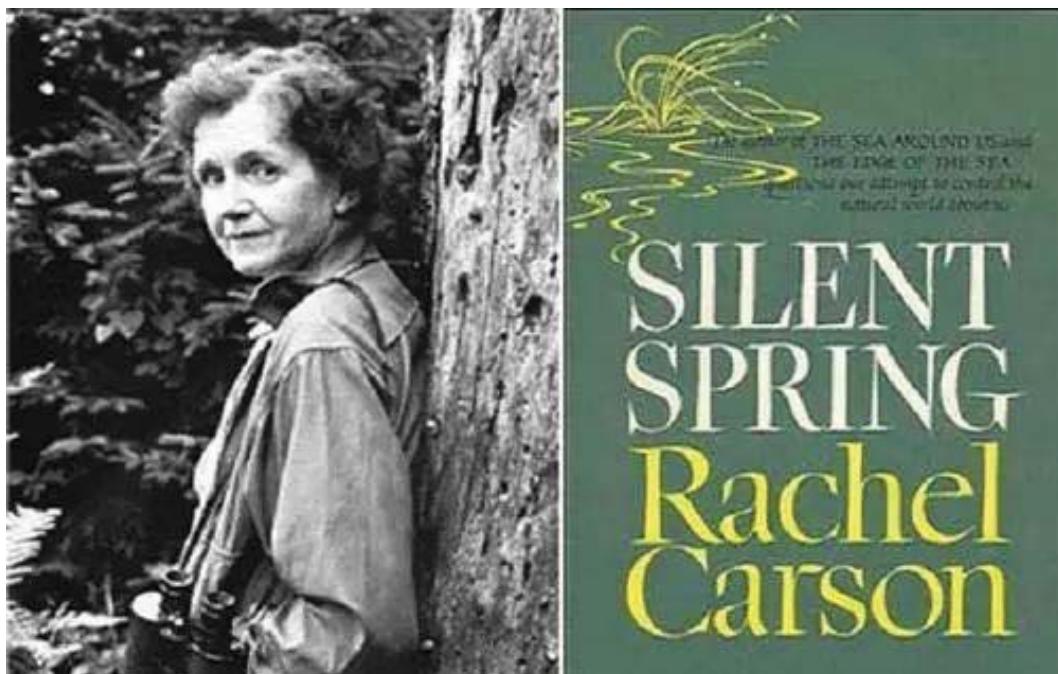
纪录片《孟山都安排的世界》海报

刘 我认为转基因问题突显了知识商品化的问题。知识服务资本，为资本所用，即一切都被利润的无边妄求及利润私有化的无情欲望所驱策，任何关于社会、人民的福祉都成了借口。但知识不是什么私有财产，而是公共的，其生产、流通及享用都不能脱离公共领域，不能不立足于集体性上，当然不能脱离田老师指出的伦理考虑。可是，我们看到转基因等问题，成为大企业躲藏在实验室内，假借科学和全民福祉之名，行商业牟利之实。把通过社会合作生产的财富私有化，不但脱离公共领域大众的监察、争辩，更造成社会分化、贫富悬殊、资源垄断、环境破坏等不公不义。若说知识生产价值，生产财富，参与其中的不仅有当前的社会合作和支持，还有前人的努力成果，其生命力更有赖后人的努力和创意。唯有肯

定知识的公共性、开放性，才能不断开花结果，私有化只会窒碍其立足于开放性的创造力，而作为共享、公共的存在，自然不能以私有财产、为知识而知识等理由自封为独立王国，不但要承认本身的集体性，承认大众的讨论和参与为其生命力，更不能沿用传统的所谓自主独立借口保障传统学科分立的藩篱。

举个例子。欧美社会运动比较活跃，要求食品商在食物上标签是否含转基因的物料。今年 5 月 8 日，美国佛蒙特州（Vermont）率先通过法例，强制食品生产商在食品上标签注明转基因成分。可是，孟山都（Monsanto）却以企业是法人，其自由表达的「人」权受到侵犯为由，拒绝披露信息，还扬言状告佛蒙特州政府。因此，有关转基因问题的讨论，不可能不涉及大企业，尤其是控制种子、粮食、食物生产的跨国企业的垄断史，同时也引领我们去关注全球的小农运动。例如在全球 73 个国家，有 164 个团体成员，代表 2 亿农民的「农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如何与跨国企业进行法庭诉讼，捍卫传统小农自留种子，保留农地，自定农耕方法，推进食物主权运动。

关于科学与科学主义



蕾切尔·卡逊与其《寂静的春天》

主持人 除了转基因以外，我们还看到好多生物技术在食品领域中在应用着。正如刘老师指出的，「转基因等问题，成为大企业躲藏在实验室内，假借科学和全民福祉之名，行商业牟利之实」。转基因的支持者和化学农业的支持者一直强调的合法性都是「科学」，我们该如何看待科学和科学主义呢？

田 如何看科学与科学主义，这个问题就更加久远了。早在 2002 年，我们就开过科学文化会，发表过「科学文化宣言」。科学主义一直是我们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我最近几年，反对科学的态度愈发激烈，我主张「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从「双刃剑」这个说法出发，可以很容易地得到一些结论。如果我们承认双刃剑的说法，在逻辑上就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一旦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应，则我们就应该说，科学技术给人类造成的麻烦大于给人类带来的便利。那么总的来说，科学技术就不是好东西，而是坏东西了。只要你愿意承认这种可能性，我们就可以讨论下面的问题，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到底有多严重。我提出一个问题，自从 1962 年，蕾切尔·卡逊（Rachel L. Carson）出版《寂静的春天》以来，全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是越来越多了，还是越来越少了？自从 1980 年代中国人开始有环境意识有环保理念以来，中国范围内，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是越来越多了，还是越来越少了？我也从科学史及科学哲学的角度论证过，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从来没有被新的技术所解决过，顶多是不产生以往的负面效应而已，而且，注定还会产生新的负面效应。这就是为什么，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我现在的结论是：科学和科学共同体事实上已经成为危害社会的力量，所以要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要建立起一种社会机制，防止科学对社会和地球生物圈的伤害。



刘 我认为除了权衡科学的正、负面效应，还要洞悉科学主义的逻辑及其运作的具体方式。举核电为例。2011 年发生日本福岛核电厂事故后，日本支持核电的民众比例从事故前的绝大多数，变成绝少数。俗语说：不见棺材不流泪。日本的大多数普通民众，在意外发生后，才惊觉所谓核电「安全」是这么一个大骗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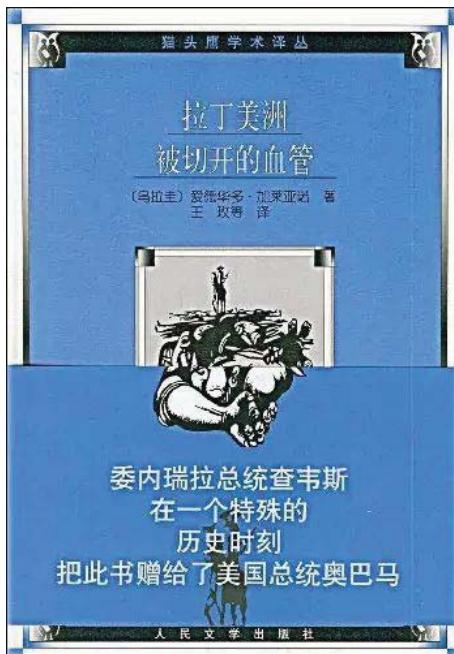
不管任何原因，只要电力中断，冷却循环系统停止运作，核燃料棒便会因为核裂变不可阻止而过热溶掉。福岛两个核反应堆溶掉了，人们根本不可想象，现在怎么办？有任何科学方法清理两个溶掉的核反应堆吗？没有。大众传媒不报导，政府当局和东京电力公司采取「集体失忆」策略掩盖可怕的现况，就等于问题已经解决了吗？我会追问，如果人类还未掌握控制核裂变的技术，却为眼前利益在全球建造运行无数核电厂，这是什么疯狂的逻辑？象生物武器一样，核技术从来都是武器，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了歼灭敌人，不惜搭上自己的安危。福岛事故，等于在日本本土引爆了核弹，核辐射的遗害已无色无味地污染土壤、地下水、海洋，恶果已然呈现。因此，科学主义要置于具体的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军事、政治、经济脉络中，才能理解人类如何被置于商业牟利和军事歼敌两大悬在头上的利剑威胁。

关于生态文明

主持人 对工业文明需要整体地进行反思，可是工业文明之后呢？人类将走向何方？在讨论可持续性发展和另类发展时，第一次南南论坛曾经提出过一个关于「生态文明」的构想。二位老师能否谈一下为什么会觉得对科学主义指导下的发展的困境问题，生态文明可以成为一个可能的、可持续的另类发展路径，生态文明的构想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又有着什么样的基础呢？

田 生态文明是人类的必由之路，如果人类不能走向生态文明，人类文明就会在很可见的时间内终结。关于生态文明，大体上我总结有三个版本。第一种是最简化的，把生态文明理解成一种产业。比如一个县，在农村建设农业文明，在城镇建乡镇工厂，建设工业文明，再把一个区域圈起来，建设生态园，就是生态文明了。这种理解不足多论。第二种版本是比较普遍的，认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的高级形态，通过技术发展、技术进步把工业文明改造成生态文明，比如把技术形态替换成低碳技术，把能源替换成清洁能源，把经济模式替换成循环经济，工业文明就自动升级为生态文明了。这种理解比较普遍。但是这个版本的生态文明是有害的，它在骨子还是建设工业文明，而且会贻误时机。这是一个科学主义的版本，其中对文明的理解与对科学的理解是对称的——相信进一步的科学发展能够解决以往的科学问题，而其所有目标都是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之下的幻觉。比如，所谓的清洁能源，根本就不存在。第三个版本则认为，生态文明是完全不同于工业文明的一种文明形态，是对工业文明的颠覆，从其社会目标到意识形态，从其社会结构到科学技术的角色，要做全面的改造。为此，首先要对工业文明进行彻底的批判，其次要从传统中汲取滋养。多样性的地域性的传统文化，是曾经存在过的可持续的文明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各地区尚存的传统文化，很可能

是未来生态文明的星星火种。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建设的是生态农业。



《拉丁美洲被剖开的血管》，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著

刘 我也倾向第三个版本的生态文明。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用造成问题的逻辑来解决同一问题，是行不通的。造成今天所谓「工业文明」（实为文明的毁灭）的灾难性困境的，恰恰是现代的科学主义。我同意田老师说的，首先要建设生态农业。我还要加一句，要建设生态社区（community）。近年来，我考察了印度、泰国、墨西哥、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建设生态社区的尝试，很受启发。「现代」视角对农村地区（尤其是原住民农村社区）是不屑一顾的，认为它们落后、愚昧、保守、贫穷、一无是处。可是，他们的物质贫穷不是从来如此的。Eduardo Galeano 的名著《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描述了五百年的殖民历史如何使拉丁美洲从丰饶变成贫瘠，至今情况并无扭转过来。但是，不少原住民农村社区遭遇支离破碎的情状，带着累累伤痕，却拒绝现代「工业文明」的福音，努力探索或重建以公共财富（the common）为基础的生态社区。2008 年，厄瓜多尔把地球母亲权利和人民食物主权写进宪法，为这场拯救人类、各种生物以及地球母亲的静默革命运动做出了法律的表述。

（本文节选自《饮食、健康与生态文明——营养学与“科学主义”的反思》，为刘健芝、田松、潘杰合著，原载于《绿叶》2015年第4期。）

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新范式

——迈向人类的共同幸福，乌托邦理想的未来实现

林子敏

编者按：

2012年12月，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国际研讨会于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举行，会议由西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岭南大学（香港）共同主办。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西南大学统筹城乡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岭南大学（香港）群芳文化研究与社会发展部承办。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北碚区文化广播电视台新闻出版局、亚洲学者交流中心（ARENA）、香港社区伙伴（PCD）协办。会议主题是：在探讨当前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的现状、机制及其对人民生计深远影响的基础上，集中关注作为民生基础命脉的“粮食安全与食物主权”议题，进一步延伸出“统筹城乡”、“乡土经济与社区建设”等可持续实践与包容性发展议题。根据大会专家学者发言和提交的论文，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编辑整理了《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一书（温铁军、周常勇、刘健芝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本书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宏观背景；第二部分：粮食主权与经济政策；第三部分：生态危机与公共品；第四部分：社区与农村建设；第五部分：中国基层实践经验；第六部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本书的编辑出版，正值中国乡村建设运动110周年，希望本书能够为中国未来乃至人类文明提供另类思考与实践的路径。

“乡村建设研究”公号将不定期选择文章进行推送，敬请关注！

网站：<http://commons.ln.edu.hk/southsouthforum/>

<http://www.southsouthforum.org/>

（为方便阅读，本文的参考书目与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阅《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一书。）

引言

资本主义以强调个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及虚拟金融化作为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在阶级斗争的彰显下伴随着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在意识形态对峙的后冷战格局里，新自由主义打着‘发展’的旗帜肆无忌惮的在全球迅速蔓延且横行

霸道并进行无情的噬掠，发展主义作为殖民者与特权阶级最有力的挡箭牌，对殖民地及第三世界国家的侵略暴行及剥削掠夺提供了天然合法及正当堂皇的理由。在殖民主义 500 年的历史中，生存在自然资源肥沃地区的美洲原住民人们，因而被无情残暴的抢夺以致种族灭绝、清洗，或生灵涂炭。在现今全球化金融资本的时代，高消费的行为模式支撑着泡沫化虚拟经济的运转。生存在地球上大多数的人们，因此而继续痛苦的遭受着资本主义所衍生的种种问题并付上沉重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地球资源被非理性的耗用而近枯竭及大自然因作为市场的「外在成本」而受到不断破坏的情况下，生态危机已经逐渐爆发、各国相继掀起能源争夺战，以及全球暖化、生态债务的转嫁等问题经已被放置在世界气候高峰会的议程之上。寻找另类可持续的替代性方案，成为了各国之间迫在眉急共同讨论的议题。



生态危机的揭示，资本主义体制自身的崩溃瓦解

近年，2012 年美国桑迪飓风、2011 年日本福岛地震、2010 年中国青海玉树、智利、海地及索罗门群岛四地均达 7 级以上大地震、2009 年新西兰南部及印度尼西亚尼西亚大地震、2008 年中国汶川大地震、2004 年印度洋 9.3 级地震并引发的特大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发生，正向人类揭示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自然资源的剥夺与自然的破坏，以及大自然所能承载能力的超负荷与不可再生。每每触目惊心、历历在目的自然灾害，都推进着各国气候高峰会的日程。可是，2012 年 11 月的多哈气候变化大会、2012 年 6 月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 峰会）、2009 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2007 年于巴利岛举行的欧洲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峰会，以及 2002 年在京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等，都一一地引证了资本主义逻辑的致命性概念及其制度结构性问题的被掩盖、避重就轻，或是泛泛之谈。发展进步观成为资本主义不断向地球无穷索取的幕后操手，快速的增长及欲望的贪婪正逐渐摧毁着地球。

自 19 世纪以来，垄断性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合性系统，不断增强其对普遍性事务的一切控制并紧握所有的生产系统。从 20 世纪 70 年代始，在体制结构上，生产资本逐渐转向金融资本，实体经济逐步移向金融投机。而列强各国亦由竞争性的帝国之争，慢慢形成以美国、欧洲及日本为首的三位一体集体性经济体系。直至 90 年代，完成金融资本全球性扩张。“普遍化垄断正主宰全球经济。 所谓的“全球化”，是指它们对全球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生产系统施以控制的一系列要求。这无异于帝国主义的新阶段。资本累积重心的转移，正是收入与财富不断向垄断集团集中的根源。这些利益大部分被统领其他寡头集团的寡头(富人统治集团)所垄断，为此不惜牺牲劳工应得的报酬，甚至非垄断资本的收益。”实体生产投资所生利润与金融投机利益之间持续增长的不平衡、严重落差，甚至脱节，构改根本性内部不平衡与冲突。

就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而言，其对地球的毁灭性远远的大于其对人类社会所制造与贡献的创造性。其致命性逻辑为以个体为中心、追求无穷的增长与利益最大化、资本的过度集中，以及过剩的剩余资本用作虚拟金融化投机，造成体制内的内在性矛盾而不能自我调节及修复致产生结构性内爆。根据甘地所说，世界富裕得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却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贪婪。《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里写道，“他们用尽一切方法，让我们相信：购物是公民的义物，掠夺地球的自然资源有利于经济发展，从而实现我们更崇高的利益。”其实，相信依靠高消费以维持高增长的生态平衡是一种愚昧和迷信，一直天真的认为快速的增加与商品化的经济逻辑最终会解决贫穷及治愈地球。“西方主流理论的所谓发展，意含两次大战之后在解殖运动中形成的发展中国家被纳入西方发展主义路径。其内在的前提，是把西方凭借殖民主义扩张构建的现代化当成唯一发展目标，并且遵循西方资本主义的既成模式。”而被殖民国家、部分拉美及非洲国家更是不断的向宗主国靠拢，依附其经济体系而生。可是，这显然是会终招失败而自我腐蚀的。爱因斯坦的名言曾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东西是无限的，一是宇宙，二是人类的愚蠢。而愚蠢和慷慨的不同是，慷慨是有限的。霸权国、寡头垄断国家、发展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及南方国家在不同程度上的拥抱金融化资本主义，在追逐债务的竞争场上相互角力而终致金融危机的爆发。虚拟化的汽球终在爆破的一天，2008 生金融风暴拉开了序幕。

随着后冷战时代的到来，普遍性资本主义体系不断的向世界每一处扩张，蚕食每国每一根的动脉血管。“这个体系一般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实际是普遍化资本主义系统，它是全球化(帝国主义)和金融化(为自我再生产所需)。这个体系正在我们眼前内爆。它明显不能克服其愈益严重的内部矛盾，注定要继续如脱缰野马，到处践踏。”「华盛顿共识」已失去当初作为一套经济理论，对拉美国家及东欧转轨国家的制约及实际的意义。西方国家致力营造的发展幻想，随着经

济萧条而逐渐幻灭。“发展主义一个重要信念，便是认为经济增长比不增长好，快速增长又比缓慢增长好。这种将“发展”等同“经济增长”，再将“经济增长”等同美好生活的信念”，本是特定的历史产物，但却被看作为普遍的真理，支撑着整套发展主义的话语，将丰富多元的人类需求和自然生态，约化成单一的向度，仅以经济指标来衡量。”其实，全球化的推演，也是全球媒体不遗余力在妖魔化落后国家，并竭力掩饰先进国家为她们所带来的苦难，然后大肆宣扬由美欧日主导的自由贸易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的蔓延性过程。

资本主义的崩盘呈现末日的状态，这是体系的终结、文明的末日，还是人类的末日呢？齐泽克则在其新书《末日生存》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终结会引致生态的危机、体制的不平衡致引发全球性的原材料争夺，以及阶级分化深化并爆发排外性的种族冲突和社会暴力。再者，对增长的无限追求、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对信息科技的垄断、对资本市场的操控及各国军事上的竞赛，更是将‘发展主义’推上极致和危险的边缘。更重要的是，人性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被扭曲，而人与自然之关系被异化分离。“卡尔·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启动了大自然及人类之间人为的及机械性的分离，以及再生性循环生态系统永久性的受损。按资本累积过程的定义，新陈代谢的破裂就是人类为满足其需要而与地球发生的物质转换，最终导至非理性的实践浪费及破坏。”由此可见，垄断性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及生态的层面上，都是不可持续的。

来自地球上多数人的抗争，世界各地热火凝结的社会运动

面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内爆及所衍生的种种问题，来自地球上多数生存在警戒线与面临温饱挑战的人们为了基本的需要，以各种的形式掀起了一场又一场全球性的抵抗。在全球中有无数的正在实践或成功的社会运动案例，带给世界上的人们无限变革的可能与想象的空间。印度的妇女互助银行（SEWA）、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中国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世界社会论坛、另一个达沃斯、在里约+20 举行时 30 万民众参与的民间社会论坛等等，均凝结了万千人们的力量，各人众志成城、团结一致地缔结出拥有新价值核心的抵制运动。没有革命的理论，只有革命的行动，结合人民抗争的经验与现实层面理论思考，从行动实践中见证变革的可能。

近两年，直指资本主义体制致生态灾难及金融危机的控诉，初登国际舞台并进入媒体的视野之中。世界各地不同社会群体都为了同一个需求 — “基本生存/生计”而作出抗争，以大多数人的名义呼喊生命与命运，以及人类的未来。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全球抗争的人们便以“我们是百份之 99%！”作为口号。除此

之外，原住民运动在国际的抗争舞台上继续跳跃出漂亮的舞蹈。原住民利用传统的集体民间智慧与创作的智慧，透过高度组织的动员方式，结合在地的生态圈与现实需求，在全球媒体的视野中突围而出。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秘鲁的普诺起义、南美洲原住民的地方自治运动，以及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地的原住民运动，均牵动着人们的心灵与盼望。在绝望挣扎的萨帕斯原住民们，高声呼喊“受够了就是受够了！（Enough is enough!）”。而在秘鲁普诺起义的原住民们，则在焚烧国会时打破在场来自全球所有媒体的一切摄影器材，以全面阻碍媒体报导的方式做出绝地反抗，以反对加拿大跨国矿业公司的入侵及对当地原生态所将要带来的破坏。如文章开端所言，追求增长是一种疯狂和愚蠢的行为，而污染性产业及生态债务向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地区转移更是可耻的举止。近年，原住民地区的原生生态面貌饱受跨国公司的侵扰。根据 Thomas Greco 的说法，债务必须以创建增长的需要为支撑，这样，迫使人类破坏孕育万物及生命的地球循环系统是无法避免的。另一名生态经济学家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Richard B.Norgaard 教授指出，在某程度说，富裕国家是在牺牲穷人的利益之上筑建的。穷人承受沉重的债务，是致其贫穷的原因。

庶民的苦痛埋没在历史的进程中或被重新书写，使享有特权的人在结构性的不平等的机制中处在天然的位置上获利而不需承担成本。按统计资料指出，美国西欧日本平均每人耗费的自然资源，是第三世界居民的 32 倍，这样，产生的废物也多出 32 倍。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亦指出，世界上 20% 的人口消耗了全球 80% 的资源。可见，资本主义体制内部性的不平衡，造成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们处于被压榨的弱势位置之上。在某一个意义上，无论是女性主义运动、原住民运动、同性恋传递运动，或者低层人士各种的运动，其实是一致的，关键在于共同采取的某立场——一种以低层人士、被剥夺者、被牺牲者及受害者被整个社会现代化、工业化边缘化的立场、一种被推到边缘，甚至无以为生的一种呼喊、一种对社会制度的批判，以及一种走向公平理想社会常有的价值观。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会技术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选择：是选取站在资本主义不断扩张深化下被牺牲、边缘化、排斥的大多数人的一方，还是站在不惜一切维护现状、维护其阶级利益的社会权贵和中产阶级的一方。前者不但被剥夺了幸福，还被夺去了维持温饱的生存条件。后者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逻辑推动下，不仅自满于以“现代美式生活方式”为准则的现状的追求，更是不断干出种种暴行…实际却是既得利益者中饱私囊的恶行，进一步掠夺牺牲那大多数活在不公义处境的庶民穷人。”其实，“这不是简单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不是强势的主体压迫弱势的主体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我”跟“他者（非我）”的关系，而是共处一个大熔炉中的强势与弱势的关系…植根于主导的现代理性的二分法框架中，以致庶民历史研究者无论如何渴望能聆听庶民的杂音，也会变得有心无

力。”庆幸的是，在弱肉强食的病态社会中，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们，正站在正义之上处于世界角落的某处努力的为美好的未来而抗争之中。“最黑的夜，最亮的光”。被幽灵化的人们，在被遮蔽的黑暗中如星星般发亮。“爱”，抗争者需要爱。引用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一句名言“对任何不公而发抖，引导革命者前进的是伟大的爱”。

改变、变革、革命一聚是一盘火散是满天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聚。革命的路是充满荆棘、未知与漫长的，唯有摸着石头过河才能悟出实践的经验。在资本主义体制运转的逻辑及民族国家独立建国的历史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及被殖民国家的人们被置在最末端及最低层承受着恶果的缠绕。在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之中，如何审视社会运动与变革者所能扮演的角色与功效呢？在媒体的渲染下，社会运动与变革被政治正确化或妖魔化。在宏观的考虑下，社会实践彰显得很被动与无力。其实，在实践中摸索才是实时行动的表现。通过面对当前的问题，尝试改变社会现状。改朝换代式的革命是不切实际的，如何从生活中慢慢改变自己及做出反思才是最重要和宝贵的。在此，引用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科学运动的一段话，“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政府，不是什么，而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无知，我们自己的贪念，我们自己无限的欲望，很多时候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在世界整个商品的逻辑推动之下，个体变成某一种商品追求的消费者。个体在消费中失去理性的判断，在欲望的海洋中迷失方向。因此，我们必须作出改变。甘地曾说，应从我们自己做起，从我们自己改变自己生活的习惯开始，走到一个简朴的生活，走向一个能够舒适、简单，但是能够安全的生活。他相信，只要印度每一个人自己种植棉花，自己织布，穿上自己织的布，这就是对抗美国殖民制度的一个最有力的武器。所以，当时甘地也非常自豪地说，他是怎样在他叔父那里学到织布的。在他织到一块小的布并穿在身上后说：“我是反抗帝国主义，反抗美国殖民主义的一个战士。”可见，甘地这位战士不是拿起武器，而是在最基本的生活上掌握社会的发展。其实，减少消费本身就是对资本化、商品化一个最好的批判。并在全球化的经济格局中，以本地生产与本地消费以抗衡资本与商品的集中化，以及学习简约、约束、节约的生活态度以免堕进全球化资源不可求输与生产力不断提高的陷阱之中。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每一个人心中的渴望，关键在于跟土地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保持尊重、爱惜与保护之情，让美好的自然环境世代相传。

对大地之母的守望，人类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

借鉴原住民有关人与自然之间的宇宙观，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是一种与生俱来、自然流露、与心感应的生活哲学。在生态、社会行为与文化价值的

话语里，“秘鲁普诺艾马拉村落的人们相信，所有生灵的生命都是重要的，因此我们的生活建立在与周围的生灵和谐共处的基础上，我们将维护农业物种多样性视为首要任务，专注于土豆、蚕豆、昆诺阿藜、大麦、燕麦等物种的播种，栽培方式—每种物种都有其独特之处。狂欢节庆时，我们祭拜动物、祭拜神明、祭拜种子，因为它们都是构成我们粮食主权的一部份。”在艾马拉村落生活的原住民们都认为，生命是相濡以沫的，所有人都是生来平等的。大地母亲泛指所有给予生命的生命共同体，所有的灵魂、生物、个体共存在一个由大地母亲所养孕的自然环境之中，在共同建构的美好社区里和谐共处，世世代代繁衍下去。在艾马拉原住民的宇宙观里，呈现了以万物为中心的文化价值观念，一种依附着土地，自然万物（大地母亲）、灵魂/精神（神明）与人类个体之间如海螺状交织的有机互动性体系（见图一）。地球间一切的生命体都有生存的权利，故此，相互间必需以平等的关系共处并予以尊重。此对应及冲击着以人类个体为中心的西方现代性宇宙观，以及以此为逻辑的资本主义体制核心价值。信仰支配着个体的行为，故之民族多样性的体现。在艾马拉原住民的宗教信仰里，世代一直保持以家族为单位的祭祀。通过对狂欢节，使自然与个体之间构成跨文化的互动。教育下一代如何聆听自然、与自然对话、感受自然与触摸自然是长辈对后辈的任务，也是责任。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务，均按照自然的法规来进行处理。如农业生产，会依照传统历法严格进行。保持生态多样性是艾马拉原住民保证粮食主权的重要策略，而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条件与环境是达至可持续生活的唯一路径。

在第一届南南论坛上，大会发表了关于南方国家生态文明方面的“3个S”基本主张，意思指只有维护资源环境主权（sovereignty）、加强南方国家的社会合作(solidarity)，才能逐渐促使世界回归以最基本的一可持续人类安全(security)为前提的生态文明。近十年，资源环境主权问题日益严重。在全球化金融资本的全面扩张中，自然资源被资本化使用。发展国家对境外资源的需求急剧持续上升，而引致大规模的暴力性掠夺。据统计资料，“地球大概在2010年8月的中旬已经耗尽了它自然地自我更新的能力。”抢先掠夺自然资源是未来各国的首要任务，维持其国民所需与国家建设的首要条件。“戴亚克辛斯（Wim Dierckxsens）评论说：「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不但倾向剥夺世上大多数人的生活，它甚至毁灭环绕我们的自然生态（2001）」”在虚拟化泡沫爆破使全球经济滑落引致产业转型，以及能源危机掀起全球性争夺能源的情况下，部份原住民地区逐渐丧失对资源主权的控制，或在资源管理政策决策权与能动性上大受压抑。其次，粮食与能源的私有化、现代技术对种子与化学肥料的控制，都严重的敲起人类安全的警钟。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与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已经到了地球难以承受的阶段。正因如此，大自然的权利与生物的多样性的问题在农业文明时代后，重新进入社会公众的眼帘并引起国际间的关注与议论。

“2011 年在科恰班巴（Cochabamba）举行的气候高峰会，许多文本（包括会前的预备文件及会上不同团体及个人的发言）均超越了「大地之母」这意象的比喻性质，而赋与她有能聆听，能回应及能被爱等人类生命特质一及由此，她也有属于她的权利。最终的文件提出重新评估普及的智能及先祖的知识，呼吁我们「确认大地之母为生命体，而我们与之有着不可分割、互相依存、互为补足及灵性的关系」。透过许多原住民的宇宙观框架，文件强而有力地点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强调了这关系本身的母性（女性）特质。”除此之外，“联合国大会主席戴斯科托（Miguel D’ Escoto），在 2009 年便于其离职演说中，提出「大地之母与人类普遍宣言」。同一届联合国大会亦于较早前由 192 个国家一致通过设立「大地之母日」，当中包含着人乃是大自然一部份这观点，而这两者应构成共生而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人类作为社会实践的中介，不同国家、种族、阶级的人们都应对地球负上应有的责任与共同保护。

后资本主义新范式的建构，恢复传统的生态文明

自然环境作为资本主义体制的「外部成本」已遭受破坏，人类生命安全成为体制成本转嫁的对象饱受威胁。在现如今冷战之后的时代里，建构一个冲击资本主义体制与根本性方向转变的新范式被呼唤。“修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功能障碍、宣传绿色资本主义、监管金融市场、以发放援助的方式对抗贫困、制定越来越军事化的安全系统以及惩处异见者，都只是调适现行制度的方法。”新范式因将拥有多样性的本质以能让不同可能的形式共冶一炉，在制度性过渡所创造的有效互动空间里相互碰撞。重新建构国际主义以对抗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话语阵线、重新建构国际可持续的地方创新、在南南的认知基础上重新建构南北之间的对话、重新制定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国家模式或社会政策等等，均为开放性的议题与可能性的实践。“回应当代资本主义内爆的历史时刻，南北世界的激进左派需要大胆提出可以替代这个系统的政治构想。这个历史时刻需要大胆和彻底的另类替代作为惟一有效的回应。它要能推动工人和人民奋起反抗，击败对手诉诸战争的策略。建基于对当代真实资本主义的分析，这些构想需要直面我们要建设的未来，舍弃对过去的眷恋，打破身份认同或共识的幻象。”在后资本主义的年代里，一切方案都是可能被接受或议论的。在意识形态话语尚未建立的前提下，在制度性过渡中观察与实践多样性的可能，推进革命的日程。

生态文明作为后资本主义新范式的重要面向，能诱发具有生命力的知识生产与自主创新。生态文明被喻为人类的文明，是一种共有的生活方式、一套有别于生产的价值系统，以及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状态。古老传统的经济智慧与生活经验，在现行超越地球可承载能力的制度体系中被摒弃。在有限的自然资源抢

夺及置于拥挤的有限自然环境中，地方性自主创新无法在旧有生产力竞赛的模式里应运而生。面对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必需创造以在地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以农村作为支撑与劳动生产单位，重新激活、创造与分享有关生命价值的讨论与话语、重新建构新的社会体制架构、新的知识类型，以及重新塑造新的文化价值系统。人民力量作为新的历史主体，有助传统农耕文明的重新复苏。千千万万的南方国家与新兴国家的农民与工人们，正努力的扞卫土地的主权，以传统的智慧与经验尝试退耕还林、丰富生物的多样性以恢复农耕文明。在资本主义体制崩溃的历史进程之中，共同等待一个拥有能包容更多面向及更多元的体制建立。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政策的现实实践层面上，有益于人类的发展。

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无法选择的选择的地步，亦即不可能再有选择的末日了？还是，处于黎明前的黑暗，在充满幽灵和鬼魂的灰色地带，闪耀着人们的希望，亦即在绝望的挣扎中等待着人类下一个春天的到来？在黑色与白色之间存在的灰色危险空间，赋予了我们富有创造力的变革的可能。正如罗兰·巴尔特的零度写作所讲述的文本游戏一样，作者与读书在文字的迷宫中迷失，游荡在极乐的世界之中而达致完美的沟通。究竟在充满谎言效果的意识形态格局里，人们又能如何呼喊着他/她们的未来？面对末日世界的到来，又如何做出创造另类的可能实践呢？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心中存在着一份追求与渴望。我相信，站在呼吁和呼喊的立场之上，个体之间能够共同的创建以新范式引领的美好未来。爱因斯坦曾言，我们不能以我们所创造的相同思维来解决因此而生的问题。在意识形态的幻觉之中，我们必须重新建构新的范式。

谋求共同的幸福，乌托邦理想的实现

人类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新阶段，建立以此为导向的新范式。物质文明的时代将告终结，人类共同构建以共同幸福（Common Good of Humanity）为核心价值的体制。“它考虑到数以百计预示人类共同利益的新典范：即人类共善，亦即具备无穷的文化表达，及在一个公正的社会跟自然和谐共处——换句话说，就是呼吁一个值得致力投身的乌托邦。”根据 Michael Hardt 教授所言，真正创新性的转变来自对文明模式的重新调整，而成功的关键在于个体在减少对原材料耗用的前提下对幸福感的提高。在这问题上，更多的是定性及质上的转换。而重新想象社会的中心任务是，建立一套替代性另类管理共同财富的机制。其实，在原住民的宇宙观里，「幸福」与社区集体性生活紧紧的扣连着。如上文对艾玛拉族原住民宇宙观所分析的是一致的，大地母亲、灵魂与人类个体在土地之上建立如海螺状的和谐关系，而社区作为集体生活的单位承载着一切的社会文化事实。“对于「大地之母」（Pacha Mama）、盖楚瓦人（Quechua）的「过好活」（buen vivir），

及艾玛拉族（Aymara）的「共同好好过活」（living well together）的参考便属于这个范畴。两者均是许多原住民的原初基本概念；在不同的具体历史处境，它们都代表着一种特定的宇宙观，亦代表着尊敬大自然及共享集体生活的实践。”

正因如此，我们必需以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作全面考虑，重新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尊重及守护的态度对待大地母亲、重新强调生活必需的生产与改变现有的生活模式、重整集体生活与集体性社会意识、以及重新确立相互文化主义与文化价值观。在重新定义文化价值观方面，值得深入反思的是，在大众拥抱资本主义文明核心价值的同时，在西方的神话中个体逐渐丧失了自我表述的权利。那么，如何在霸权布的话语结构中重新定义核心价值是重要的。在被再现与诠释中，重新定义“正义”、“公正”、“平等”、“希望”、“理想”、“梦想”、“快乐”与“幸福”。以上各种的文化价值是构成美好生活的元素，在不断的重新定义中反思生活的真正意义。乌托邦的追求并不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和举止，其实，是人类向前迈进的理想与动力。关于乌托邦，爱德华度，加瑞安奴写到：「我向前走两步，它却移开两步。我向前走十步，但水平线又后退十步。我永远都可向前走，但我也永远无法达到。乌托邦有甚么作用？正是：为了向前迈进」（引自 Maurice Lemonine, 2010）乌托邦理想的实现并不是梦，我们可以做出改变，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We can make a difference.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2016元旦纪事——中国石门坎

汪永晨 文图

想去石门坎很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人类学家沈虹在那里做了 15 年的田野调查。

石门坎的出名，要追溯到 100 多年前的 1910 年。那时从国外往石门坎写信，只要写“中国石门坎”就能收到。那时的石门坎就是这么牛。

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为大江大河山村的小学捐书十年了，从 2011 年开始我就和沈虹说，你在石门坎找五个学校吧，我们为那里订孩子们看的报纸和杂志。五年了，直到今天也没能实现，因为：

今天的石门坎，不通邮。



邮政代办点遗址



石头上的石门坎



石门

1905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开始在贵州石门坎兴建学校。早在1904年柏格理牧师到石门坎勘查地形，向彝族土目安荣之索地，说明只需购置“一张牛皮”之地，安土目以为微不足道，即作赠送之允。

柏牧师于是将牛皮割为细皮条，围地丈量，竟然得到土地八十余亩，令安土目瞠目结舌。第二年基督教循道公会正式在石门坎开始传教兴办学校，这便是石门坎选址的传说。

从石门坎走出的第一批小学毕业生开始，返乡教学几乎成为所有石门坎学生的选择。他们往往外出攻读本科甚至博士学位，然后回到学校教书。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文革”前，石门坎学校的历任校长，都曾是该校毕业生，而且都有本科以上学历。



今天石门坎的孩子



今天的孩子对书依然如饥似渴



今天孩子的眼睛里看到的是什么

石门坎学校第三任校长朱焕章曾卖马送学生出去继续深造，在这样的表率下，众多学子义无反顾地返回石门坎，再由石门坎源源不断地把学生输送到石门坎以外的苗族地区，使贫穷的石门坎得以成为苗族的文化中心、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人才中心。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硕士张有轮谢绝母校的挽留，回到石门坎教书；博士张超毕业后，曾放弃大城市大医院的工作，回到石门坎行医，为苗人治病。

半个多世纪以前，位于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最西部山区的小村，一度从偏远落后的状态，一跃变成“中国西南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曾经担任过威宁县教育局局长的杨忠信称，自从1905年传教士柏格理将现代教育带入这个村庄时开始，在那些长满杂草、如今被用来拴牛的地方，曾经生长出一枚中国早期最优秀的现代教育的硕果。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这种教育还远近闻名。

2016年元旦，绿家园志愿者还在去石门坎的路上，就听来接我们的当地的文化老人张国辉告诉我们：今天国家教育体制实行撤点并校后，石门坎的新龙小学，因学生太小，难于到远处的学校上学，住校，而年轻分配来的教师又难于留在这偏远、贫穷的小学，小学一度也被撤了。经过乡亲们的抗争，最终总算留了下来。

没有老师怎么办，两位已经退休的老教师挑起了这重担，承担，坚守教石门坎这个小村庄里的60个孩子。而像这样的小学在石门坎不止一个。我们在小学和孩子们拍照时，两位老师都不愿意特意出现在镜头前。



今天我们带到石门坎的除了书

还有衣服和彩色画笔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沈虹的学生杨欣萌随后给我们发来了他们在石门坎做的一份调查报告。我挑了其中一些内容：

一、新龙村贫困程度

贵州省最边缘、最贫困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威宁县）是国务院确定的“连片特困”地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是西南贫困边远山区少数民族集中的地方；也是贵州省唯一由三个少数民族自治的县，全国五个由三个少数民族自治的县之一。



第一次见到彩色画笔

威宁县农民均收、草海镇居民纯收入和石门乡农民纯收均低于国家农民均纯收入，且石门乡农民均纯收与国家农民均纯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门乡的贫困程度是威宁之最。

新龙村属高原中山地貌，地形起伏大。全村平均海拔 1800 米。全村总户数为 335 户，总人口为 1224 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 442 人，主要是为苗族。2009 年，新龙村有劳动力 1203 个，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小学文化 96 人，初中文化 30 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 3 人。文盲半文盲居多，劳动力主要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外出务工的人员少。新龙村人均纯收入为 2417 元，低于国家贫困标准线近千元。

2014—2015 年，调研组在极度贫困的石门乡观察到苗寨小学遭遇撤点并校、苗寨村民集体反抗的过程。石门乡因小学教师资源不足，无法兼顾到每一个教学点。与石门乡其它学校相比，新龙小学因学生人数少成为撤点并校的首选。但是，这一决定遭到新龙村民集体反抗。两位退休老教师（74 岁、70 岁）寒冬天带着学生在学校操场上坚守学校有三个月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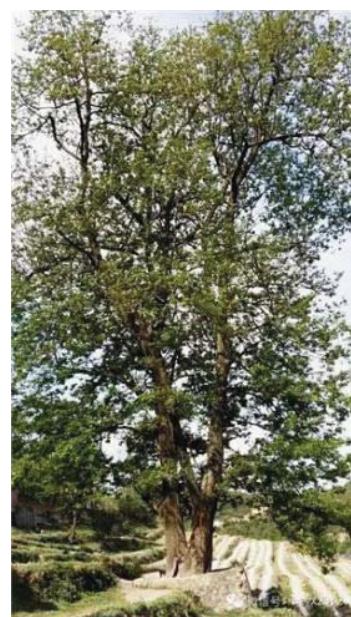
相信每一位新龙村民都不会忘记，他们曾经流着眼泪讲述的故事：在宽敞明亮的教学楼前，（学校撤点了，教学楼也就被封了）两位退休的老教师在学校操场的坝坝上指导学生学习。而这些蓬头稚子穿着单薄衣服不抵风寒，或趴或坐地练习生字。在他们身上两米远矗立着的宽敞明亮的教学楼却被锁得死死的，他

们谁都不能进去。阴天下雨，这两老教师和正在学习的孩子，只能到教学楼的楼梯口里躲着学习。

村民代表与石门乡教管中心、石门乡政府进行三次据理力争地辩论，更到威宁县教育局“上访”才使新龙小学恢复办学。新龙村距离威宁县城有 160 公里，村民代表一来一去需要三天。村民代表出发之前，两位退休老教师将村民凑来的两百多元钱交给村民代表，那是他们的路费和路上吃饭的饭费。这是新龙小学办学史上第二次为守住这所小学，村民去威宁县教育局请愿。

新龙村民代表百般周折到威宁县教育局向他们并不知道是谁的领导反映情况，言辞恳切、据理力争。村民代表将近三百位村民签名的联名信交给教育局的领导，证明留下新龙小学是“众望所归”。终于，新龙村民盼来了新龙小学恢复办学的消息。但是，石门乡教管中心只派来一名特岗教师来主持学校事务。冗杂的行政校务经常让新上岗的老师分身乏术，学生的课还是主要由两位退休老教师义务来上。

代课教师曾是石门乡基础教育发展的脊梁：代课教师数量多；本土教师培养下一代，是需求和贫困的产物。据调研组在石门乡的调查，代课教师大多都有过“一师一校”的经历，他们平均每周上 35 节课还要处理日常校务。他们竭尽全力地付出并得到相应的报酬，代课教师的工资仅是公办教师工资的十分之一，且差距越来越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应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收入。实际上，2010 年，石门乡基层公务员每月工资 3600 元，代课教师的工资仅为 450 元，是公务员收入的九分之一。



柏格里先生当年播下的种子已经长成参天大树



右二为沈虹

绿家园志愿者元旦假期，爬山涉水到了石门坎，我们先是感叹当年的传教士是怎么走到这大山深处的；然后就是深深地感受到了这里的孩子对我们，对我们带去的书的期待。

如果光是听沈虹说，这里的孩子从来没有看过任何课外读物，我们是无法体会孩子们的渴望的。当我们见到孩子们为我们盛装，为我们舞唱，为我们冻得小脸红红的时候，我们中有人说：直接泪奔。一位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捐书活动的北京年轻人在石门坎小学被一群孩子围着时说了5个字：世间有真情。



为我们而唱



为我们而穿



为我们而跳



为我们而举

英国传教士伯格理把自己热爱的足球运动也带到了石门坎，这让石门坎人的足球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近闻名。

除此之外，伯格理还重视体育精神，30年代的石门坎有着完全按照现代标准设置的运动会，这成为石门坎在当时最引人注目之处。无论是柏格理还是他的继任者，都在发展教育、文化、技术、经济的同时，把体育放在很高的位置。学校除了开设有文艺课、体育课，还开展足球、篮球、乒乓球、排球、游泳、爬山、拔河、田径、骑马、舞蹈、歌舞等多项活动。

这样的辉煌，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当时，贵州省毕节地区参加国家和省足球比赛的队伍中，有一半以上的队员出自石门坎。当地许多人说，在1936年举办的柏林奥运会上，中国足球队中就有来自石门坎的队员。而在1959年的国家足球队里，石门坎人也不在少数。



版子上的石门坎



柏格理



当年的楼还在



1904年



1906年，柏格理先生与石门坎第一批小学生合影。

1906 年



1942年，石门坎学校正在吹小号的学生。

1942 年



1947 石门坎幼儿园的孩子们 Steele牧师摄

1947 年

中科院社会人类学家沈虹研究员在石门坎做了 15 年人类学研究。沈虹告诉我们，今天这里有苗族、彝族、布衣族、回族、汉族、菜家人。

2015 年夏天，沈虹从北京给今天当地的孩子带来了今天的孩子们从没见过的足球。可是沈虹说，很遗憾，今天的石门坎的小学连个足球场也没有。孩子们还是没办法踢。所以你们元旦去也不用带足球给孩子们了。

石门坎的文化老人张国辉还告诉我们：1905 年至 1949 年，教会在石门坎修建的学校、教堂、宿舍、办公室、医院等建筑 40 余栋，另外还建有足球场一个、游泳池一个、操场二个，占地面积约 15000 平方米，在这些建筑中，有中式建筑的特点，也有西式建筑的风格，形成了一组具有中西结合的近现代建筑群。教会除建 16 所教堂外，还先后在威宁苗族地区创办了 1 所初中、3 所完小、19 所初小，共毕业了 18 个高小班、6 个初中班，培养了上千名小学生、上百名中学生、十余名大学生，当时，石门坎被称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

石门坎的文化老人，且当了一辈子代课老师的张国辉在带着我们一路走同路看那里当年的遗址时，很感慨地说：由于地震和人为的破坏，再加上年久失修，多数建筑被毁，现存建筑只有女教师宿舍、长房子（办公室）、石房子（牧师宿舍）、小砖房（教师宿舍）、麻疯病院、足球场、游泳池和柏格理、高志华墓。

当年女教师宿舍



破败了



这里原来是花园



这样的弧度可以防地震



石门坎文化游

因为沈虹在那里 15 年的田野工作，我们除了在小学受到了热烈的接待以外，乡里的两位领导还特意放下繁忙的工作来看我们。

当时我们正走在这些年久失修和被毁的遗址中。我不客气地问两位乡领导：今天的教育为什么还不如一百年前。你们就不能为那所好不容易留下的学校派去老师，非让两位 70 多岁的老人在坚守？

两位领导先是以官腔对付我们，实在看我们这伙子人是真想为当地的现状问问责的。只好说：别说教师，就是我们乡里的编制还严重缺员呢？公务员考试来这儿的都是当跳板，考上了，干不了一年，就调走了，这么穷的地方，这么偏远的地方，没有老师，是我们这些乡干部解决不了的问题。



石门坎



石门坎



帮我们说说，这儿的孩子也要学文化呀



走着



今天的学生

沈虹在她的《石门坎，一个村落的本土与世界（纪念柏格里先生逝世 100 周年）一文中说：

创造了众多奇迹的石门，如今安在？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自然灾害和政治洗礼，许多老房子化为残砖碎瓦，许多老人消失在尘埃里。今天来石门怀古，已经难觅当年“我华校旗树黔疆”、“齐声高唱大风 汾汾”的盛况。村民、学者、信奉者和寻访者被这个荒远地方吸引，纷至沓来，并使用不同语言符号记录了他们的跋涉和思考。

曾经开启石门的老苗文，如今安在？

五十年代以后，教堂式微，学校也停止讲授苗文。新苗文创制出来后，老苗文逐渐散落民间，栖身草房漏檐之下，父子相传、夫妻相传，借助于地缘和亲缘网络顽强 生存。甚至在与石门坎远隔数百里外的毕节、纳雍、武定，在千山万壑中，在苗家茅草屋里，我都遇见了老苗文的行踪。虽然给一双双黑黢黢的手呵护得发皱，给一个个沾着泥土的衣袖摩挲得变黑，那些寄托了苗族情感的文字依然面目清晰，静静注视着世界。

经历了沧海桑田，百年石门不知何时再开？

有人说，石门坎就是一个用信仰和文化活生生改变的样本。到底怎么用信仰和文化改变和更新社会，就看石门坎吧。

如果以此类推，今天的石门坎是不是也因信仰和文化的缺失而需要我们去给孩子们送书呢？沈虹问百年石门不知何时再开？我想问，这样的送书，捐赠何时会成为多余？



送



想看是么（唐小鸭摄）



看



谢谢 (唐小鸭 摄)

本来石门坎的文化老人张国辉给我们订了住在石门坎的旅馆。可是我们走进去后发现，实在太冷了，我们非常的抱歉没能住而连夜走山路去了昭通。明天我们将要去看的是，我 15 的前采访过的全世界 15 种鹤中，我们中国特有的黑颈鹤的越冬地——大山包。



丽水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2016年4月29日在研究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

庄启俭

各位会员、理事：

光阴荏苒，“研究会”自2015年4月30日成立，已一周年。回顾一年来的工作，可以骄傲地说，喜讯频传，硕果累累，我们在组织建设、科题研究、经费筹集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下面我代表理事会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

一、组织建设与开展活动方面

在丽水市档案局、民政局的关心和支持下，3月12日，市民间社团组织管理局同意成立“丽水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筹备组的同志经过一个半月时间的紧张工作，于4月30日在“城市左岸大酒店”隆重召开了成立大会，完成了大会的各项议程，通过了《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又选举产生了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及正副监事长。

成立大会以后，我们根据社团组织管理的要求，办理了相关注册登记手续和银行开户。

会员队伍不断扩大，目前止已有68人。

我们多年要求成立“组织”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它是浙江省第一个地级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组织。它将是我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市在开展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史料调查工作上的又一个新起点。“研究会”的成立更有利于对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史料调查工作的深入开展，这项工作必将会取得更多的成果。

期间，我们又先后召开了三次理事会、监事会会议，一次是2015年5月8日，在水南村俞寿俊家里（老俞请客），通报了办理“研究会”注册登记、银行开户手续情况。讨论了向市政府报告要求支持的资金的意见。

第二次是 2015 年 7 月 25 日上午，在丽水市望湖山庄召开，在丽的本届理事会、监事会理事 16 人参加会议。会议主题是通报研究会成立大会之后的工作情况，研究下阶段工作安排。

会议充分肯定了前段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并就下阶段工作开展进行了研讨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当前的工作重点：一是要制定工作计划，明确工作目标，抓住“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这个契机，开展相应的活动，借力新闻部门，形成社会影响力，提高“研究会”的知名度；二是要群策群力筹集资金，活动经费是开展工作的基础，无米之炊寸步难行。副会长胡红霞的爱人李志彪同志还热心为“研究会”筹集资金出谋划策，计划在淘宝网上作一期“治疗烂脚病义卖捐款”活动。

第三次是 2016 年 1 月 3 日，在联城镇政府会议室召开，通报飞机场周边村庄被日军烧毁房屋财产赴杭向浙江省高院提起诉讼的情况，研究布置下阶段进一步扩大开展调查范围的任务。

“研究会”开展工作以来，相继发了“丽水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一次会员大会会议纪要”、“关于庄启俭等同志任职的通知”、“关于‘丽水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会员费交纳标准的规定’的通知”、“关于要求安排‘丽水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专项经费的报告”、“关于组织开展‘二战时期烂脚病治疗活动’的通知”、“关于组织开展“抗战时期飞机场周边村庄被日军烧毁房产损失调查登记”的通知”、“莲都区碧湖镇片区“纪念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座谈会”会议纪要”等七个文件，部署了有关工作。

制作了“通讯录”、“会员证”，开展了会费的收取工作。

据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丽水市委员会办公室丽政协办【2015】44 号文件，“关于增聘朱土兴等八位同志为政协丽水市第三届委员会文史委员会聘为特邀委员”通知，我会庄启俭、朱祖新、周率三同志被列其中。

二、积极开展集资募捐活动

5 月 15 日，我们拟发了 4 号文件，“关于要求安排‘丽水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专项经费的报告”，开始想通过信访渠道向市政府递交《报告》，市档案局领导得知消息后，叫我们不要走信访渠道，后来我们将报告直接报送黄志平市长收。9 月 15 日，获悉市政府领导批示已转市财政局安排经费，叫我们联系档案局打报告报计划预算。12 月底，实拨经费 5 万元，由档案局管理，说明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市政府的肯定与支持。

“研究会”成立大会筹备期间，王选、吴寿荣、俞寿俊、汤联均、梁苏英、胡红霞、林春法、张惠军、张萌芽、张土儿等 10 位同志捐款 16000 元。“研究会”银行账户开通以后，我们就积极开展集资募捐活动，联系了好几家单位，有所收获，到目前止，共集资 11600 元，其中恒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3000 元（联系人庄启俭），老百姓大药房 1000 元（联系人庄启俭），莲都区慈善总会 5000 元（联系人朱祖新），云和县档案局 1000 元（联系人雷云中），遂昌县档案局 800 元（联系人蓝翔宇），松阳县档案局 800 元（联系人李根亮）。在此，对以上同志表示感谢！

副会长胡红霞的爱人李志彪同志还热心为“研究会”筹集资金出谋划策，计划在淘宝网上作一期“治疗烂脚病义卖捐款”活动。后来在丽水书法爱好微信群里发起捐款活动，筹集资金 18000 元（其中成本费用 4680 元）。

三、组织“烂脚病”救治活动

2014 年底，在著名社会活动家王选的呼吁下，上海王正国创伤医学发展基金会、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的付小兵、陆伟雄、肖玉瑞等专家积极响应，组织开展了“二战遗留烂脚病救治活动”，我市先后推荐付君华、叶阿庭、何有武、何遗祥、何兰明、兰昌盛、夏德连、徐朝顺等 9 位烂脚病患者赴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2015 年 3 月 30 日，上海王正国创伤医学发展基金会、中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救治志愿团队在金华市中心医院召开“二战遗留烂脚病救治第二阶段推进会”，会上提出要求在当地医院开展治疗。会后，我们积极与市民政局、市中心医院有关领导沟通联系，在丽水市中心医院开展了救治活动。6 月 15 日，在丽水市民政局、市中心医院领导的关怀下，我市夏德连、胡祝仁、俞冬英、郑兰富、陈观源、兰昌盛等 6 名细菌战受害烂脚者入住丽水市中心医院 14 病区接受免费治疗（其中胡祝仁、俞冬英、兰昌盛中途自行出院）。经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先后出院，

在丽水市中心医院救治的 6 名患者共花治疗费 99140.15 元，社保报销 56380.11 元，剩下的 42760.04 元由市民政局给予解决。赴上海救治的 9 人，共化治疗费 161345.98 元，社保报销 30505.53 元，其余部分 130840.45 元由腾讯网募捐解决。

10 月 14 日上午，著名社会活动家王选率上海专家肖玉瑞、陆伟雄、吴敏洁等一行来丽回访“烂脚病”治疗患者，受到了本会及丽水市中心医院领导的热情

接待。从前年开始，丽水市中心医院团委组织一批青年志愿者开展“暖心帮扶”活动，坚持每月下乡为烂脚病患者送医送药。进行后续护理服务。

除救助工作外。还开展关爱活动。5月29日，丽水市慈善总会会长崔建宏、副会长陈秀珍等在市档案局会议室慰问付君华、冯欢喜、夏德连、何遗祥、何有武、李玉轩、叶阿庭、兰昌礼、何兰明、徐丙翠等10人，向每人发1000元慰问金。

春节前组织了三次慰问活动。1月3日，在联城镇召开慰问大会，慰问品由丽水爱好者微信群捐款提供，书法家还无偿为细菌战受害幸存者书写春联。1月11日，参与丽水市红十字会“救助慰问”活动，向莲都区，遂昌县、松阳县、云和县发放慰问品（大米、油、被子）30份；1月15日，参与莲都区红十字会“博爱送万家”活动，在碧湖镇、联城镇分别为细菌战受害幸存者送上慰问品大米、面干和油。

四、积极开展和参与“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积极开展和参与“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

2015年5月1--2日著名记者南香红到丽水采访细菌战幸存者，提议社会募捐救助。庄启俭表示积极支持。

5月30日至6月2日，央视九台、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摄制组章京导演来丽采访拍摄侵华日军细菌战史料题材，现场采访了会长庄启俭、市疾控中心兰玉清科长，细菌战受害幸存者联城镇长濂村冯欢喜、白前村叶月英、林宅口村封凤友、周德全、凤鸣村张国庭，碧湖汤益友、徐丙翠。拍摄了长濂村、白前村、大水门、太平桥等遗址和周巷村的鼠疫监测点。

7月27日，丽水市委宣传部、丽水市社科联举办第79期人文大讲堂，特邀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冯筱才主讲《人年一梦——人民抗战史》，我会组织人员参加。

8月20日，我会下发“关于在全市认真开展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市、县、区及水阁、莲都区碧湖、联城片区研究会在9月18日之前，组织以座谈会、报告会等形式举行纪念活动。活动期间要把关心关爱现有受害幸存者结合起来，动员社会力量，力所能及为他们送温暖，解决实际困难。

8月27日，丽水市社科联组织在云和县举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活动。我会会长庄启俭、副会长胡红霞应邀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发言。

8月28日下午，丽水市卫生计生委、丽水市疾控中心、丽水市预防医学会联合在丽水“新世界大酒店”主办“丽水市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暨鼠疫防治宣传活动座谈会”，我市各区、县的鼠疫防治专家参加座谈，我会庄启俭、梁苏英，吴寿荣应邀出席。丽水市疾控中心鼠疫防治专家陈荣富、会长庄启俭作抗战时期丽水鼠疫流行研究专题发言，对侵华日军在丽水实施细菌战导致鼠疫大流行基本上达成了共识。1942年8月28日是侵华日军在浙赣沿线散播细菌的日期，我省卫生防疫部门在丽水、衢州、金华同时举行座谈会，具有一定的深远的意义。

为铭记历史，8月29日，庄启俭、吴寿荣、梁苏英到双溪镇库头村探寻当年日军侵犯丽水时行军路过库头村拍摄的一张照片原址，及通往武义的崎岖山路括苍古道。还到西溪村参观了1942年7月村民消灭十多名日本鬼子缴获的实物陈列馆。

9月13日，庄启俭、吴寿荣、梁苏英、黄丽春、潘立成、朱联民等到雅溪山区探寻当年日军侵犯丽水时行军路过梅田古道拍摄的一张照片原址。在太平木后村了解到抗战时期，村民奋勇抗击日寇的动人事迹，还意外地发现了太平村村民赵利收藏的日军军用刺刀。

9月22日上午，莲都区碧湖镇片区“纪念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座谈会”在镇政府五楼会议室召开，抗战老兵叶以南、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幸存者程献春、叶火明、张国庭（联城镇的代表）、林春法（水阁片代表），及受害者家属汤连均、纪建昌、沈宗根、江作明、梁玉清、周进坤、兰光青等参加座谈会，镇党委纪检委员凌娇岳同志代表镇党委、镇政府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老同志们畅所欲言，大家回顾了抗战时期碧湖镇鼠疫流行，造成许多家庭全家死绝，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的悲惨情景，义愤填膺地痛斥了侵华日军的残暴行径。梁玉青控诉说，四岁时母亲白天到邻村看戏，发热后，回来夜里就死了，妈妈放进棺材，他抓住棺材头，不让盖上，拼命死哭，不让妈妈放进去；张国庭回忆了六岁时日本人搜山逃难的亲身经历。座谈会上，代表们强烈谴责安倍政府否认二战侵华历史，依然在执意参拜靖国神社的战犯亡灵，依然在发表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言论，依然在藐视历史事实和国际正义，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搞解禁集体自卫权；渲染中国威胁论，通过美日同盟，插手台湾事务，在钓鱼岛与中国对峙，在“西南诸岛”进行军事部署，并插手南海，扬言将派遣舰

艇巡航。9月18日，日本参院还通过了相关安保法案。这些做法，不仅违背了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承诺，而且背离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大家深刻地认识到，祖国要强大，才不会被欺负。今年9月3日我国举行的阅兵式，场面壮观，亮出了国威，大家感到扬眉吐气。

座谈会上大家还提议，丽水是侵华日军细菌战重灾区，应该建造一座纪念碑，把死难同胞的姓名篆刻在碑上，作永久纪念，也作为关心下一代的教育基地，让丽水人民永远铭记这一耻辱的历史，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唤醒国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碧湖镇是莲都区细菌战受害重点区域，镇政府也可以把“纪念碑”项目纳入在建碧湖公园的规划，作为公园的一个景点。凌娇岳领导表示把这个提议向镇党委、镇政府汇报，认真研究落实。会长庄启俭还表示，将组织代表到衢州市、义乌市参观取经。

10月17日，本会组织18人赴义乌、衢州参观取经。参观了义乌市江湾镇“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纪念馆”和位于林山寺旁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受难同胞纪念亭”，还参观了“衢州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纪念馆”。义乌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会会长王建政和衢州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筹）会长吴建平分别介绍了建立纪念碑（馆）的情况，为我们在丽水建立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纪念碑（馆）开拓思路，提供了宝贵经验。

10月19日，本会庄启俭、吴寿荣、汤连均、张土儿、黄丽春，会同碧湖镇领导凌娇岳到碧湖桥头公园、化城寺、保定村进行实地考察，为筹建“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纪念碑”选址。并向碧湖镇镇委委员、镇关工委主任舒丽红作了汇报。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果。

五、组织“日军烧毁飞机场周边村庄房屋财产损失” 调查取证，诉讼日本政府

抗战时期，侵华日军先后烧毁了青林、社后、关下、凉塘、九里、长冈背、后铺、天宁寺等原飞机场周边村庄村民的房屋及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为了“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在庆祝我国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根据温岭的经验，9月25日，我们印发了6号文件，“关于组织开展‘抗战时期飞机场周边村庄被日军烧毁房产损失调查登记’的通知”，着手在2002年“丽水飞机场周边村庄被日军烧毁房屋财产损失”的资料的基础上重新进行受害人变更登记。经我们联系洽谈，将由浙江万申佳律师事务所筹划向省高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赔礼道歉，并赔偿房屋财产损失。

9月19日-25日，本会庄启俭、吴寿荣、黄丽春、梁苏英会同浙江万申佳律师事务所黄晓敏、刘臻律师等到原飞机场周边关下、社后、青林、天宁寺、凉塘、

九里蛙蟆坑等村庄，对 1942-1944 年期间被侵华日军烧毁房屋情况进行调查取证。关下村吴龙儿、吴增法、叶龙其；社后村潘银龙、王寿林、潘玉翠、吴寿明；青林村张荣生、潘会友、邹辽儿、潘细泽、天宁寺村梁月云、蛙蟆坑村任饭女当、凉塘村雷马树等 17 位老人介绍了自己家庭惨遭日军蹂躏的亲身经历和目睹村庄房屋被日军烧毁的惨状。

原飞机场周边村庄的村委会积极配合，认真组织村民进行造册登记、取证，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并推选 1-3 名有威望、热心的村民代表做好后续工作。

12 月 17 日，本会庄启俭、吴寿荣、梁苏英与浙江万申佳律师事务所主任祁建飞，律师刘臻、邹建东率“日军烧毁原飞机场周边村庄房屋财产诉讼案”第一批 17 名原告代表吴增法、雷华夫、任饭女当，向浙江省高院递交《诉讼状》。省高院立案庭王君庭长、潘勤荣副庭长接待了我们，并表示立即向中央汇报。这是我们第二个对日诉讼案件。新华社，处州晚报。丽水电视台都报道了这次活动。

之后，我们又印发了两个文件，发至相关乡镇政府、村庄，2016 年 1 月 3 日，在联城镇慰问大会的理事会上又作了研究部署，后铺、中堂村、十八都村等地有所行动，但开展不平衡，像青林村我们跑了很多次还是开展不起来。

六、积极参加国内日军细菌战研讨会活动

我们还积极参加国内日军细菌战研讨会活动。

3 月 26 日，庄启俭、汤连均俩同志参加了在上海诉讼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原告会议。中国、日本、韩国、德国、加拿大五国国民共有 364 人参加诉讼，我国 254 人，浙江 14 人参加诉讼，我会庄启俭、汤连均、吴寿荣、梁苏英都是原告。

5 月 16 日，庄启俭同志参加了湖南常德第三次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

6 月 24 日，云和县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成立。庄启俭、吴寿荣同志受邀到会祝贺。

9 月 1 日上午，我会庄启俭、吴寿荣、黄丽春、潘立成等四人应邀参加了义乌市江湾小学在林山寺“日军细菌战受害纪念亭”举行的开学典礼，及深切缅怀侵华日军细菌战崇山村受害死难同胞活动。

9 月 1 日下午，湖南省常德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丽水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义乌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会、云和县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及宁波、衢州、东阳等地的代表在义乌市商城宾馆

召开会议，讨论研究成立“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联合会”事宜。著名社会活动家王选、北京大学徐勇教授、上海市委党校丁晓强教授出席会议。

经过参会代表充分讨论，形成以下决议：

(一)、根据国内外形势，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义乌市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会、丽水市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云和县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发起成立“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联合会”。

作为四个正式注册民间社团的联合体对外活动，包括对日本、国际社会，特别是在受害者维权事务方面，统一表明立场、观点。联合会近期目标，要求日本政府调查公开日军细菌战资料，承认日军细菌战事实，向中国受害者谢罪道歉，并进行赔偿。

(二)、推选王选为会长，4个民间社团的会长高峰、庄启俭、王建政、张益清任副会长，高峰任常务副会长。该身份在对外事务中使用。

(三)、预定2015年11月末，召集一次会议，届时讨论，统一思想，完善联合会工作机制、会议制度细则。

9月2日上午，各地代表参加了义乌市委、市政府在江湾镇林山寺旁边举行的“和平公园——日军细菌战纪念馆”开工奠基仪式活动。

12月3日——7日，“历史嘉年华2015活动”在深圳隆重召开。

会议“国家记忆2015·致敬抗战历史记录者”致敬奖项，向成绩显著者王选、日本友人一濑、男典男颁发了奖品。

我省从事细菌战史料研究的学者胡鼎阳（宁波）、郭承豪（东阳）、吴建平（衢州）、和我会庄启俭、吴寿荣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内容丰富，意义深远，与会同志都感触很深，受益匪浅，不仅开阔了思路，而且对深入开展细菌战史料研究更加有信心。

今年3月3—4日，庄启俭、梁玉青到江山、衢州、义乌参加王选领队看望原告团原告老人活动。

七、会员研究成果累累，著名记者纷至沓来采访

新华社对外部李东旭，新华社浙江分社冯源、韩传号、陈晓波，《南方都市报》记者南香红，央视九台、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摄制组章京导演，《中国档案报》记者秦海庆，《中国社会组织》执行主编、《中国社会报》主编

朱勤博士，记者编辑孙春宁，《浙江日报》图片中心邵全海，《浙江在线》记者胡昊等许多著名记者纷至沓来，采访丽水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史料。

国庆期间，丽水电视台连续七天播放了“丽水烂脚病救治行动”跟踪采访节目。2016年春节期间，从大年三十开始，丽水电视台又连续播放丽水细菌战调查情况。

去年8月8日，庄启俭主编的《丽水细菌战1942-1944》一书书稿，在胡红霞、吴寿荣、黄丽春及丽水技术学院学生的共同努力下，初稿编印告罄，经过进一步修改完善，书样已于今年3月底送王选审稿。希望今年大家能看到此书。

会长庄启俭同志的《丽水日军细菌战概况》、副会长胡红霞同志的“强盗的思维——侵略有理”两篇论文在丽水市社科联主办的《丽水研究》“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专刊”2015第4-1期上发表。

副秘书长周率同志采访庄祖光的《我的1939——1942，——抗战时我在浙江省电话总局修造厂的见闻》，和采访陈史英的《还原历史·揭露罪恶——我的细菌战调查之路》两篇文章在《丽水政协》2015第4期上发表。

我们编印《简报》4期，及时通报工作情况。此外，我们还编辑了《求索与控诉》、《丽水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日本政府民事诉讼状汇编》、《侵华日军细菌战丽水受害幸存者调查表汇编》、《丽水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幸存者调查表复印件汇编》、《中央电视台、辽宁档案馆[关东军档案]栏目摄制组丽水采访视频语音翻译编辑》、《侵华日军细菌战丽水受害史实讲义》、《丽水二战遗留烂脚病救治行动画册》、《侵华日军烧毁原飞机场周边村庄房屋财产诉讼画册》等资料书。

同志们：一年的工作，我们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我们也面临着困境，步履艰难。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应该继续发扬过去努力工作精神，克服困难，做好日军细菌战受害幸存者史料抢救和保护工作，关心关爱幸存者。积极争取政府专项资金和社会资金。做好资料整理工作，保存历史。教育后人。举办细菌战史料展览，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希望大家献计献策，争取在新的一年里把工作做得更有特色，取得更大成绩。

谢谢大家！

2016年4月29日

花开朵朵 ——百万和平妇女故事选

' 95 —路走来

张李玺



张李玺简介：女，1953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02年获香港理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妇女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妇女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婚姻家庭学会副会长等职务。从事社会学教学和性别研究20多年，先后出版了《角色期望的错位：婚姻冲突与两性权力》、“父权制的复苏和中国妇女的回应”等专著和论文。主持和承担了“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建构研究”、“中国城市流动女性人口状况”等国家和省部级课题。

亲临过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人都不会忘却那段令人难以忘却的日子，不会忘记那一张张来自世界各地的充满激情的脸庞，不会忘记那一场场令人流连忘返的 NGO 论坛，不会忘记那一个个新鲜而又充满活力的概念……。在那些日子里，我和许多姐妹们整天在不同的会场“流窜”，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新的知识，“NGO”、“家庭暴力”、“社会性别”、“妇女的权利也是人权”、“妇女问题不是妇女的问题”、“我们要从女性的眼光看世界”等等，这些都是那段时间的记忆。大会很快落下帷幕，可那次会议对我们个人带来的思想上的冲击，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是无形和深远的。一大批女性主义学者的成长，一大批妇女非政府组织的诞生，社会性别概念的传播和实践，可以说，这些都是“95”一路走来的耕耘和收获。我经常想，世妇会对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它不仅仅是一个有影响的国际会议，这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了从妇女的眼睛看世界。20 年了，可圈可点的事情太多，在这里我写下一两件事，也是我“95”一路走来的记忆和努力。

记得是在 1998 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那时我们有个自己组织的东西方文化学习小组，一些朋友们经常在一起聊聊一些女性主义的文章，那天散后，我们几个人在朋友的办公室继续聊天，期间有人说最近有个法学博士打了老婆，动手之后竟然还告诉他老婆说就是告也没人能管，因为伤口的尺寸够不上法律处置，大家义愤填膺，冷静下来后，我们突然想，我们必须为此做点什么。想到了就行动，我们的倡议很快就得到了一批女性研究者和社会热心人士的热情响应。几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女性走到了一起，开始筹备反家暴网络组织。一开始我们只有 7 个人，都是工作在高校、研究机构、外企的职业女性。我们一边筹措资金、组织活动，一边着手准备调查、编写培训教材。所有的事情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的。反家暴行动先后也得到了美国、英国、瑞典、挪威、丹麦等国发展署和 NGO 组织的资助，一大批热心人士也纷纷慷慨解囊，鼎力相助。经过两年的讨论和筹备，我们的组织以“中国法学会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正式启动。虽然当时名字叫做“项目”，但是整体运作机制和管理机制，始终以建立一个参与、分享、问责、协作的 NGO 联盟为目标，2003 年后，又称为“反家暴网络/研究中心”。

反家暴网络组织自成立之始，就不断地推进反对家庭暴力的宣传教育活动。倡导和干预，是我们的活动宗旨。我们先后组织了全国家庭暴力状况调查，并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深入到试点社区培训 110 民警、妇联、居委会工作人员、医生，编写和发放反家暴教材，宣讲维权知识，开启了多部门合作干预模式，在反对对家庭暴力的进程中，这个组织有着十分重要和积极的影响。记得有一个家庭主妇因长期受丈夫虐待，找很多组织救助未果，在再次遭遇家暴时杀害了丈夫。以暴制暴，这个妻子本来是要被判死刑的。我们反家暴网络中的律师志愿者积极为其辩护，全国妇联也积极出面帮助。多方协力合作，这个遭遇过无数次家暴的女性

最终获得减刑。通过推行一系列维护妇女权力的活动，反家暴网络组织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从国内波及海外。为了进一步捍卫妇女人权、促进性别平等，反家暴网络组织还多次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全国妇联提交了家庭暴力防治法建议稿及论证意见，希望把反家庭暴力提升到立法层面。2014 年，反家暴立法终于列入 2014 年国家立法机关的工作计划，越来越多的地方和机构也开启了反家暴的多部门合作干预模式。“给妇女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即将得到法律保障。

另一件事大约发生在 2000 年的一个周末，我去参加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妇女问题研讨会，因为下午还要去参加另一个机构主办的环境和妇女的论坛，中午跟会议组织者请了下午的假，就先走了。到了下午开会地点一看，大家都乐了，因为上午参会的主要的发言人都挪到这里了，我当时的感慨就是，这个圈子太小了，如此自拉自唱，性别平等岂不是遥不可及？提倡全社会承担社会责任自然完全正确，可作为一个个体，“我”又应该或怎样作一些事情去推动这个进程呢？作为一个教师，我想我可以做的，就是宣传和教育。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我先后参加编写了以不同人群为对象的社会性别培训教材，主持过农村妇女受教育状况等研究课题，积极参与和承担各种培训、讲座任务，我觉得这是我的职责和义务。我喜欢用“性别平等”取代“男女平等”。也许有人会说，根本没必要拘泥于概念的界定。但我认为，“性别平等”和“男女平等”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当我们有选择地运用时，实质上代表着不同的立场和态度。“男女平等”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是被赋予特殊意义的。但在一段特殊的时间里，它的政治含义被曲解了，人们认为，男女平等，就是女性要和男性一样。男人怎样，女人就得怎样，也可以这样，平等是以男性为标准的。男人能办的事，女人照样能办到，这种理解，甚至是实践，忽视了差异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平等是同等人平等对待之”。平等一旦延伸到忽视差异，强调一致，反而就不平等了。我经常碰到男同胞问同样的问题：男人可以扛二百斤麻袋，女人能行吗？如果不可以，为什么要平等呢？事实上，这里的“平等”，标准是以男性为准则的，对女性并不公平。而“性别平等”更多的是说一种关系，一种性别关系，它强调在解放女性的同时，男性也会获得解放，传统的两性关系不仅对女性不公平，对男性也是一种束缚，性别平等最终旨在建立一种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从关系的角度审视性别平等，就不再束缚于男性的标准。“性别平等”追求的是男人和女人共同拥有的自由。这也就是妇女解放。我在纪念国际妇女节 100 周年时，曾在一篇题为“当选择成为可能，解放才成为可能”中说，到目前各国妇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不同程度的参与，无不彰显着妇女解放运动的不菲战绩。对世界 500 强高层管理人员名单上再次出现女性，人们已经失去了当年菲奥莉娜登上惠普首席执行官的位置时的惊奇。在当代中国，妇女们不仅获得了选举权、继承权、教育权、就业权等权力，而且有了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了传统的男性领域，有越

越来越多的女性精英登上政界、商界、学界高层。于是有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妇女解放”在中国已经是完成时。如果有妇女质疑这一结论，许多男性会给出家庭生活中的“妻管严”现象、体育竞技中的“阴盛阳衰”现象等，作为中国妇女解放已经完成的有效证据。

当中国政府、妇女组织、女权主义者大声呼吁和推进性别平等时，不少男性感到困惑：中国的妇女还想要什么？我想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玻璃天花板”(GlassCeiling)，从来就没有被打破过。这道“性别之墙”依然横亘在妇女解放的旅途中。很多时候，女人似乎被赋予了选择的权利，但实际上，她们却无法自由选择。她想三过家门而不入，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中，可被告诫“主内”是女人的天职；她想在家做全职太太，可先生的收入并不足以养起全家。她想素面朝天，可媒体上铺天盖地全是包装美女，告诉人们“女人就该是这个样子”。妇女被双重道德标准束缚和评价，而且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她们又将这些标准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在实际上充满制约的环境中做出所谓自己的选择。所以我说，平等才能自由，而只有当自由选择成为可能时，才可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这就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对讲台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我喜欢这个角色，一上讲台，就会亢奋。针对不同的对象，本科生、研究生、领导干部、农村妇女，我尝试着不同的授课方法，我用我的方式，传播着’95世妇会的精神：平等、发展、和平。

’95一路走来，累，并快乐着。

（此文原载于刘伯红主编的《女性的反响续集》）



反家暴网络理事会成员

农家女探索有机农业之路

段锁兰

有机农业的推广之路为何这样艰辛？早在 50 年代中期，化肥、农药还没有进入农村。农民对化肥、农药的认知是怀疑、模糊的，认为那些白面面的东西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装在瓶子里清水水又能顶啥事？他们面对这些新生事物就像面对我们现在推广的有机农业一样担心、困惑。制造化肥农药的厂家与经销商在利益的驱动下，推动农民不顾对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健康的危害，越来越广泛地实施化学农业，侵蚀我们的土地。年轻一代的农民没有延续老农的原始耕作，而是大量使用化学药品——例如除草剂，使得自然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变本加厉的恶性循环成为我们全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



段锁兰（左一）

20 年前，本地有规模的果树种植以喷洒农药为主要驱虫办法，化肥、杀草剂也被经常使用。因为对口感的考虑，12 年前，我们自己家的果园开始不使用化肥，用上农家肥。

2004 年，我们接触到《中国改革》杂志社主办的新乡村建设培训，听“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讲课，温教授提到有机农业，他说：喝山里流出来的水，给自己留下半亩‘保命田’；以前是城市人害农村人——制造规模化的工厂污染水、土地资源环境，现在是农村人反过来害城市人——生产一些用化肥、农药污染的农产品，例如蔬菜、水果、肉鸡等恶性循环，导致人类各种疾病的发生。当时的我迷迷糊糊理不出头绪，总认为讲的是大道理，与我们无关。

2008 年 8 月，我有幸参与由香港岭南大学陈顺馨老师等主办的和平妇女“生态、生计、文化与可持续和平”行动研究工作坊，才真正了解并懂得无公害、绿色、有机是怎样一回事，也开始萌生了对自己事业的追求。在与来自台湾的徐兰香大姐的交流中，我懂得亲人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哪怕赚了再多的钱，到头来，当你把自己的亲人送进医院时，那才叫人财两空。她说：“宁可多一家有机农场，也不要多一家医院。”我从她身上看到了大爱无边与和平妇女的重大意义以及我们作为一个生产者的重要性。我也了解到沙漠中的和平妇女殷玉珍的事迹，她通过近 30 年的努力改变了自己和儿女们的生活，而我的家人却每日同农药泡在一起。作为同龄人，我感到很惭愧，当时的心情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只想到殷玉珍同丈夫两人在那样的条件下能生存下去，我和她比起来，各方面条件都要优越得多。我知道了要想改变现状，必须从改变思想观念开始。我相信凭着自己精心的经营与管理，假以时日，肯定能把自己的家乡由一个农药村庄变成环境优美、美果飘香、无污染的村庄。于是，我写下了自己的理想——让全村停止使用农药。

2008 年冬季，历经 4 个月的宣传工作，村民们开始有了思想观念上的转变。我们搞了为期 4 天的培训，举办了由本村妇女协会组织者、两岸三地“和平妇女”代表及志愿者等七十多人参加的联合交流会。2009 年春，我们正式实施行动方案：第一年试验户 10 家，由有理想、敢挑战的农户来做。有沼气的农户（2005 年，在合作社的带动下，我村建沼气池 100 多户）发动身边的资源，如相邻农户中懂喷灌和果树技术的，先把他们的思想工作做通。从喷洒沼液到树底下施沼渣，用原有的方法熬制石硫合剂。年底总结我们发现，用过沼液的果园树叶厚，颜色深而且很光滑，树枝茂盛，地下土壤松软，而且有很多蚯蚓，不板结，土呈黑色有黏性。第二年，我们开始 20 户试验，想到土壤改良不光是树叶树枝的变化，要想做到真正的有机必须全方位地从头开始。我们利用“和平妇女”提供的支持，看光盘、出去学习，开始从养草护土着手进行试验，采购了割草机，从锄草变为养草。我自己家用三亩梨园做了试验，一次农药都没有使用。而事实上我的想法

是，毕竟农药用了这么长时间，在没有别的物理方法可以替代的情况下，不可能一两年内彻底停止使用农药。在我所了解的技术中，沼液只起到防虫和增肥叶面的作用，不能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它，只有减少农药的喷洒次数，由原来的 8-9 次逐渐降到最低限度，才能慢慢脱离农药。因为整个栗家庄的经济来源都要靠果树，一旦出现问题，谁来负这个责任？我埋怨老公太欠考虑，结果多一半梨烂掉了，损失不小。还好，我家有四份梨园，只拿一份做了试验。这一次，我们从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因为果树一年只能试验一次，要想尝试别的方法，需要等到明年才能继续试验。同时，每年国庆节，我们都会举办“试验果品”品尝会。

2010 年的冬季，继和平妇女“生态、生计、文化与可持续和平”工作坊两年之后，我们又一次在香港相聚，这一次我们各自带来了实践的辛酸与成绩。回首 2008 年的开始，我从一无所知到自己亲自操作，这个过程中，我或多或少做了一些事情，体会到了大陆气候、环境的多样性。香港之行，更让我增添了许多责任与忧虑。有很多关心这件事的朋友、老师们都在问我，经过这两年来的各种试验，你是否还要继续往前走，还是放弃停下来，回到从前的耕种。这一点，我告诉大家，尽管前面的路很艰辛、很迷茫，可如果放弃了，太可惜！毕竟做了两年的试验，2010 年的养草试验已经使得一大批农户不再锄草。当然依旧有人在使用杀草剂，这点让我很苦恼。我用尽所学，磨碎嘴皮子跟他们讲，绝不能再用杀草剂，它的危害会使更多的妇女防不胜防，对下一代基因的影响很难说清楚。美国纪录片《玉米大王》的光盘不知放了多少回，可她们就是不听，而且还讲：“管得了现在还能管得了将来？自己还不知道今天死、明天死呢！还管他后辈儿孙。”这样你又怎样给她解释呢？只能用事实证明一切。

这么多年来，身边有人对我说：“锁兰，你都多大了，还在做梦呢！中国人的生态问题连中央都在愁怎样解决，而你是谁呀？没权力、没实力，就凭你能改变中国吗？你连自己村庄都很难改变，你还是醒醒吧！”我回答她：“我不想改变什么，对于任何一种新生事物大家都有一个认可的过程，只要自己坚持，总有一天会被理解的，凡事总得有人做吧。”

我的故事，虽不被很多人理解，但背后却有更多的老师和同行们在关心我。我给农户放映从昆明带回来的光盘，把头两年来的试验制成纪录片，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也得到了很多外界朋友的支持：太谷山西农大志愿者提供的诱蛾芯，2011 年 4 月份都挂上了，中间也分给合作的农户，教给他们使用方法；一直支持帮助我们的和平妇女工作者罗燕带过来的草种子，我们也种了，长得很好；还有昆明认识的纪录片工作者翁蝶蝶带来的《善待土壤》光盘也给农户播放了，反映很好。通过养草，我们家果园里新出现了很多鸟类，它们在草丛里抱窝了，还有刺猬生下小刺猬，各种各样的蝴蝶也飞来了。还有好多农户梨园里的草也在变化，不光

有毛毛草，还有那种很小很小的水草，这也是养草的作用：能覆盖地面，保养水分，使得土壤的湿度不会被蒸发。原来不养草，锄完地光秃秃的，3亩地90分钟就能浇完，养草后要5个小时才能浇完，而且保湿时间长；别人不长草的地浇四次，养草的浇两次；别人半个月就浇一次，养草的一个半月才浇一次。不同的草能吸引不同的虫子，自然界的虫子都有它们的平衡点，只要找到它们的平衡规律，一切就都解决了。草还可以当做有机肥使用，把它割倒经过一段时间覆盖，它的一切有机质就还原到土壤里，既能做有机肥又能降低买农家肥的成本，一举两得。

2013年11月，在四川成都，和平妇女们又相聚交流。通过了解四川“妈妈团”统购小米的活动，我认识到我们在一步步探索中不断发生的新变化——从团队体验到亲自实践，我的思维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我们的行动也慢慢影响了更多的农户来参与，同时也有很多消费者参与进来——消费者们通过自己的体验懂得了农户的不易。在交流的过程中，还有少数的消费者探讨了与农户共担风险的话题。我们尝试了石硫合剂、养不同的草、培养天敌等有机农耕方法，不但自己坚持，还带动了很多农户。实践证明，我们的思路和做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最让我高兴的是得到了村干部的支持。

虽然土地在慢慢恢复，空气质量也得到一定改善。但对于大环境来说，农人们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生产者认识到了有机的重要性还不够，关键的是很多农户担心付出那么多、生产出好产品，却遇不到识货的消费者，这是一个很难的突破口。2015年1月，我们到北京参加了“第五届全国农民合作组织论坛暨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十周年庆典”活动，论坛上，大家探讨出农户产品与网络结合的“互联网+农户”的销售模式。面对新兴的销售平台，我们满怀希望继续脚踏实地地探索着……

（此文发表于《新华月报》2015年12月号第23期）

从黄河下游到黄河中游的乡村建设

何慧丽



何慧丽简介：

博士，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副院长，河南省灵宝市弘农书院院长。2007年获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2008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农林管理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农民组织建设研究。曾挂职河南省兰考县副县长、县委常委；曾挂职过副区长、市长助理等职务，期间积极推动了豫东地区的当代新乡村建设试验。在《开放时代》、《马克思主义与发现》、《Chinese Sociology & Anthropology》等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教学领域：**经济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研究方向：**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农民合作与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

引子

乡建有感

熟闻日间稻禾香，最忆夜半月如霜。

斜晖脉脉千村照，黄水悠悠万里长。

念儿时，想亲娘，此心安处是故乡。

摩登无形浓浓色，乡建有功淡淡光。

又到了枝繁叶茂、暑热炎炎的7月。还记得12年前的7月下旬，当时中国农业大学校党委书记瞿振元和校长陈章良，与开封市签了长期合作协议，将我们一行6人带到了开封去挂职，我被派到兰考县挂职副县长。在市校共建的背景下，当时31周岁的我，踌躇满志地开始了人生事业的新征程。

2003年7月，我花了半月时间，调查了兰考县16个乡镇状况，当时感到豫东传统乡村资源资本化内力欠缺，乡村面临的是如何可持续生存的问题。于是，提出在该县搞“小康村”试点的想法，得到了在城关乡陈寨村挂职的省财政厅徐可同志的引介，以及开封市、兰考县主要领导的肯定。这样，以兰考县为乡村建设运动主要试验场，其最初设计是——

以村庄为基本单元，自然村、行政村均可；以村民生计为本，即以村民的增收和节支、提高生活福利为要务；以合作组织为纲，即以促成村庄的文艺队、老人协会、经济合作社等为关键，改善村庄治理；以大众文化为根，即以发展秧歌、腰鼓、盘鼓、地方戏曲、传统太极等喜闻乐见的大众化文艺为形式，扎根于农民的生活价值系统。我们希望以合作制度创新的方式把留守在村的农民们组织起来，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转化为乡村建设的正能量，有效地促进农村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从此，在这个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在此讲学、当代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生前工作过，在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交相辉映的兰考县，黄河中下游的当代乡村建设运动便拉开了帷幕。

黄河下游：兰考乡建纪事

兰考试验区，是从分布于城关乡陈村、架子乡贺村、三义寨乡南村、仪封乡胡村、阎楼乡李村、许河乡蔡村等6乡6村的农民自组织建设开始的。其发展历程显示出多元力量此消彼长和互相支撑的特点，可以总结为“党政主导，农民主体，全社会参与”的多元一体框架。

从事件现象上看，一些重要乡建纪事有：

2003年国庆节假期，由中国人民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三农”社团在天津科技大学教师、在刘老石的带领下到了兰考县6个村庄进行支农支教活动，当时将大李西村的文艺骨干带到陈寨村来教学，后来又有中原油田退休工程师衡生喜加入教学，由此产生了兰考县第一支农民新合作文艺队。

2004年8月底，我们第一次在贺村召开了4天关于农民经济发展合作社培训会议，12月10日，在南村召开了4天兰考县科技扶贫与合作社培训会议。两

次会议上，有县农业局、扶贫办的干部、开封市委党校教师、北京专家、多个合作社社员代表、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和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会代表、村庄文艺队、村民代表等等广泛参与，具有“多元”力量参与的特点。

2005 年年底，由于新乡村建设试验两年来形成了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和农村社会文化发展模式，从而促发了一系列早期城乡社会、经济、文化互动，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新闻效应及社会影响事件，诸如兰考农民新合作文艺队进京演出(2005 年 7 月 15 日～16 日)、“教授卖大米”事件(2006 年 1 月 2 日)、大禹论坛(2006 年 6 月 25 日)、购米包地及其价格听证会(2006 年和 2007 年的秋季)、北京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的初创(2007 年～2008 年)等。

此时，在温铁军教授的指导和统筹下，由知识分子参与的全国新乡村建设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发展着。兰考试验区的经验与其他地区经验一起，成为早期乡村建设相辅相成、相互关联的一部分。比如农民文艺队教练衡生喜、老年人协会带头人赵凤兰都积极参与全国性的经验交流会议，参与外出教练和指导工作，兰考县几个村庄的经济合作社带头人和基层干部均参与了全国性的农民合作和新农村建设经验交流会，其中南村和胡村等合作社还以发起者身份加入了 2006 年由全国 7 家合作社组成的北京国仁绿色联盟的成长和发展工作，以及 2007 年北京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的成立和发展工作。

2007 年，各种社会参与的乡村外发力量，以及体现政府主导作用的各类涉农部门力量的介入较早期逐渐加大，农民内生性力量的主动性也渐趋明显。这个阶段新乡村建设试验的特点有三：一是村级农民合作组织的范围向村级、乡级和县级延伸，形成县、乡、村三级范围内的合作；二是一些农民合作组织内容向多元和综合方面延伸，形成生产、金融、购销、文艺、社会等综合的多元合作格局；三是对社会、政治和知识界影响渐大。

2008 年～2009 年，以李村为核心的老年人协会，在县民政局、中国滋根乡村教育和发展促进会的支持下，在以赵凤兰为首的集体化时期老干部的积极带动推广下，辐射到整个阎楼乡近十个村庄，以及周边 3 个乡镇(小宋乡、红庙镇、许河乡)的若干村庄，十余支村级老年人协会及其文艺组织得到成立和发展。

2008 年 7 月，以胡村合作社为核心力量，在乡级政府的支持下，仪封乡 13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在乡里成立乡级联社组织，共有 1300 余户农户参加，以统筹好单个村级合作社“干不了、干不好、干起来划不来”的事情，这是农民合作组织质的提高。此外，在合作社大棚蔬菜产业迅速发展并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合作社进行了一系列生产、流通、土地流转实践之后，胡村于 2009 年 2 月率先在村级层面成立了合作社借款担保协会，以与乡信用社对接解决合作社经济发展

的资金瓶颈问题。当时我负责了兰考县合作社通讯事务，并组织了数次全县性的农民合作组织培训。无论是乡级农民合作联社的成立，还是合作社在生产、流通、金融、加工、土地流转等方面的进展，其探索均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008 年~2009 年，东坝头乡在乡党委和乡政府主导下，在中国滋根乡村教育和发展促进会的资助下，成立了 15 个村“两委”（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主导的村级文艺队和老年人协会组织。该乡两届乡党委书记刘广亮和孔令玲从 2008 年起 6 年来，每年的春节前都举办乡村农民文艺表演比赛，其中我参加的有 3 次。

同时，以三义寨乡南村等村庄为重点，继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本地城乡公平贸易的尝试，包括该村的无公害大米已逐渐发展到有机大米种植、藕蟹生态混养、“快乐猪”养殖、小杂粮种植等多样性生态农业生产体系的形成以及生态民居建筑的推广。该村还从 2008 年始，直至 2010 年，一直有意识地进行本地城乡经济社会文化互助的尝试。分别以郑州消费者团队和开封消费者团队组队进行每年一度的生态文化旅游节，进行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购猪认养”经济活动，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然而，在此阶段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因为以“农民合作与城乡互助合作”为特点的新生事物，在这个阶段已较深地触及到各种人际关系、社会结构乃至经济结构利益的调整。与早期的社会运动状态相比，到了缔结新型共同体而突显各种利益矛盾错综复杂的阶段。此时矛盾也多，问题的展现也多。有项目的高成本付出和挫败，也有各种内外部矛盾的形成、发展和激化……。

从黄河下游到中游：开封乡建与灵宝乡建纪事

2011 年 3 月~2013 年 5 月，乡村建设工作重点，以探索城乡良性互动的方式延伸到开封和郑州等大中城市，也以优秀乡土文化复兴的方式开展到了开封地区农村以及豫西灵宝市农村地区。

一方面，新乡村建设运动所达到的程度尽可能地体现了既有体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容纳度，另一方面它也面临着越来越坚硬的瓶颈力量，即中原区域内市民消费者尚需要观念和行动上的引导，以及更为深厚的文化教化力量。

2011 年 3 月，我担任了开封市市长助理，外发力量便引到了开封市团市委、市妇联、开封大学、郑州兰考商会等机构和市民阶层。这个时期，关于开封市和郑州市等地级市和省会城市的文明消费者教育项目和公平贸易机制的探索主要有：2011 年一年内，由北京师范大学谭思婷教授团队为开封市城市消费者群体

和兰考县村庄农民合作社所在的村小学师生们，做一定的消费启蒙工作；2011年8月～9月，以兰考县4个合作社、尉氏县2个合作社等农民经济组织为理事单位，以郑州兰考商会的企业家汴卫平为董事长，与郑州文明消费者志愿者一起，成立河南郑州国仁超市机构。国仁超市提出“文明消费(健康+公平)→自然农法(土地+种养)→健康生活与和谐社会”的理念，在开展国仁论坛、发动郑州有机小市集、促成生产者与消费者面对面等方面做了发蒙式的工作。

此时乡村建设工作也开展到了尉氏县等开封市其他区县，并在内容和方式上有新的探索。2011年7月，由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等高校“三农”志愿者五十余人一起，在开封市团市委的指导协调下，开拓了开封市尉氏县岗李乡袁村、石村、沈村、占村4个村庄。2012年春节时寒假期间，以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以及中国农业大学大学生志愿者团队为主要力量，在通许县岳村、元村，开封县木村和杨村，开创了“参与式调研”、“集体伙食改革”和“乡村情景分享朝话”等发现乡土性的新型支农支教活动。2012年暑假，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的“三农”志愿者团队在兰考县的南村、坝村、营村、方村、固村，杞县的于村，提出了“到田野做学问，向社会学知识”的下乡宗旨并试着践行之。

同时，2012年暑期之后，我接触到了以弘扬传统优秀文化为目标，以“敦伦尽份，克己复礼”为宗旨的开封市敦复书院。在深入了解该书院的运作机制、社会使命和具体效果之后，我也对多年乡村建设经验、教训进行反思，认为在经济发展主义在河南地区仍占主流的情况下，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参与力量的当代乡村建设运动，应该以“人民生计为本、合作组织为纲、多元文化为根”经验基础，在践行以传统乡土文化复兴（比如孝亲文化）的层面上有所作为，而农民合作经济等领域若能有大幅进展，主要还在于思想文化的提升和对人的培养教化，在于“以孝为本，以德为先，义行天下”。于是便有意引导高校“三农”社团下乡目标和内容的转型。

这一乡村建设地点、内容、方式的转型期存在于2012年下半年到2013年上半年。在由敦复书院培训了部分大学生骨干力量之后，河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三农”社团力量便有序被引入到豫西灵宝市农村地区以在村庄开展道德讲堂的方式，联合广东李文良先生等儒商力量齐力开办弘农书院（2013年4月）。

灵宝市座落于黄河中游金三角地区，即豫陕晋三省交接地带的边区，古时是从长安到洛阳的中心地带，这儿是生我养我的家乡。弘农书院以“尊道贵德，和合生态”为宗旨，继续探索当代新乡村建设事业。弘农书院愿意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下的现实境遇中展开，发陈以荣。其主要工作有五：优秀乡土伦理道德重建（以“孝亲”为本的婆媳关系、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改善等），农民合作社

培训、生态农业培训、卫生保健培训以及国家相关政策培训。弘农书院迄今已成立两年了，在它发挥引进资源并对农民进行培训同时，助生了灵宝市弘农沃土农牧业专业合作社（2013年），以及合作社的资金互助部（2014年），老年人活动中心（2015年）。书院在开展道德讲堂教化人心、城乡自然游和国学游方面、河南大学生支农支教总培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豫西灵宝正在探索“书院+合作社+生态农业”三位一体的美丽乡村建设路子。并且希望与山西永济蒲韩社区、西安大乡建团队有机呼应起来，成为黄河中游新乡村建设的星火燎原。

结语

人事沧桑，天道有公。实践中的事物发展是有着历时感的规律的。多少现象好了也就了了，有着其生长、发展、成熟、衰落的过程；有的却历时弥新、得道多助的壮大发展着。迄今，南村农民合作联社的资金互助服务部，其资金总额从2004年的49户农民加入的3万元，增加到2014年年底两县9村500余户的700万元，胡村合作社资金互助服务部资金总额也达到100余万元。这些最早进行新农村建设实践的乡村，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曲折地、顽强地践行着中国本土特色的、以“土地和金融”为核心的经济文化社会综合合作之路。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与基层干部群众相结合，是把“毛”扎根到“皮”上以使其“长壮发亮”的生存功夫，因此，10余年来，我们很清楚，自己不是主体力量，充其量也只是示范、参与和支持力量而已，是协调和沟通力量而已，甚至是个在试错中提升自己力量而已。本质上，合作的历史，无论是经验或者教训，都是基层干部和群众在一定的外在条件下以主体的身份在做，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总之，从豫东到豫西，从兰考、开封到灵宝，乡建运动是个有着历史渊源和地方传统的宣传队、播种机、大学校；事在发生，理当其时，道通历史并指向未来，当代新农村建设运动必将生生不息。

（此文发表于《新华月报》2015年第8期）

合初人朱艺说“我们才是最现实的！”

刘家路、黃健彬



朱艺简介：

2003年创办公益组织“合初人”至今。“本体健康”理念的提出者与倡导者；“新市民人文社会公益教育”与“城乡生态产、消互助（CSA）”的实验者和倡导者；合初人耕读之家户主；“学做幸福生态人公益行动”与“半农半X生态亲耕社区”发起人。重庆社会科学院行动研究学者。论文《复兴“本体健康文化”》在2008年新华社《瞭望》周刊第29期专家视点发表；论文《生态文明呼唤消费观念变革》在2013年7月27日《重庆日报》理论版发表。主编的行动研究成果《新市民培养读本》与《新市民培养教师用书》于2015年3月收入人民日报出版社学术文库并出版。

“过去的十一年，合初人都在用行动反思和探索人性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我们的核心理念是‘本体健康’，即人以身心健康为本，人类生存以自然和土地生态良好为本，社会以广大普通劳动者的幸福安康为本。这个一直没变，将来也不会变。这十一年，我们的探索和反思让我们明确了我们组织的愿景和使命。我们的愿景是‘每个生态人拥有健康幸福人生’，我们的使命是‘让更多人愿意成

为生态人’。这是我们最大的收获。而且我们认为乡村是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以生态农耕为本的乡村生态生活方式，是对地球母亲最友好的、最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重庆合初人文化传播社（以下简称“合初人”）的发起人、负责人朱艺语气坚定，她坚信乡村是人类充满希望的未来所在。“我们将来主要会以耕读书院为载体做教育，同时会做乡村生态生存与生活试验，以及生态修复与自然农法的试验。也就是说，回到乡村你得先解决生存问题，当然这个“生存”跟现在一般的生存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最容易生存的地方是乡村（只要有土地我们就能够生存），而且也是最适合生活的地方，因为它离大自然最近，可以过让人不那么忙碌的简朴的生活，可以有更多时间用于自我成长，与家人相处，学习文化与艺术，教育孩子，专注在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上等等。总之，可以过得更符合生命本身的规律，更有利人性健康全面的发展。而所谓城市就是让大家‘发展’的地方，但是那个发展你搞不好，就把生存和生活都丢了，收获的很可能是‘人性的异化’和‘对人生的绑架’”。

合初人的诞生

谁曾想，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眼前这个探讨如何解决农村问题的实践者，主张关注乡村、回归乡村的先行者朱艺还是个活跃的文学女青年，国家图书馆、中央讲师团、国家重点刊物《改革》杂志，甚至是房地产开发公司都有她青春的身影。

1998年夏，朱艺调入《改革》杂志社做编辑，到了重庆社科院，2006年初，又正式调入研究所做科研工作。“我们在研究单位，还是有一定自由度的，比如不坐班，但是我觉得离实践太远，即使是去做实地调查也会有很多局限。我选择的研究方式是行动研究。在体制内的研究系统当中，极少有人真正做行动研究和提倡做行动研究。”她明确感觉受限，并强烈地期待通过社会实践进一步探索、解决现实问题。2003年，时年四十岁的朱艺意识到必须有一个行动的平台，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才能深入了解、体会与反思社会问题，包括人本身的问题。于是，十一年前，合初人诞生了。

十一年间，合初人最大的转折，就是主体工作从城市搬到了乡下。从开始返乡至今已经五年，其间，CSA（社区支持农业）与农园已经四年半，新农人项目近两年半，免耕覆盖项目两年零两个月，还有农耕身心康复的农禅活动、儿童农耕与自然教育、乡村幸福生活课堂，城市农耕和消费者教育等等。

朱艺在合初人的十年总结中是这样解释“合初人”的：合初人即回归的人，回归本初人性，回归本体健康，回归大地，回归自然，回归乡土，回归身心的家

园，回归健康的世界生态整体，只有回归，我们才能重获生命的能量，只有回归，我们才能畅行于生生不息之路。

“农民工-新市民”让合初人行动更加深入

合初人成立之后，朱艺越发感受到实践的重要性。她做了农民工夜校的志愿讲师之后写了一篇建议，强调重视农民工的人文社会教育而不仅仅做技术培训。同时她认为农民工不仅仅是劳动力，到城市生活工作有全面发展的权利，全社会应该关注这个问题，并且称呼他们为“新市民”。可是“建议”虽然在内刊《领导决策参考》登载，而且也得到了社科院领导的肯定。但之后，文章随内刊束之高阁，思考和建议也就到此为止。朱艺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无法止于“思与言”的人，只要她认为对的，她就觉得应该用行动去证明和实现。没有别人行动，那就自己行动，于是，她在合初人组建了“新市民文化教育研习中心”，开始发动一些热心的朋友成立志愿讲师团，为农民工做社区公益课堂，帮助农民工建立在城市工作、生活的自信心和适应能力。

“在开始农民工培训之前，我们的行动还仅仅局限于做网站、办论坛、开讲座。但渐渐发现当我们真正去关注一个社会群体，想有所帮助时，就必须深入思考他们真正面临的问题，再通过行动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并且在行动中不断的反思、总结、调整。当然，作为一个小小的公益组织，行动会有它的局限，但是我们觉得，普通人组成的公益组织探索出的行动方式，更具有普遍的推广价值——普通人都可以来做。”“后来，我们发现农民工问题以及许多社会问题，其实根源在乡下，所以我们回到农村。

进驻农村与“外来萝卜”

在乡下的五年，更加困难。在乡下，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很不好找。“我们定位是做乡下的公益组织，而不是说我们是城里的公益组织在乡下有个项目。”据朱艺介绍，她目前在国内还没有发现一个真正驻扎在乡下、有长期稳定的工作团队，而且是非乡村本土公益组织的成功案例可以效法，一切都得自己探索。

“不管在城里还是在乡下，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人。”在公益圈，大家将所有返乡青年以及想扎根农村工作的青年伙伴称做扎根的“萝卜”，而来到异乡的，自然就是“外来萝卜”。外来萝卜要在农村呆下来十分不易，合初人新农人实习计划有 20 多人参与，最后真正回到农村定下来做农耕的只有两个。

一个 80 后“外来萝卜”在离开机构后写信给朱艺：“在合初人的三年多时间里，我接触和接受到了真实的、根本的人生意义和社会实相。在公益实践过程中，与社会最真实的人的交流、合作与碰撞中，既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也发现了对方心性中共性，这些共性形成了社会心理，社会心理的能量水平和局限决定了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现实世界里。而要对社会现实有所改进，其唯一行之有效的路径是促成每个人的心性成长。合初人正是看到了这个关键，努力在做这样的尝试。合初人有别于一般意义的所谓以整合资源见长的公益机构，把着力的重点从‘事’挪到了‘人’，而且强调形成这种社会实践的路径正义。从健康文化命题和倡导到农民工心理辅导培训的社区教育，再到完成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重心转移，合初人完成了对社会认知和社会实践的价值选择。正是在这个工作转变和价值选择的过程中，发生了团队成员的频繁变动。”

“有乡村价值理念的人少，真正有返乡行动的人更少，能稳定安心持续留在乡村的人少之又少。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谓围困重重。在无法指望和左右外部环境改变的情形下，真正有能量和可以期待的突破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人内心的力量。没有这个能量元点，所有的外援都将无从着力，都将事倍功半，甚至前功尽弃。因此，我们将来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将以此为核心。”多年经历让朱艺如是总结。

“我们认为我们才是最现实的”

不少人说合初人太过脱离现实——现在大家都往城里发展，很少人留在乡下，在乡下会遭遇种种困境，如社会地位、收入、婚姻等方面。对于这点，朱艺回应道：“的确可以说我们脱离现实。我们在努力脱离，但也没完全脱离。因为我们想要脱离的这个‘现实’已经完全抛弃了农村，但实际上人类的生存不可能没有农村。这是一个扭曲与病态的现实。其实，我们认为我们才是真正最现实的，因为人类最现实的就是‘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农村如果都不存在的话还怎么谈现实？我们倒是觉得现在的现实是一个泡沫。大家现在认为的发展是离开乡村，到城里去，城市化、工业化、商业化，可是我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在乡村、在土地、在乡土社会之上的发展，或者说是吹出来的泡泡。如果乡村存在，大家还有力气吹出这个泡泡；一旦乡村消失，这个泡泡就会破灭。土地、乡村、农业是整个社会的本，如果这个本没有营养，开始被腐蚀、被掏空、被虫驻，那么这棵树现在长得再漂亮，也存在很大的危机，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是最现实的。不过，我们的确不符合现在所谓的挣大钱的现实，所谓的‘发展’的现实。如果把‘现实’仅仅定义为高薪收入的话，那么我们的确不现实。而我们认为现实不

只是钱，而是整个世界，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认为：其实我们才是最现实的。”

因为原主管单位要求增资至五十万，而合初人并没有如此多的资金，所以目前合初人正在市民政局重新直接注册，不再有主管单位。团队成员招募也从“来者不拒”到“严格考查”，遵循宁缺毋滥的原则，团队建设也将从较多依靠外力过渡到自主培养为主。合初人目前稳定在土地上的覆盖免耕实验项目人员有两位（一位当地农民，一位新农人），两位稳定的兼职骨干志愿者帮助 CSA 和行政工作，两位申请了三个月以上的教育农园人才培养实习生。而合初人从 2013 年夏秋开始的“以乡村生态生存、生活实验为基调”的新调整将在 2014 年逐步落实，并持续下去：

2014 年下半年将继续农耕身心康复实验，开始乡村生态生存与生活实验、生态修复与自然农法实验，还有农耕与自然教育实验，在精力所及的范围内继续维护以往搭建的城乡互动与互助平台（如 CSA 和乡村生态市集等），帮助这四五年用 CSA 方式在当地扶持起来的五家生态农耕农户（其中包括一个家庭农场）自主成立生态农户的合作社，持续用行动探索如何真正在乡村落地生根的道路。

“我们的事业不会辉煌一时，但会永远存在”笑容灿烂，当年的文学女青年热情不减。

朱艺说，自己有一世一定是一只鸟儿，一只红色的鸟儿。说起父母、姐姐和她的幸福归宿——家庭树葬计划，她借用了海桑的诗：

等我死了，就把我葬成一棵树吧
葬我成一棵普通的树
但要会开花。会开花多好看呀
哪怕然后落花，哪怕然后落叶
更哪怕落叶落得只剩下枝丫和枝丫
如果小鸟愿意，就在我的手上来筑巢
如果孩子愿意，就爬在我的头上偷走鸟蛋
我不会再说什么

我已经是一棵树了
我是一棵树了，我愿意住在许多树中间
这样你们就可以手拉手，于其中
散步和思考，野餐和恋爱
做一些自由自在的事
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所以，等我死了
就把我葬成一棵树吧
仅仅这样想，我已幸福得不知所措
所以，在我死去之前
我要自己刨好树坑，那是我的家
我要自己选好树苗，那就是我。

这一切，或许回头看看当年乡居大洪湖的小姑娘就更好理解了。1963年10月，半岁的朱艺随父母被“流放”到重庆长寿大洪湖。湛蓝的天空有大朵大朵的白云，山坡、湖边、田野、学校……在朱艺看来，处处皆是天堂。坐在教室窗边，绿色的田野、青色的山影映入眼帘，近处还有小朱艺和大家自己亲手劳动开辟的大大的操场。一放暑假她天天去清澈、宽阔，有小岛、有野鸭，岸边有玉米、有高粱、有野花的大湖里游泳。朱艺说，她现在明白，那是大自然和乡村生活对一个“右派”子女最好的心灵疗愈，帮助她得以健康成长。年少的时光，滋养了小姑娘心里那颗深爱自然与乡村的幼苗。如今，这棵幼苗成长为生命之树，并希望孕育一片片幸福森林。

（2014年初夏时节，中山大学实习记者刘家路、黄健彬和志愿者王璐珮采访了朱艺，并根据采访录音写了这篇稿子，准备在南都网发，因用稿改动、删减较大，也不是这个题目。本文由朱艺最后审定，与大家分享。）

一名女硕士的返乡之路

彭月丽

我是彭月丽，一位 85 后的姑娘，农二代，山东农业大学农学硕士毕业。一年前，正式发起了【咱家农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辞掉高薪高职的工作，回到乡村发起一个小农场？还有朋友以为我有什么特别赚钱的项目或者技术秘诀，跑来仔细探察，呵呵，不好意思，让他们失望了。我为什么发起这个农场呢？我也问自己。我相信每一个行为背后都有深层次缘由，有时候是一些人，是一些事，是某个晚上的顿悟……

梦 想

是的，我们的很多看似难以理解的行为，是源自最初的梦想。

小时候，被老师问长大以后的梦想是什么？当时被给出很多备选答案，科学家、医生、总理……那时候我不明白这些词汇的意思是什么，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想爸爸妈妈可以不用那么辛苦，能有多些时间陪我。

高中时代，一位老师跟我说，现在农业科技也是非常发达，只是我们国家的农技推广还不强，好多科技农民无法掌握，所以农民还是很辛苦。暂且不论他的话正确与否，确是深深触动了我，非常为农民抱不平，我的经验告诉我，像我爸妈这样的一代农民，他们非常的勤劳、善良，对土地与庄稼非常的用心，为这个社会和国家贡献立命之本的粮食，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如果有让他们不这么辛苦的方式，为什么不去改变呢？就在那一刻，我暗下决心，以后要做这件事。

现在想想，多么狂妄的一个决定，就是这个决定主宰了我至今十多年的不断追求。我相信，每一个人来到世间，都是有某种使命的。我的人生使命，便是和“农”字有关。

高考选大学，没有去咨询过多人，也没有过多纠结，我选择了我们省里的一所优秀的农业大学，去学习农业科技。

探 索

到了大学，面对庞大的图书馆，我像海绵一样去学习现代的农业科技。随着对知识的学习，对实践的了解，我发现困惑也越来越多。为什么随着科技的发展，农业的问题却越来越多。随着农业科技代表的各种农资的推广，农村没有越来越

繁荣，反而是越来越凋零，农业产量提升的同时，却带来越来越多的食品安全问题，农药中毒的问题，土壤障碍的问题……

与池田老师结缘

正值在大学困惑的阶段，遇到了我的恩师池田老师。他是一位国际志愿者，退休以后，一直在中国推广土壤改良与堆肥技术，当时正在我们大学跟一位教授（这位教授后来也是我的硕士阶段的导师王秀峰教授）一起做合作科研课题。后来，我也很荣幸参与到这个课题之中。池田老师跟我讲了他的经历，我深深被他的这种大爱精神所感动。开始跟随老师一起去乡村做农田调查，在试验田搞研究，到田间地头做推广，也就是那时候让我更深入地了解到我们现行农业生产现状与土壤退化的现状，确定了农业技术上努力的方向。

小毛驴市民农园

很开心，在这里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一群昂扬激情的年轻人一起在田里挥汗如雨，一起侃侃而谈到深夜，一起激扬文字，一起思考着农业、社会、国家……也是在这里接触到经常笑眯眯的和蔼睿智的温铁军老师、实践自然农业40余年的赵汉珪老师、我们的领路人石嫣姐、黄老师、潘老师、晓辉、老六……还有好多有理想、有思想、勇敢的“斗士”们！

在这里，我更加深刻的理解了一些事情，能够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待农业，也找到了自己在这项事业中的角色定位。



大农业企业的经历

由于各种机缘，跟我的恩师池田老师一起加入了一个很有社会责任心得的大农业企业，做生态农业的科研与推广。在这里工作的四年间，是经受更多锻炼、

接受更多成长的阶段，对农业也有了更加深切地认识。这段经历，让我明白，在生态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农民才是最重要的角色，只有农民生产方式转变，并且有能力转变的时候，农业才能真正转变，食品安全问题才能彻底转变，而生态农业就是正确的方向。

乡村的凋零

这些年，每次回家，看到都会有些伤感，村里年轻人越来越少，只剩下老弱妇幼。

而我自己家，也是如此，几个兄弟姐妹都在外工作，爸妈逐渐年迈，他们喜欢乡村，却也开始抱怨干不动农活了，他们是多么希望能有年轻人在身边……



家乡的老屋还在，人却越来越少；



小时候爱爬的老树还在，不见当年的小伙伴；
绿油油的麦田还在，只是多了一些本来不属于农田的东西，少了一些农人的脚印。

新的希望

当我提出做生态农场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好多朋友送来支持与鼓励，可以看出大家从心底里都希望看到更多生产自然健康食材的小农场出现，希望看到乡村的繁荣。

家里最先响应的是我的姐姐和姐夫，姐姐放下所有的工作，成了一名农妇。姐夫也成了农场的会记、后勤与兼职快递员。



爸妈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开始比较反对，渐渐地开始接受，并喜欢着。我知道他们是希望孩子们待在自己身边，传承农业，只是担心孩子们的未来，怕孩子们受苦。

家庭农场开始了，取名“咱家农场”，寓意，希望做一个与支持生态农业的朋友们共享健康食物的信任平台，大家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协力生产健康食材。

于是，在各种质疑声和好奇的眼光中。咱家农场开始断农药、化肥、除草剂，自己做堆肥改良土壤……



事实证明，我们可以做到！看这土地，它是多么有生命力！在这最开始的一年，作物虽然产量低了，却更加健康，食物更加美味！当朋友们跟我说他们吃出了小时候食物的味道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欣慰与喜悦！

这一年，最开心的当属老妈，再也不用打那难闻的农药了，事实上农药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农民，每年都有很多农民因在打农药的过程中中毒住院的。老妈经常很自豪的跟邻居说，我们家不用农药了！



这一年，我学习了很多以前在学校和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了解了很多农人的传统智慧，学习了一些传统手工艺，像做老酵子，发面，还有一些传统自制的

小工具，比如这个简易的挑豆子的工具，不用那些轰隆隆的“费电”的大机器，一块木板就解决了！我不断被这些传统智慧所折服，小的是美好的，在这个能源危机的时代，这些精巧的智慧真的需要被传承下去，这是我们或者我们后代们生活的一道防线！

这一年，我们收获了很多朋友。他们非常信任咱家农场，给予我们很多的支持与建议，就像家人一样。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希望咱家农场以健康食材为媒，向这个世界传递爱。

我们坚信，生态农业，道法自然，这是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一种对土地、对农民、对消费者都有利的美好的生活方式选择。

我希望“咱家农场”像一颗生态农业的“星星之火”影响更多人，希望更多地农户加入进来，希望更多的人支持健康消费，希望我们的更多土地得到保护，希望生态环境得到复苏，希望世界充满爱与信任！

乡村，是美好的。安静、纯朴、简单、智慧，相信你也会喜欢的！



传统手工艺继承人薛继芬老人访谈记

贾雪梅



人物简介：

薛继芬，女，82岁，阜南县柴集镇王老村常庄人。

2012年2月18日上午，王殿敏阿姨带领我们一行四人去王老村常庄拜访，因为柴集镇上是逢双的上午赶集，我们去的时候又刚好是上午，大多数人都不在家，先前是准备去分成两组分别去两家拜访的，因其中一家没有人在家，我们一行四人就去了常庄马家，我们快要到的时候，马家大媳妇石秀影和她婆婆正在菜地里干活，听说我们来的原因后，马家大媳妇和她婆婆薛继芬老人十分热情地请我们一行人进屋说话。

仪方姐和怡婧姐和马家大媳妇石秀影聊天的时候，我和鱼翔姐和薛继芬老人谈了起来。

薛继芬老人老家柴集镇上，因家里贫困，在其四岁的时候就随母亲去要饭。据她的描述，她父亲早逝，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大约是四岁）就背着她远走他乡要饭生活，要饭走到河南的时候，她的母亲给她定了一门亲事（她因此成了童养媳），之后就一直住在未婚夫的家里，到她 18 岁的时候，才正式完婚。当我们问她为什么会答应这门亲事的时候，她说母亲带着她要饭，居无定所，食不知饱，能有个依靠总是好的。

在薛继芬老人小时候，村里人大都不上学，只有有些地主的儿子才能去上学，女孩子是不可能有学上的，因此在她十多岁的时候，就学着干活了，当我们问到绣花鞋的时候，她很自豪的说，她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会，纳鞋底子，做鞋梆子，样样都行，她还给我们看了她随身携带的“顶针子”（一种类似戒指的东西，不过要双普通的戒指宽一些），说是在纳鞋底子以及做其它的针线活的时候戴在中指上，可以用“顶针子”把针顶进去。她说在她没有其它的活的时候，她就做些针线活，在她最能干的时候，两三天就可以做一双鞋了，如果做得快，一天就可以纳一只鞋底子，在加上做鞋梆子，缝鞋子，差不多也就三天的时间就可以做成一双精致的鞋子了。她说那时候，家里人穿的鞋子大都是她做的。她还会纺棉花织布等许多手工艺，家里人的衣服也是自己做的，穿上又暖合又舒服。

在她 29 岁的时候，也就是 1959 年，当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她的丈夫被饿死了，她一个人带着一个儿子无处可去，就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柴集，回到柴集没多久，她就嫁给了马家，为马家添了 2 个儿子和 3 个女儿，一家人都挤在两间土房子（那时候，人们住得都是土房子，用土坯子盖成的房子，冬暖夏凉，房子比较矮小）里，家里的椅子也是用泥巴做成的，一到下雨的时候，屋子里一片泥泞，生活非常的艰苦。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实行吃“大锅饭”，当时是按工分吃饭，家里的东西都交给了工家，一家子人都吃不饱，但慢慢的都熬过来了。说起往事，老人家眼圈都红了。

直到现在，薛继芬老人一直住在大儿媳妇石秀影家里，大儿子家也不是很富裕，我们参观了她们的房子，右面一间屋子与堂屋只是用一个竹子编成的席子挡着，屋里面甚是简陋。她们家在房子前面有一块地，在那里开了一个菜园子，种了各种各样的菜，一部分留给自己家人吃，其余的都拿到集市上去卖挣点零钱，卖菜也不容易，一般都是一，两点的时候就要起床去集市上占地方，说是去晚了就没有铺位了，在集市上卖菜一直到下午两三点的时候才回家。在集市上，她们不舍得去饭店吃饭，有时候就啃干馒头加点榨菜或是酱豆充饥，听到这里，我们一阵心酸，才知道如今的我们是多么的幸福。

老人家的身体不是很好，曾经动过一次手术，说是因为患了阑尾炎。我们注意到了老人家的手，一只手布满了老茧子，瘦得皮包骨头，可以清晰的看到手骨凸出的部分，看起来又可怕又让人心疼。据她所说，这些都是以前干粗活的时候留下的。现在的薛继芬老人已经不做鞋子了，说是干不动了，手腕没有劲了，但她还是习惯把“顶针子”随身携带着，习惯是很难改变的。

当我们问到她有什么期望时，她说她想念二儿子了，她的第二个儿子外出十六年没有回来了，现在已经在外面成家立业了，只是偶尔往家里打个电话（一年也就一两次），但都是和他大哥说几句话，从没有和老人说过话。说到这里，老人家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们看着也非常的心酸，不忍再勾起老人的伤心事，我们随即转移了话题。

虽然马家现在的生活不是很富裕，但现在的薛继芬老人觉得自己很幸福，她喜欢拿现在的生活和过去的生活一起来比较，然后就觉得现在的自己非常的幸福，大儿子和女儿也都孝顺，现在什么活都是大儿子和大儿媳妇干了，她很开心的说，大儿媳妇今年都 59 岁了，还是那么的能干能吃苦，心灵手巧的，不光家里人穿的鞋是她做的，她在闲的时候，也会帮王殿敏阿姨纳几双鞋底子挣点钱。用她的话说“儿子媳妇好，就什么都好了”然后她呵呵的笑了。

我们要走的时候，老人家和她大儿媳妇拉着我们的手送出了老远老远，还挽留我们说在她们家吃饭，我们执意不肯，她们就边走边说一直把我们送到了村外还不忍放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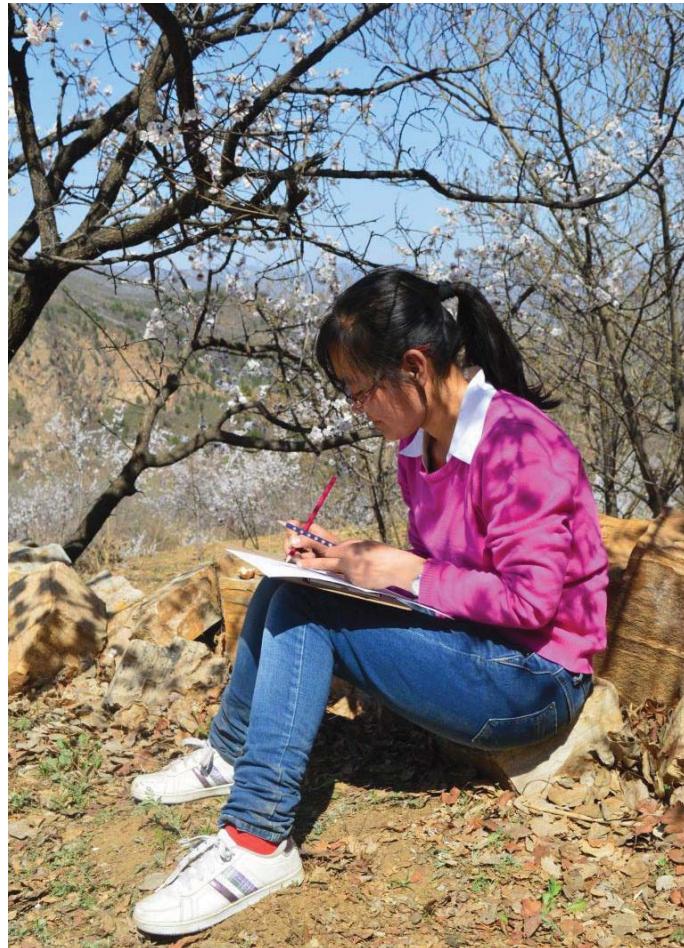
（本文选自 2012 年对外经贸大学惠禾三农协会“王老村手工艺布鞋发展现状”调查访谈）

我是一棵山树

尹海霞

引子

今生你是愿做一枚叶子，自由自在、飘飘荡荡，还是愿做一棵山树，扎根于深深的泥土？你可知人生如茶，注定要起起伏伏？多年的漂泊，是否想归依故土？路漫漫其修远兮，你是否还在上下求索？-----



远 离 家 乡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孩子。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是个喝着家乡的井水、吃着自家的玉米面长大的农家女。

和众多的农村孩子一样，走着求学的路，希望有一天能鲤鱼跃龙门。但是，我这条鲤鱼比较笨，而且还是条少鳍（偏科）的鲤鱼。高考时，语、英、史、政

都考了 100 多分（每科 150 分），唯独数学只考了 40 分，连总分的尾巴都没抓着。于是我这只少鳍的鱼进了一所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师范院校。

师范毕业后，工作没着落，偏偏我这只不健全的鲤鱼心气还很高，不甘心一辈子拘泥于这个小池塘里，一心想往大海的方向游。于是在征得父母的同意后，我怀揣着美好的向往和憧憬，提着沉重的行囊，在家人的叮咛和感伤中，踏上北上的征程。阔别了生我养我 20 多年的故乡。别了我的童年，别了我的亲人，别了故乡的喜怒哀乐。那一刻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

天方夜谭

成为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实属偶然。当时我的一位同学在大兴某打工子弟学校教书，恰巧又缺英语老师，我便补了这个“漏洞”。说真的，我打内心感谢我这位同学，是他一番“天方夜谭”般的忽悠，让我不像那些刚走出校门的毕业生，面对打工子弟学校，憧憬与现实的反差太大。而且，也是他的忽悠，让我从未觉得打工子弟学校的环境有多么艰苦。

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临去打工子弟学校之前，我的同学给我上了一堂意义深远的、鬼话连篇的“政治课”。大体内容如下：“××，咱先把丑话说在前头，免得到时你说我坑蒙拐骗。我们那学校条件特差，地理位置偏僻，在大山沟里，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我们得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然后再换驴车，再走山路，要是晚上走夜路，没准还会遇上野生动物。吃的跟猪差不多，一个星期也见不到肉沫。我在那儿呆了一个学期，瘦了十多斤……”我当时不自觉得就咯噔了一下，整个心都拔凉儿拔凉儿的。心想，照他这样一看，这哪是学校呀，整个一深山老林……

现在听起来，你可能会觉得可笑。这明明就是骗人的鬼把戏嘛，但当时，我真的相信了。毕竟我从未接触过这种学校，不知学校的情况如何！不过他这番话并没把我吓倒。我当时就想：既然你能呆得住，我也能呆得住！而我也确实是抱着这种想法去工作的。路上，我们的确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但下了车后坐的是三蹦子，不是驴车。然后又步行了几百米，来到了一个比较荒凉的地方，但却没有山。我正纳闷，琢磨着何来的山路可走？他却说到了。屹立在我面前的是一座二层小楼，而且看上去还很新的。那一刻，我才如梦初醒，“你骗我，这不挺好的吗？哪像你说的那么可怕！”他反唇到：“我不吓你，你会觉得这好吗？还不如咱老家呢！”的确如此，如果不把我的期望值压到底线，我是不会这样认为的。是他这番天方夜谭般的打击，让我一直对打工子弟心存美好。即便是环境差一点的学校！这也许跟我上学的经历有关，在老家，我上过的小学、中学跟这些学校都差不多。红砖绿瓦我觉得很美，比钢筋水泥、地板砖更有感情、灵性！

我在那个学校干了大概 9 个月（不到两学期）。日子还算过得开心。管吃管住，每月 600 元工资，教学任务也不是太重，一个人无忧无虑，像只快乐的小鸟，生命如歌（每天同事都能听到我欢快的歌声）。现在想想，在那个学校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两个字，便是“歌”和“冷”。“歌”字不必再说，提到“冷”字，我仍心有余悸。

我天生就是个怕冷的人，而 9 个月的教学经历，有 3 个月经受着冷的考验。当时的学校虽有暖气，但锅炉在一层，我们的教学楼在二层，供暖设备有些不畅通。老板又精打细算舍不得烧煤，所以屋子很冷。因为这，我自备了 2 个暖水袋。晚上睡觉时，脚下踩着一个，怀里抱着一个。而且因为冷，我差点命丧黄泉。说来很惊险！当时的学校没有办公室，晚上老师备课大都在寝室。而宿舍又太冷，所以我们有时就去厨房备课。那次同事们们都休息了，只有我一人仍在挑灯夜战。为了暖和些，我把厨房的门窗全都关得严严的（但炉火封得死死的）。大概 10 点多钟的时候，我便觉得头疼，眼睛也有些睁不开。我下意识的打开窗户，恰逢那会想上厕所，于是我推门出去。刚走出厨房，只觉得两腿一软，咣铛一声，便倒在走廊里，不省人事。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冰凉的地板上躺了多久，醒来时仍记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人迷迷糊糊地上了厕所，迷迷糊糊地爬上床睡觉，半夜好像还从床上摔下来一次。第二天早上当我醒来时，后脑勺还在疼。

事后跟同事们说起这件事，他们都为我感到后怕。想想也是，如果当时我走不出来，而是躺在厨房里，那我可就一命呜呼，命丧打工子弟学校了。不过好在有惊无险，大难不死，也希望能有后福。

树 的 姻 缘

可能人都容易厌烦！2 个学期不到，我厌倦了那儿的生活，也没有了新鲜感。于是经朋友介绍，我来到了现在所任教的学校。刚来到这个学校时，工资待遇和那边差不多（600 元左右），但工作量却大了很多。一开始我教 5 个班级的英语（每班 50 人左右），一周 25 节课。每天光作业就得批 200 多本，不含练习册。某同事说：我是全校最忙，最能熬的一位老师。每晚 11 点多钟睡觉，早晨 5 点左右起床跟车接学生。一天工作 10 多个小时，但我却忙得不亦乐乎。即便这样，我还能从微薄的工资中省下钱上补习班，参加自学考试。现在想想，我自己都佩服当初的自己。对工作充满激情、认真负责、不怕苦、不怕累、不与人勾心斗角、积极乐观向上。反正自我感觉良好（但并不代表他人也认为我好）。

至今，我已在学校干了 4、5 年，都成了元老级的人物。之所以会赖在这儿不走，是因为在这里我遇到那个与之相守一生的人。从此有了依靠，有了牵绊。茫茫人海，终于有了家，有了落脚的地方。我答应跟他时，他手里只有 2000 多

元的现金，还有一辆在校服役的“红叶中巴车”，暂且估价1万元左右。但那却是“不动产”。没有钱，没有房，几乎在一无所有的状况下，两个人居然走到了一起，也许这就是姻缘，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说起来我的婚姻，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我们的婚事是在我家办的，父母没让我们花一分钱，一切都给我们筹备得好好的。我父母等于是把自己的女儿倒贴给了人家。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是2006年腊月二十五回的家，二十六拍的婚纱照，二十七结的婚。婚事虽说很简单——没有婚纱，没有戒指，没有乐队、婚车，但我已经很知足了。在我的思想里，婚礼只是个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婚的两个人是否相爱，是否得到了别人的祝福。而这两样我都得到了，又有什么可苛求的！

但自从结婚后，我再也不是那个无忧无虑、歌不离口的女孩子了。我从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鸟，退化成了一只家鸽，但我心甘情愿。虽说我出生在80后，但我骨子里却是个很保守、很传统的女人。我觉得相夫教子，这是女人的天职。我开始与锅碗瓢盆、柴米油盐酱醋茶打交道。每天，在学校是学生的保姆，回到家是家庭的保姆。婚前婚后，我最大的感触就是“重压”。因为有了家，就意味着有了责任和负担。婚前，我想的是如何提升自己，继续求学；婚后，我想的是如何挣钱养家，分他的负担。

树 的 成 长

打工子弟的教师工资待遇低，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为了缓解生活的压力，走出拮据的境况，我决定离开打工子弟学校，另辟一块小天地！

2006年暑假，我们决定与人合办一所幼儿园。当初之所以会选择合伙，是因为自身能力有限，底气不足。但我们错就错在选错了合作的对象，把“合伙经营”想得太简单。当时为了少花钱又能把幼儿园办好，我和我的爱人付出了不少的心血。为了买到便宜的课桌椅、玩具之类，我爱人找来一大本电话簿，上面几乎有北京所有学校、幼儿园的电话。我的爱人就整天地抱着这个电话簿，一个接一个地拨，稍有眉目，我们就前去打探消息。2006年那时还没有“一卡通”，为了省钱，我爱人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炎炎烈日下，气温高达三十八、九度，我爱人骑着自行车载着我四处奔走。他的衬衣常被汗水浸透，饿了忍着，渴了喝最便宜的水，一天下来累得他腰酸腿疼。苍天不负苦心人，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家即将关闭的幼儿园。我们找到园长，说明来意。园长愿意把课桌椅、玩具低价卖给我们，甚至还答应还送我们一些小玩具。就这样我们省下了一大笔钱。我们还请来公益机构的朋友帮我们在墙壁上画卡通人物、做墙板……在他们的帮助下，

我们把幼儿园装饰得漂漂亮亮的。再加上幼儿园地理位置好，我们刚开园不久，生源就爆满。那半年我们挣了很多钱，但也仅此半年。

提起我们退股的原因，至今我都满腹的委屈，满肚子的苦水。小的摩擦也就不必说了，但最让我们无法容忍的是：我们从老家结婚回来，屋里值钱的东西都丢了，照相机、洗衣机、电视机、DVD……就连米面都丢！我们报了案，但派出所却置之不理。其实，我们心里明白，祸起萧墙、家贼难防。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还怎么合作！有道是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于是我们选择了退股。虽说有些可惜，但并不后悔。这也是我有生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世间的阴险狡诈。但我是个心无“恶”念的人，在我的思想里只有好坏之分，有善但没有恶。这可能跟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有关——和谐的家庭、和谐的村庄，造就了我善良的底蕴。有人说我会因善得“福”，也有人说我会因善生“祸”。未来我也不知我会有什么样的生活，但我相信，记住世间的美善总比记住世间的丑恶要幸福。所以过了这么长时间，我早已对这次失败的合作释然，但我却永远都忘不了那些帮助过我的人；还有我爱人骑自行车驮着我的画面……

离开幼儿园后，我又回到先前我工作的学校上班。虽说钱挣得很少，但日子却过得很舒心。我也想尝试着自己再办个幼儿园，但始终没找到合适的地方。而此时我的爱人选择了回家增驾拿 A 本。他想回来开大巴车，等找到合适的机会再自己买车。2007 年的上半年，他等于一分钱也没挣，而且还要从已有的积蓄里拿钱。家里的日常开销全靠我一人的微薄工资来支撑。有道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当你一旦挣过很多钱，再回过头来挣这些许的工资时，内心无法平衡。再加上经济的压力，我开始想办法挣钱——办补习班、当家教。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我周末从未休息过。虽然挣了不少钱，但却生活得太累！也不知道这样下去生命的意义何在？这段时间我的身体一直不好。医生说我的体质太弱了，需要进补，把失去的元气补回来。现在想想，我的身体之所以会这样跟长时间的劳累和疲惫有很大关系！

树 的 机 缘

2008 年的五月份至今，我经历着人生最大的一个低谷期。那种感觉似天崩地裂、炼狱一般。我的生命似乎完全失去了支撑。无意间，我参加了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举办的首次打工子弟教师作文联谊赛，并荣获“特别贡献奖”。就因为那篇文章，我认识了卢生、赵玲……并相交至今。我相信这是一种机缘，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是他们拉了我一把，让我不至于继续“沦陷”。这种知遇之恩，我没齿难忘！

从此，我开始参加他们的各种活动。在北京漂了这么多年，总觉得生命如浮萍，没有归属、没有根。打工子弟教师这份职业似乎也不被认同，不被尊重。但在那里，我却找到了我缺失已久的东西。茫茫人海中，心灵除了家，又找到了一个可以栖息、滋养的地方，这是何等的幸运！

在 2008 年农民之子举办的自然教育夏令营中，我担任辅导员。在这个活动中，每个辅导员都要有一个自然名字，我也不例外。我给自己起名“山树”。因为密云的西湾子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放眼望去满山都是树。并且夏令营中，有个小活动——在自然界中寻找自己的影子，并阐明原因。我寻找的影子仍然是“树”。我说：我希望我是自然界中的一棵树，一棵不再漂泊的树。我会把根深深地扎在泥土里，吸取土壤中的养分，让自己变得坚强。不管未来的路途中经受多少风雨，都会坦然、积极、乐观地去面对。同时，我也会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贡献自己的点点绿荫。

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张雨生的一首老歌——《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其中，有段歌词是这样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时时仰望天，等待春风吹拂。但是季节不曾为我赶路，我很有耐心，不与命运追逐。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疆土，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我觉得这段歌词是我内心的写照。我从不苛求荣华富贵，但求这一生过得充实、有意义。

也不知为什么，这段时间我常常在思考：我生命的价值、意义何在？我如何才能实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渴望做一棵树，但这么多年我却是一枚飘荡的叶子。“任碎碎点点的阳光穿透身体，任断断续续的秋风缠绕离去，任飘飘荡荡的白云把心融化。面对天空的憧憬，我无数次地借风起飞，又无数次地飘落。漫长的自由过后，忽然感觉疲惫和孤独，我想起很久很久以前养育我长大的那棵树。浓浓的思念中，我开始寻找回家的路……”

是的，这段时间，我总会下意识地想起我的故乡——想起故乡的风土人情，想起故乡朴实的村民，想起那麦田和泥土的芬芳……落叶总要归根，可是我两手空空地如何回去？如何去报答我的父母？如何回报生我养我的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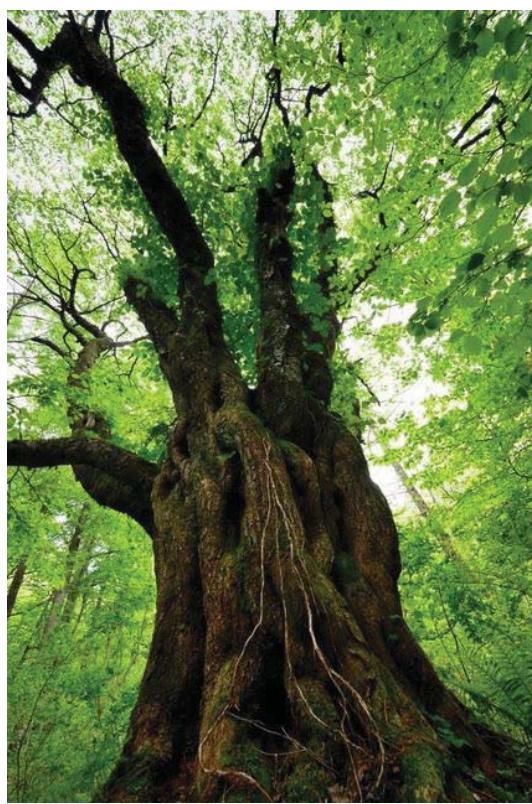
那么既然这样，我是否后悔这些年的飘荡？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不后悔！如果没有这几年的漂泊，我不会有现在的家；如果没有这几年的漂泊，我不会成长，不会触摸到这广阔的世界；如果没有这几年的漂泊，我不会接触到做公益事业的人，不会接触自然教育、华德福理念，不会接触中医，不会想自然农业，不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感兴趣……我曾听说过一句佛语：人生如茶！清涼平淡的水是沏不开茶的，只有沸腾滚烫的水，使之上下翻腾才能沏出茶香！而我愿如壶中之茶，承受人生的起起伏伏……

心 愿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身体调养好，要个健康的宝宝。于此同时，提高自己的修为，为前行的路积蓄能量！但我内心一直有个美好的念想，那就是当我落叶归根时，能把好的教育理念、中医、自然农业……带回我的家乡，服务我的乡人。如果我的一生能够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并以此为终结，那么我的生命便是圆满的，哪怕经历再多的坎坎坷坷、风风雨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此，衷心地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没有你们，我的生命会缺少滋养、失去光泽！也希望前行的路上，有更多的师和友能给我指引……

最后，就让艾青的这句诗作为结束语吧：我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原载于打工子弟教师内部刊物《烛光通讯》2009年第三期）



（此图片为网络下载）

致丽惨案四女工 奇妙恩典二十年

洗丽婷



一重山、二重山，重庆山村，山重水复。

桃花红，李花白，山区一片片黄色油菜花田旁边，闫小建努力拉下一棵椿芽树主干，王雪花紧张说：「别把它弄断啊。」两人合力把几棵暗红嫩绿如玛瑙的椿芽摘下，满意笑了。远远的戴天玉，在田陌里找野生鱼腥草，撑着拐杖的陈玉英（小英）坐着看姐妹们快活辛勤。

据称，唐代以来，就有驿者早春策马从安徽驮负雨前椿芽回西安朝贡。这片椿芽地，是小英自小长大的老家，位于重庆忠县汝溪镇广兴乡马头村。个多小时车程，一行人回到县里雪花家，天玉马上用镇醋做鱼腥草冷菜，雪花弄好一碟椿芽炒蛋。重庆久旱，第一道春雷前的晚上，记者首次尝到第一口椿芽，从心赞叹：「不同凡响！」小建只管在旁边笑，亲手做的腊肉腊肠香气缭绕，最可惜小英不能同来。

若见过一九九四年春天四个女孩的模样，就会明白为甚么眼前椿芽一碟，令人如斯兴奋。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九日，香港商人劳钊泉在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开设的致丽玩具厂，因为电线短路发生大火。厂方为防偷窃，在所有窗户装上防盗铁栏，四个走火通道只有一个没有上锁，四百多任务人只能从仅有三十吋阔通道逃生，最终导致八十七名工人烧死，五十人受伤。其中伤势最严重的四名女工，包括来自重庆的陈玉英、王雪花、戴天玉及河南的闫小建，烧得皮开肉绽，被转送到附属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的广州南方医院深切治疗。

香港一份报纸以〈昨天，她们没有元旦〉头版报道四名女孩伤势，令不少香港读者感动同情，一下子捐出近五十七万元港币，盼望她们好好活下来。记者当年跟随报社处理捐款的团队到广州，探望四个女孩时看到的情景，深深震动。

四名当时只有十七岁至二十一岁的女孩，获南方医院惠侨楼全力救治。那里是各国政要或特别人物治疗的地方，被视为军中特区，一些台港要人，也曾在那秘密医治。走进密封病房的时候，一阵阵皮与肉、血与腥、红与黑的烧伤味道，攻入鼻子心肺，闷得人惊心动魄。医院烧伤科主任周一平掀起盖着小英的布子，烧断了脚掌的左小腿，在黑啡粉红血肉里露出小截白骨，看得人心里一震。医生判断，四个女孩皮肤最高达七成多烧伤，深度三度，犹如脆皮乳猪，估计她们会终身残废。

转眼今秋将是大火二十年周年，四个女孩已为人母，在当年看来，这决是所有人眼中的奇迹。患难里跟香港人联系上的四个女孩，是从非常非常艰难的日子走到今天的。两地人心，何时没有过真感情？

二〇一三年三月八日至十一日，记者在重庆再次跟四个女孩见面。在机场等候闫小建一同乘车到忠县，她对人友善，当年一脸烧得昏红焦黑，还是努力撑起身跟访客说话。现在两片眼皮以下的一张脸，做过多次手术仍留伤痕。九六年，她嫁给了河南乡间一个农民。

「为甚么跟他结婚？」问题也可以倒转的。

「他家很穷，他说，只要我人心地好，不是傻的就可以了。」浩瀚平原耕作七亩田，一年收入七千多元，丈夫出外打工，每年能赚两三万元，一家省吃俭用，

刚好够支付两个孩子的学费。儿子十六岁，女儿七岁，是学校优异生，也是她的希望，但将来上大学的开支，暂时还是想不来。冬天种小麦，夏天种玉米，每天能浇灌两亩地，这可能是上天给小建最合适的工作。

她的生活片段，在入黑后的山城公路上，一段一段飞过。「小学校长，知道我的性格，请我带两三岁的幼儿班。」可是家长反对，最后她推辞了，「我不想影响学校的名声。」说得淡淡的，心里其实委屈得很。校长看得到她的爱心，她却只看校长的难处。多年来受过的歧视目光，不言而喻。记者鼓励小建下一次机会再来之时，一定要接受。

「你不尝试，别人就只看你的脸，看不见你的能力。」她垂头笑一下，然后紧紧执着记者的手。不久，她就倒头在车里睡着了。三个多小时车程完结，下车时，雪花与天玉等着，寒暄握手一刹，看见一张久等的脸孔，是小英哥哥陈剑。当年他写信给报馆，感谢香港人让妹妹在彷徨里得到治理，也让他完成大学课程。毕业后，他在政府工作，一直以来守护着妹妹，从不离弃。

只能说，这是个奇妙恩典旅程。四个女孩的结局，应该是善心人最好的回报。像电影另一段戏，她们已淡入三十多四十岁好妈妈角色。雪花带着唇红齿白的女儿前来，可能在单亲家庭成长，初中小女孩说话不多，两条浓密眉毛，好比万语千言。

若不是为了心存感激，四个火劫女工可不愿意随便再接受访问。烧伤的皮肤、筋骨，破了又合，合了又破。四个人不时仍要想法子支付无尽的手术、治疗及更新义肢的费用。恐怖的大火逃生情景，四个人一生不能忘记。重庆第一个晚上，无可避免谈到从地狱之火走出鬼门关的一幕。

九三年火警发生时，一秒一秒加热的工厂，四个互不认识的女工拚命从二楼往一楼门口走去。一个谜团至今仍然在天玉脑里挥之不去，「我清楚看见一个人跑过了门口，一手把门闸拉下来，我刚好被关在里面，跑不出去。」之后她昏迷了，没有人知道这是幻像还是真实。小英记得，有些人从二楼飞身跳下来，踏着倒下的人堆跳了出去。她被挤得两脚朝天，浓烟呛得不能呼吸，她出尽气力把右手举起，掩着鼻子，之后也昏了过去。

火怎样把她们烧燃？这一幕变成空白。消防员来到，百多具人体，生生死死，雪花几乎被当成尸体抬走，因为消防员大力一抛，她被摔得痛醒了，用尽全身力量把眼睛睁开，被消防员看到，「否则，我可能被掉去火葬了。」

「睁开眼睛时看到甚么人？」记者问。

「我只看到天空。」她左脚脚趾被烧断了，现在要穿特别脚套走路。她很记得，小建送进葵涌镇医院之时，头烧得发胀像个大西瓜。后来两人在南方医院又住在同一病房，现在见面，特别亲切。

访问的第二天早上，四个女孩到小英的自强残疾人服务站叙旧。她们心里面都有个小盒子，收藏了黑暗与光明的日子。小英从写字枱拿出一个小熊陶瓷公仔，述说小熊的一段身世。

「不知道谁送的，我把它捡起来，还修补过，盒子掉了，我替小熊拍了照片，放在 QQ 私人空间，像认人般，想把送玩具的人找出来。反正是我们受伤时候朋友赠送，忘记这个朋友好像是……，不过，找不到不要紧，反正我记得就可以。」

一串代表爱与祝福的音乐，四个女孩在病房最痛苦时候听过，直至八音盒坏了，音乐停了，感觉留在心，公仔保留着，带回家，间中又会猜想送音乐公仔的人。小建看见小熊，也想起河南家里的小山羊八音盒。「那时候伤得厉害，听到音乐，心很舒服，也在想，到底是谁留下八音盒子？」

「为甚么老想知道那人是谁？」记者问。

「我想，那人是关心我们的。」那时候，她们一身脓泡血疤，不能动，只靠护理员每天翻几次身体。趴着时，辛苦得喘不过气，只有仰躺时舒服一点，才能动手转一转八音盒的发条，看着公仔随音乐转动，感觉就好一些。今天相聚，又再讨论病房里的八音盒，天玉得到的是个会转动的小女孩；雪花记得音乐，但八音盒在出院时已经失掉了。

致丽当年为意大利著名玩具品牌 Chicoo 接定单，女工不眠不休赶货才得到约三百元月薪，连玩具的欧洲零售价都不及。那时候，小女工也没想过会收到玩具礼物。这场大火引发国际社会罢买代工国玩具，也直接导致中国劳动法诞生。

「真想知道答案？」记者问。

「想……」，小建当年烧伤昏昏朦朦，总是看不清来过的人，只有八音盒子的声响，天天陪在身边。近二十年后，谜底解开，她笑得更灿烂。四个八音盒是记者当年替报馆在一所以日式百货公司买来的。当时新闻部有同事建议买一点礼物送给受伤女工，最终决定买八音盒，希望音乐让她们得到安慰，也是新闻工作者的一点关怀。不记得会转动的跳舞女孩造型只有一个还是两个，于是加入了其它动物款式。

天玉又想起，除了八音盒，后来又有内地记者送来小小收音机。小英说，有一次她们还向电台点了歌，分别是《星星点灯》及《水手》。她即席把《水手》的两句歌词纯熟唱出：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甚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甚么，擦干泪不要问为甚么。

「那个时候感觉这两首歌好有力量啊！」小英说话反应都很快，只是，这样的歌词，心里的过去，风一样吹过，现在又涌上心头。四人住在烧伤病房半年至九个月，回乡后是没完没了的大大小小手术。真正走过风雨的人，一张烧伤的脸孔，几个包裹着伤痕的身躯，几颗曾经绝望的心，痛是轻是重，每天存在，从无停止。一时间，女孩们沉默了，有人低头轻轻「唔」了一声之后，天玉忍不住别过脸去，在一头散发下拭抹涌出的泪水。小建的泪珠，大颗大颗滚落粉红伤疤上，像流过那段烧伤后的漫长岁月。雪花苦笑掩饰，记者开口发问，却是言不由衷。想哭，是因为明白。

「天玉，你觉得有希望吗？」

「有啊。」表面较沉默倔强的天玉，哭的时候，却是最凄惋委屈。

「谁鼓励你啊？」

「我老公。他甚么都会替我看，教我做，然后，他会唱歌给我听。」她九六年嫁给了念畜牧业的大学毕业生余达。

「他会唱甚么歌？」

「他甚么歌都会啊，甚么歌都唱得好听。」她破涕为笑。天玉现居重庆市私人屋苑，每天为念高中的女儿余悦准备三餐。最初在家开炉点火，点不着，啪一声，她就怕得跑掉了。今天她仍然怕火，但为了女儿，每天仍得煮饭。余达经常要出差，教导各地农场猪只饲料处方。九五年在酆都鬼城认识养伤的天玉，没几个月就决定结婚，作为天玉最亲近的人，余达总想好好保护她，即使有时候大家都会躁火。「第一次看到她被烧伤的背，真的很震撼。」

当年身上大片伤疤都盖在白纱布里，现在，只有丈夫才懂她们的伤痛。小建左臂腋下烂肉结成前后两片肉蹼，左手不能向天垂直举起。一大片胸膛也烧得溃烂不能哺乳，偏偏她却生了一男一女。

伤得最严重的小英，足足做了三十七次手术，最后左小腿装上义肢，现在要靠拐杖走路。剩下三只手指的左手掌，僵硬向上翘。她走过的路，是最艰难的。当年一身腐烂臭肉，根本好不起来，离开南方医院前，医生对父亲说：「看她能否再多活几个月；若能活下来，就看她能否坐起来；她若能坐起来，已经是奇迹了。」父亲把说话藏在心里，在手术床上捡回女儿的腿骨碎片，心酸地用手帕包起带走。

当年各女孩带着约十六万人民币捐款回乡养病。小英躺在担架床上回到摘椿芽的忠县汝溪镇，村里人都来观看这个如臭虫一样的伤者，然后捂着鼻子走开。今天，她在一片绿色菜田前面跟记者说，「当时，我告诉爸爸，若我死了，就埋在这块田好了。」毫无指望的时日，血干了又含脓；脓干了，不知何时又会划破伤口。父母无言守着女儿努力换药；哥哥为着小英当「打工妹」供自己读大学，感激变成放不开的歉疚；姐姐看到妹妹的伤势，只敢走出屋外嚎啕大哭。

约有一年的岁月，血干了、脓凝固了、泪停了，生命无声息继续。小英静静地像枯萎小花枝爆出嫩芽，想看外面的蓝天，父母兴奋一把抱起她时，才知女儿身体僵直如木乃伊，根本坐不起来。凭着无尽母爱，母亲用棉被一块两块三块的把小英头颈及身子垫起，被垫得越高，身体弯曲幅度越大，一点一滴，九六年小英终于坐起来。父母兄姐决意把小英搬出县城，要她重新成长。哥哥经常背妹妹从九楼到地下坐轮椅走动，不理黏一身血脉。一家人守着厅里棉席，看小英走出血印，一天一天，说不完的故事。小英现在不但能走路，还走出坚强的人生，现在有纯良的赤脚牙医老公，也有一个会为她在伤口吹风的伶俐女儿。

几个烧伤女孩的家人，都是守护她们的天使，生命还是有惊喜的。记者第一晚入住忠县酒店时已经天黑，早上听到船笛长鸣，清早上街才知道原来住在长江旁边。第二晚听到春雷响起，早上离开忠县到重庆市。

好山好水，四个女孩相识于患难。六月是小麦收割月份，小建答应把磨好的麦粉，寄一点来香港。金黄麦海摇动后用麦粉造的馒头，单是想，就很幸福了。

（本文原载于《苹果日报》2013年3月24日）



生命当如夏花

王茜

题记

当要回忆所谓的“大学生活”并且写下来和大家进行分享时，突然发现生活是理不清的，生活的经验和感悟就像脚下的路，走过才能知道路上的风景，才能知道踏过荆棘的坚韧是如何练就的。

当大荧屏上闪烁着种种关于青春的影视作品时，勾起了所有人对于青春的回忆和思考，尤其是将青春定格在了宝贵的“大学生活”中，不同时代背景下的青年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祭奠着已然逝去的青春岁月，不管是沉寂般的默哀还是狂野般的嘶吼，亦或是柔情般的落泪，都似乎不足以表达满心的落寞和留恋，于是乎创作出了大量的伤痕文学，还塑造了一批批具有鲜明特点的青年人。如果说我们是在告诉自己和世人这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和社会，那最好的呈现元素便是流金岁月中一步步留下的生活印迹，因为它是“大时代”和“小时代”的缩影。



当繁华逝去，静守孤寂时，才能回味真实生命历程的意义，并含着泪花告诉大家：“成长是一个凄美的故事”。他凄美不仅是因为喧闹的青春太过短暂，也不是因为付出的汗水和流下的泪水，而是黑暗中透视的光亮刺痛了我们的心脏。

一、迷茫从哪里来？

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过我们为什么要从小在那么封闭的学习环境中刻苦，每天需要死记硬背的啃那些书本和试卷上的东西，但无疑这些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

学习模式，因为只要那样做就会拿到好成绩。此刻的自己思绪万千，短暂的大学生活牵动着的是走过的所有求学之路。越是小时候发生的事情越是浮现在眼前，凡事总有前因后果，指引我们前进的不是浅层次的行动，而是早已潜伏的思想。

7岁时，调皮的自己总是能带领着伙伴们窜行在村庄的每个角落，对于村里那些红火、热闹的场景好奇极了，即使有威严的老师在，即使有学校的时刻表管束着，仍然战胜不了强大的好奇心，所以，第一次被老师的惩罚（校门口罚站立一上午）是为了看丧礼把小伙伴们带走了，老师上课找不到人气的火冒三丈。

12岁时，叛逆的自己总是能找到反抗的理由去维护受伤的幼小心灵，所以对于小小年纪的我们，对早晨6点起床，中午1点半放学，2点半上课，下午8点放学，周末只有一个下午休息日的孩子来说，那是酷刑，所以会选择在黑板上公开写大字辱骂老师，形成反抗，直至班主任无奈哭泣，引起校长注意而结束。那时的自己是班长，那么双方的沟通和谈判便成了代表，但绝对不能妥协于教条和体罚式的教育环境，毕竟我们更加需要孩童般的自由和玩耍，而这样的思考和行为影响着之后的每一个阶段。

13岁时，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乡村越加成为了人们口中说的落后代表，包括教育，所以教育资源越加向城市集中，在一股入城大潮中，我挤进了很多人想去的城市中学，面对无限的自由和绝对的竞争，我们有了人生的第一个目标，那就是考入重点高中，但天知道那是谁的目标，起码不是我的。

16岁时，并未如大家的愿望进入“富裕和高傲”、“贫穷和自卑”那么明显的重点学校，它开启了我所谓的“失败”历程，但自己总是能活跃在各大场合和人群去找寻价值，继续当班干部，拿各种能拿的荣誉，去入党，去过各种自己想要的生活，只是忘记了我们人生第二大目标，那就是考大学。

19岁时，我糊里糊涂的踏入了高等学府，只是因为报考时不知去向何方而抄写了同桌的志愿表，所以，我没有期待过大学那个“神圣”的地方，我至今能说的是感谢山西农业大学这收留了我的学校，但我从来没有属于过这里！

当看到身边同学不停的追逐着社团、学生会、班干部、入党等各种新奇的东西时，我迷惑了，一路走来，自己的学习是为了求得知识，当班长是为了提升能力，获取荣誉是因为表现优异，这些事情不是应该顺其自然的么？为什么此刻的大家像脱离缰绳的野马？以至于为了那一点飘渺的东西浪费时间、放下尊严，陷于吃喝玩乐、趋炎附势、暗藏心机的地步？我意识到很多人并不是在自己的轨道上行走人生，或许大家7岁、12岁、16岁、20岁的每一个过程和转折都在错位着，我们用20年的宝贵时光建筑起的城墙在踏入象牙塔的那一刻全部坍塌了，以至于用更多的思想剔除大脑中原有的垃圾。

看着这些纷繁复杂，自己没有办法那么狂热，没有办法在人群中欢笑，以至于一度远离那喧闹之地和是非之人。独自行走于静谧的校园领略自然的美丽；独自蜷缩在图书馆的角落与哲人们对话；独自在教室认真的学习；独自在晚自习后的操场散步；独自看着形形色色的人……而自己只不过是想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思考过往的岁月和未来的人生，这是自己第一次开始真正探求生活和存在的理由，如果说为什么会从以前那么狂热、活跃的人变成冷静、低调的过客，我只能说是对于“青春的意义”有较为理性的思考，而这个意义里面没有世俗功利的名、权、利，他甚至没有意识形态化的“成功”和“成长”，而以后种种行事也是在此方向和目标引领下行进。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讲这个过程是不容易跨越的，而随即产生的现象用所谓的“迷茫”、“困惑”掩饰，是啊，在这样一个繁华和没有精神归属感的现实世界，怎么能逃脱那样的状态？

单纯的我们似乎还没有完全妥协，还在找寻自我存在的意义和这个大学赋予的生活，天真的以为自己是独特的，外放、骄傲、孤僻、脆弱是90后青年人的群体性特征，但是什么造就了现在的我们，我们越来越沉迷于个人狭小的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我们的伙伴是不会说话的网络、手机，是哼哼唧唧的调子，是只能看到个人情感宣泄的QQ空间，是无聊苍白的影视剧，是……不管我们选择以社团为单位的集体，还是以个人为主体的行动，都显得那么单薄，都无法抹灭身上的那些时代印记；无论是静默还是宣泄，都难以掩盖对于生活和现实世界的淡淡忧伤。是啊，我们怎么了？这个我们一直憧憬的世界怎么了？不管借用多少人的话或是看尽世间百态，依旧找不到答案，依旧还是在狭隘的世界里沉睡着或是纠结着。

二、意义是什么？

显然纠结的人于死气沉沉的宿舍和校园而言是一种进步，比在沉睡中的人更能展现一些青年的特质。但我们的纠结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就是复杂和简单的矛盾。

简单对于我们青年人来说亦如煎熬，在繁华和浮躁的大世界中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和过有意义的生活显然是了不得的，那就要细细问问什么是“有意义”？这似乎又是一个哲学式的问题，但意义通常都是在个人思想认识不断提升和实践过后才能总结的出来，它基于客观环境下形成的价值观念。每个青年人价值观念的塑造路径不同，但大体是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实践于现实世界形成的经验归纳，二是理论学习获取的一般观念以及形成的知识结构体系。对于青年人来讲我们并不能清晰的知道这些过程在塑造个人价值观时形成的影响，以至于每个时代

的青年人在时代大潮中多数是迷茫、困惑的。即使用不同的方法来找寻“物质”或“精神”的意义，我们仍然免不了陷于狭隘的个人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以至于被各种意识形态所异化，没有多少人能跳过这样的陷阱而实现所谓的“成长”。

反观走过的几年大学岁月，自己如同大多数的青年人一样选择以团体的方式回应成长话题，而这个团体除了班级就是社团了。社团对于每一个初入大学的青年人来说都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它代表着我们将要在这个平台上得到一些社会性技能，它代表着我们人生第三个目标的一个衡量标准，它代表着自由奔放的青春岁月即将拉开帷幕，是啊，如此繁杂的代表怎能不使我们这些一无所知的青年人盲从，怎么能不去满足一下好奇的内心。但似乎又开始了“本末倒置”的“选择”，又进入了复杂的程序化思维。常常会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将自己框住。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选择，因为这个主流社会能提供的价值观念和现实生存发展空间不是那么的多元，一路走过来无非也就是在实现标准化生产，而这也就是主流世界推崇的“制式教育”，只允许你我有一样的思维和选择，不一样的只是行业的种类。常常和伙伴们开玩笑说我们就是那“放牛娃”，重复着那个让人们嘲笑的故事，殊不知我们是在嘲笑自己。放牛娃放牛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娶媳妇，娶媳妇是为了生娃，生娃是为了继续放牛；我们很多人则是上学，上学为了考好学校，考好学校是为了找工作，找工作是为了更好的收入，好收入是为了好生活，好生活意味着房子、汽车、老公或是老婆，好生活下有个好孩子，好孩子再继续走我们的路径。这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不同资源和环境下的问题升级，如果说我们哀叹人生不就是如此么？那只能说我们文化的缺失和精神的沦落，是全民的沦落。

是基于这样的反思更或者说是对于“机械化、工具化”人生的恐惧，我开始走出来寻找有血有肉有生命力的青春，它不是出走，而是回归，回归人称之为人的本性。而正是这样的想法激起了我对于人生、民族和社会的无限好奇，所以，我希望能走出狭小的世界去外面广阔的真实世界探求自我的追求，这个外在的世界绝对不是很多人意识到的宿舍外的主流社团，也不是仍旧在工业化市场经济体系内的狭义社会，那还是没有逃离“放牛娃”的成长路径。

我一直相信天助自助者，只要是自己想要走出来，就一定能找到未知的世界。大学之幸是能结识那个陪伴我成长的“山西农业大学大学生支农队”，能和一批好孩子做点有意思的事情。而与其说社团是个平台，不如说社团实现了本质上的含义，那就是青年人因志趣相投而共同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志趣相投必是“志”为本，“趣”相辅。所谓“志”更多是基于对国家发展和民生问题的关怀而探求青年人的成长与责任，期间滋生出无穷的向上的力量来使大家相扶而行。这有别

于一般意义上讲的积极向上，大学校园里不乏刻苦和积极青年，但多数是停留在器物层面的学习和技术层面的积累，甚至一切社会体验和交流都是从“个人能力和知识”提升为目标，但这就是个伪命题和极其短视的想法，也无法从根本上开拓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从来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拥有宏厚历史背景和复杂发展过程的民族的一份子，是密切相关的整体与个体的关系，不探求这个背景，我们根本看不清甚至反思不到现如今或未来青年人的成长，我们身上里里外外都透着这个时代的气息，我们这些渺小的个体无时无刻不被这个看不清的复杂世界裹挟着，我们的纠结、迷茫、痛苦无不源于外在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当我们纠结自己的食品安全、工作、住房、教育、医疗等一切服务的时候，当看到频繁流动的农民工、看到日益破败的农村、看到浑浑噩噩的大学生活时，是否能跳出来去看看？我与伙伴们的志不在大，还不在试图改变，而是先在睁眼看世界，俯仰天地间的不断反思，是在叩问大历史和社会间的思想认识的重塑。我们坚信青年人的成长必是要与同呼吸共命运的国家相联系的，它不是激进的愤青，不是忧虑的小资，而是试图建设的改良。所谓“趣”更多是我们采取的行动和策略，他不一定就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但却是改变普遍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我们不再理所当然的去消费、去享受，开始寻求积极健康的生活。有人说“大学不仅不是学习的地方，甚至不是长身体的地方”。当大学毕业时很多人不仅精神状态不好，就连身体也变差了，体能一年不如一年，真的是很担忧。记得大学期间我们社团这群小伙伴们经常会去徒步拉链，去登山，去跑步和打球，而这些集体性的活动经常让我们能在一个瞬间忘记那些疼痛和疲惫，因为有相互之间的陪伴，非常有印象的就是从中心（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回到学校后，我们校内班的几个同学相约每天早晨锻炼和朝话，分享彼此的生活学习，那是在冬天，偶尔几次是下雪了，寒风凛冽，但大家都没有迟到，依旧相约在操场正常进行，这样的场景一直让我难以忘怀，或许在常人眼中我们是疯狂的，但那种傲立寒风的勇气和内生的力量形成了凝聚的文化。所以无论我们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无论内心是如何的苦闷挣扎，首先身体和意志不能垮掉，不能滑向堕落和低迷的边缘。哪怕我们仅是一群人相约骑车去乡野走走，去领略四季的颜色，去呼吸泥土的芳香，去触摸清凉的河水，都不要停留在宿舍沉睡，不要坐在电脑前傻笑，不要对着窗台发呆，不要穿梭于闹热的街市。

所以，我们存在的意义从大世界来，从生活中来，更从心底无限的关怀来。

三、到底在坚持什么？

其实我们多数时候是脆弱的，是不经现实考验的，无论年少轻狂的我们曾经夸下多少海口，都会随着变换的现实而烟消云散；无论我们给自身的行为选择赋

予怎样的意义，都会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寻找新的方向。会不断拷问自己什么是真正想要的，而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自己还未被完全禁锢，是欲望也好，是憧憬也好，是追求也好，都冲击着原有的思想和现实的框架。

只是记得在大三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足以改变我，从现今来看甚至成为了人生的转折。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见惯了尔虞我诈，见惯了人生的起起伏伏，见惯了各种丑恶的嘴脸，在家人的眼中，只要学习好一门技艺可以糊口就好，而女孩子最保障的就是会计，所以在大学这一年除了一直在自学会计，考下证件，去准备考注册会计师，每天拿着厚厚的教材和练习册学习外，唯一能得以休息的时候就是带领社团的那些后辈们学习理论，学习那些我们认为的理论知识，去和他们讨论一些活动的策划，直到9月底自己结束注会的一门考试才正式解放，结束后当一个人站在十字路口等待着回校的班车时，看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我沉默了，沉默了一路。从未有过的那种低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心新开辟的试验区嘉泽镇招募志愿者，我看到这个信息后立刻就买票过去了，和学校请了一个月的假，在这个南方小镇看着支农前辈们如何开辟这块儿新的阵地，如何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上摸索经验，当时我被震撼了，一个新的试验区在未打开局面时，只有几个年轻人在那里坚持和周旋，在那里做着生态农场和社区建设的工作，而由于地域文化差异和政府的强势，他们一直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在开辟的这条道上，没有现成的经验，没有专业的团队，甚至没有太多优越的生活条件，但他们依旧憨厚的坚守着那块儿即将展开的阵地，周围有太多的不理解，内部有太多的不稳定，但大家依旧默默承担着，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语去表达内心的波动，只是知道他们在用自己的青春耕耘脚下的沃土，在真正践行着这个时代赋予年轻人的责任，在用坚强的意志对抗着现实带来的苦难，而回想坐在静谧校园中的自己是多么的脆弱，一如那温室中的花朵，没有任何的锤炼。一个月中，我几乎每天跟着镇文化站的演员们奔走于嘉泽镇的大小村落间，和不同的人们交谈着，介绍着我们是谁？在这里做一些什么？也在迈开双脚行走的过程中忘却了曾经出发时面临的困惑和纠结。就在这其间，父母也来到这个地方看我，来和我的那些伙伴们交流，来看看我的另一个世界，而这也让我备受鼓舞。直到11月末自己才重新回到学校，突如其来的是队友和同学们异样的眼光，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我一直在支农队，当别人早已告别社团许久后，我依旧还在里面，而且支农的行动不仅停留在学校，更走向了祖国的各个地方，他们好奇我哪里有那么大的力气去奔波，甚至好奇我到底在坚持什么？面对这样的疑惑，我只能是淡然一笑。只有自己明白我的坚持一直未变，只是一步步填充他的内容，因为本身社团就不只是简单的团体活动的平台，而是开眼看世界的窗口，更是用宝贵青春走向实践的阶梯，更是人称之为一种历练。我的坚持没有理由，只是基于生命本体属性的一种自然行为。

在这一年，家里迎来了一个小生命，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小家伙的到来改变了我们很多人的心情和生活，在幼小的个体面前，我开始认识孕育自己的父母，开始重新反思自己，开始忏悔曾经所做过的种种，开始回忆所经历的简短人生旅程，开始寻找做为生命个体应该有的本真状态……这些个开始或许不是突然的变化，更多是内在潜意识的一种唤醒，只是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迟缓于内在意识的形成，而只有当内外的机体保持一致时，自身才不会是纠结或矛盾的，起码是不为外在环境和外物的强行进入而苦恼的，所幸自己是一个愚笨之人，只懂依照内心指示匍匐前行。所以即使很疲惫，仍旧在正月期间就请假和人才计划7期的学员到陕西富平去做生态项目的调研了，也正是这个实践使我萌发了在社团带领大家做社团深入调研的想法，因为这个过程是自己全面认识现有问题的一个途径，直至新一年的5月和7月，我们一直在针对农村的生产结构和生产关系做一些基础性的调研。其实平台是既定的，而做事情和个人的成长绝对是主动性起决定作用，凡事都应该反求诸己。自己很感谢的是曾经一同进入社团的那几个伙伴们依旧还在，依旧能和自己带领新的成员去做一些深化的事情，而我们的坚持没有太多的纠结和限制，更多是自然的一种升华，一种基于个体和团队的成长，也许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有彼此的存在和坚持。

四、未来会有什么？

也许我们谁都不知道人生的下一步将会面临什么事情，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们，会怎样创造自己的人生。还记得大学期间一直非常喜欢的两本书，一本是高尔基的《我的大学》，一本是卢梭的《忏悔录》，曾经因为这两本书有太多次的出走，曾经因为他们对于现实和生命的真挚而沉思过许久，在这样的世界中，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到底该如何坦诚的面对自己？无论如何，自己都希望内心是清明的，都希望是干净的，不希望那些肮脏的东西停留在大脑中太久，是忏悔也好，是忘怀放下也好，只是希望还有一个空间是可以汲取生命的养分，只是希望自己还不要那么早腐烂。所以，迷茫过后对于意义的坚持便是在开创新的世界和人生。

回过头来想想，踏上未来的路途似乎也就是去年的夏日，而今已是又一年的年末，这一年好久，但转眼即逝，我不知道是该放下它，还是封存在记忆当中，但无疑这样的一年早已刻在了青春岁月的书卷中，渗透到了自己的血液中，无论如何也挥不去。而即使是这样的一年，自己仍旧能在平静中度过，是何等的幸福。在大四即将离开大学的这一年，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参加了中心的人才计划项目，做大学生的培养计划工作，但其实自己是想跳出高校既有的“学习陷阱”，去真正找寻未来能深入做实践和研究的方向。为此曾经和价值观极不一致的父亲

发生过激烈的争吵，甚至久久不能平息，我明白不是因为我的选择，而是他的固执和不信任，甚至是隐约的担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自己都是忙碌在个人的世界，去看书，去交流，去工作，行走于祖国大好河山的各个角落，去看各种现实社会的实践经验，我不得不承认，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自身的视野和思维开拓了很多，积累了相应的工作经验，而这些是在封闭的校园内所看不到的。而个人原有的支农社团的认识升华到了乡村建设，这个过程是十分兴奋的，但不是因为历史的厚重而兴奋，也不是因为初入工作领域而激动，就是被那些真正创造历史的人们而感染，那历史不是普遍记录的黑白两大历史，而是蕴藏无限生机的民间历史。如果说它是一种生命力，那一定是基于这个危机重重的现实世界而言，于这个世界而言，它犹如一股清流，犹如新鲜的血液。面对这样的人们，会时刻在想是什么造就了这个面对苦难仍旧能创造辉煌的民族和国家，是那些真正能将苦难化作力量的人们，而这些绝对不是我们这些小资群体们能做到的，我们应该看到甚至记录这段历史。



面对无数沉沦在大学校园中的学生们，我不知道在交流时该和他们讲述什么，因为我们这些小资们真正该做的是走向田野，走近真实的世界，只有这样才能从睡梦中醒来，才能有机会去创造未来，所以，我希望能在这个阶段去不遗余

力的做这样一件事情，去和同伴们在实践中不断的学习和创造。在这样的成长中，大家更多的是坚守下的坦然，没有所谓的光环，没有所谓的牺牲，更没有所谓的悲苦，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好，是理想的坚持也好，都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包容，而自己更应该明白坚守背后的价值。

对于我们而言，对于这个时代的青年人而言，唯一要蔑视的就是现实带来的恐惧，打破千百年来人们所建立的枷锁，面对社会危机转嫁带来的苦难，去敢于创造新的世界，去团结真正有力量的人们创造共生的世界。当自己忙碌于大大小小的培训和繁杂的日常工作时，从母亲那里得知在金融危机下因相关人员卷款潜逃而使父亲深陷囹圄时，我明白这个世界正在走向疯狂的地步，而我们这群即将被裹挟或是已经被裹挟的人们要如何去承担这样的危机，如何开创自己的未来呢？是啊，曾经自私的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可以去肆意的不用理会狭隘的小家而去追寻人生的意义，但事实上该有的是困境下的共担，是危机下探索新的家园，不只是因为小家，还有大家。在大学毕业的这个夏季，在炎炎烈日下，我继续坚持着自己的坚持，也正是老子的那句话：“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未来，要打倒的还是恐惧，要拥有的还是面对苦难的坚持。我依旧庆幸社团的那群队友们陪伴在身旁，在这个陌生城市胜过亲人的伙伴们，庆幸那些亦师亦友的朋友们能将生命的正能量传递下来，庆幸自己对于生命的坚守，庆幸在短暂的青春岁月中能行走在广阔的世界。

没有盛大典礼的告别了大学生活，甚至没有一张毕业照片，没有一张穿戴学士服的照片，没有同窗好友的合影留念，就诚如开篇讲到的那样，我从来不曾属于过那里，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唯一留下的身影即是那群人开会时的308教室，因为后辈们依旧在那里，而在他们的印象中我已然成为支农前辈，已然成为社团中联系的纽带，一切就顺其自然的结束了，没有丝毫的留恋和遗憾。

在告别那已然逝去的大学生活后，意味着又开启了人生的另一个转折，但似乎自己的每一个转折都没有经过选择，回头观看大学走过的这些日子，很难去用言语当下就做出总结，那样显得很是单薄，而很多经历和收获亦不是我们现在能体会到真谛的，只是希望在追忆过往的流金岁月时，能多一些感恩和平和。在此也将自己最为喜欢的一句泰戈尔的诗与大家分享：“使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静美。”

1967年10月9日，一个不平凡的日子

郭兆英

我把自己如何下乡的经历，简要地写出来，是想告诉人们，我所经历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和自己的人生感悟。

我想通过它，告诉人们开始几批下乡的，并非像有的传说那样，被强迫或者糊里糊涂去的。当然，后来下乡的情形各异。

我还想说，知青对党和国家、对当地农牧区，是有一定贡献的。

我想通过自己对知青的认识，以及我的这段亲身经历，能有助于大家从多角度，去看待这段历史；正确、全面地认识知青。



我是 1966 届高中毕业生，北京女八中，是我人生里程中最重要的加油站。

刚考入女八中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王季青校长（原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的爱人）在开学典礼上，那番鼓舞人心的讲话。

当时，她给我们介绍了，学校的光辉历史；学校培养了多少国家栋梁之材。就是她那些不断探索、努力拼搏的讲话，始终在激励着我，教我在坎坷的人生路上，永不放弃、不断进取。

1963 年，我考取了北京女八中。在以前的学校，我是全年级的学习尖子。所以，到了女八中以后，根据我在原来学校的学习成绩及个人表现，被选为团支部组织委员。当时班上的团干部，除了我一人是外校考来的，其余都是本校考上来的。

但是，第一学期开始，我的学习成绩却成了中等，我由团组织委员降到团小组长，又到一般团员。学习成绩的下降，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当我想起王校长在开学典礼上那番鼓舞人心的讲话时，努力进取的勇气就有了。

我给自己订了一个规划：我要求自己的学习成绩，在高中一年级保持中等水平，在高中二年级达到良等水平，在高中三年级要成为班上的优秀学生。

结果，我提前一年进入了优秀学生行列。同时，我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学雷锋”、“学王杰”等运动中，还被树立为各种典型。所以，又重新被选为团支部领导，还在高中三年级入了党（“文革”前），并且学校还要保送我上大学。可惜，开始了“文革”，未能成行，这也许是一生的遗憾。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我三十多岁才得有机会系统学习。我通过脱产和业余时间，系统学习或短期培训，考取了十八个学历证书(其中有八个是退休后，在各公司工作期间考取的)，并获取了两项高级专业职称。尽管如此，仍感到有一种遗憾，因为没有时间和机会，让自己所学的知识，尽可能多的发挥作用。

1966 年 5 月，“文革”在中学开始，学校停课，“内战”四起。“文革”初期，我和我们家都受到了误伤，我（修正主义苗子）和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分别在学校、单位挨批挨斗，家被抄，面对当时政治混乱，除了疑虑，更多的是不满。

1966 年 8 月以后，我采取了“逃避”的态度，与几个同学自发到工厂、农村参加了几个月的义务劳动。

1967 年初，我又和几个同学从北京，步行到狼牙山，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社会调查。一路上，我亲眼目睹农村缺乏知识的窘况，联想到高三毕业时，学校进

行的“一颗红心，多种准备”的教育，深深地认识到，是劳动人民养育了我们，有志气的知识青年理应到农村去，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献给农村，去改变那里贫穷落后的面貌。

在狼牙山社会调查过程中，我给一位“文革”初期，一起共过事的 25 中学生去了一封信，谈了我很多社会调查的体会和打算。他回信说，他对这些问题没有太多的思考。但是，他们班的同学曲折，对这些问题有一些想法。

1967 年 4 月，我从狼牙山返回北京，目睹京城仍在“内战”，加上父亲也被“革命”（被打成走资派），很反感。当时，大概是因为江青 4 月 3 日、4 日的两次讲话，使北京中学生分成了“四三”、“四四”两派，派仗打得一片混乱。

我想，中学生无大学可升，无业可就，总不能一辈子呆在学校闹“革命”吧？该向何处去？那时，我虽然有探索前进方向的想法，也有摆脱困惑、寻找新出路的渴望。

当时，北京 25 中的曲折和一些同学，也对“文革”打派仗感到厌倦，认为自办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新型大学，可能是条出路。他曾发出一份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两天就有很多人报名。在创办红卫兵大学的过程中，他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青年运动的论述，按“文革”时期特有的思维方式去分析，学生的阶级属性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不可能构筑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

就在这个时候，我从狼牙山进行社会调查返京，曲折的那位同学把我介绍给曲折（后来我们成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夫妻）。我们认识之后，在探讨中学生运动应该向何方走时，我谈了很多农村缺乏知识的窘况，分析了农民养活知识分子又迫切需要知识分子的问题，大大影响了他的思想。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经常交换看法，达成了共识：决定联系一些中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当时我们认为，知识分子要革命，只有和工农相结合。再则，农民养活了我们，我们理应把学到的知识献给他们。况且，农村是那么需要知识。另外，我们也深受 60 年代初期青年学生榜样人物的影响。那时候，曾大力宣传过邢燕子、侯隽、董家耕、赵耘等一批“身居茅屋，心怀世界”的事迹，对我们感召力很大。

思路清晰了，决心下定了，我们开始筹备到农村插队。一些同学听到这个打算，也准备和我们一起去。就在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旁边贴了一些大标语，过去插队知青要求返城。于是，我们又在一起学习毛主席《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著作，觉得毛主席提出的青年运动方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应该没有错，我们一定要亲自走一走这条道路。

当然，赞成到农村插队不是一帆风顺的，阻力非常大，我们团队的人数由少到多，又从多到少，最后剩下 10 名坚定者：女八中的郭兆英、郑晓东；二十五中的曲折、胡志坚、高峰、鞠颂东、王紫萍、宁华；二十二中的王静植；女十二中的金鹃。我们 10 人中，没有一个人的家长同意子女插队落户，但大多数人又不敢反对。

我是独生子女，父母舍不得，多次找人、找学校做我的工作。当时，学校军宣队还准备让我做学校党支部书记（其实我只是个预备党员），所以学校也不同意。但是，我始终非常坚决，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只要认准了的事，一定会努力去做，而且会坚持做好它。

我们筹备开始，先是选地点。开始比较理想主义，再加上青春浪漫，惟恐走得不远，沿着地图的边界线找，选中了新疆拜城这个极为生疏的地方，好让自己没有退路。计划 9 月底，在当地大雪封山之前出发。

随后，我们到北京市劳动局汇报了这个计划，北京市劳动局安置办公室的同志，不赞成我们去新疆，说中苏边境纠纷多、不稳定，建议我们到内蒙古去，我们同意了，并等市劳动局出面，与内蒙古有关部门联系之后，我们再决定去向。

10 月初，内蒙锡林郭勒盟派安置办的杨振祥、张保德同志到北京接我们。

10 月 8 日那天，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丁国钰、李冬民，北京市劳动局、教育局的领导，接见我们 10 个人，叮嘱我们要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到牧区后要虚心向牧民学习，尊重民族风俗，把牧区建设好。还要求我们，为留在学校的中学生带个好头，打响第一炮。当时，我们第一次隐约感到，他们可能要把我们的行动，同中学的分配连在一起了。

10 月 9 日清晨，我们 10 人来到天安门广场，这里已聚集了上千名送行的同学和朋友，还有家人。北京市劳动局也组织了欢送队伍，气氛很热烈。我们在金水桥前列队，面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宣誓（誓词事先准备好的，比较长）。慷慨激昂宣誓之后，我们坐上北京方面派的大轿车，带着光荣而又沉甸甸的使命，像要上战场的战士一样，义无反顾地北上了。



从有下农村插队的想法到出发，历时半年多的时间，我们的思想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

1967年10月9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我从学校走向牧区，将准备在人生的旅途中走一条曲折的路。曲折的路，始于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前；曲折的路，就是从1967年10月9日这一天开始。



两天之后，人民日报在头版以半版的篇幅，刊登了我们去内蒙插队的消息，并刊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日报等多家媒体，也纷纷予以报道。后来，有些记者还跟着我们到了蒙古包，到了羊群边，记录下我们的学习、劳动和生活。



谁也没有想到，1967年10月9日，我们10名北京中学生，奔赴内蒙古锡盟草原插队的行动，竟会成为那场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端。随后，成千上万的知青从全国各个城市走向农村、牧区，人数达1700多万，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

当我们10个人走出自己人生的这一转折时，对它可能产生的影响没有想过。当时，我们谁也不会想到，此举对毛主席挥动巨手会起到某种作用；不会想到，此举会为成千上万中学生的安置工作提供思路；也不会想到，它竟会像一颗火种，燃起了熊熊大火，燃遍了“文革”中的中国大地；更不会想到，在我们之后10年间，有1700万知识青年，离开城市上山下乡，而后又离开农村回到城市，形成相当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大迁移，冲撞得中国社会动荡不安。

由于新闻媒体的宣传，在我们到草原落户的第二个月，即1967年11月，又有300多名北京中学生，作为第二批知青来到了内蒙牧区插队，我们第一批十名知青，在锡林浩特市和广大市民一起，隆重地迎接了他们。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之后，在全国形成高潮。也许我们的行动，在当时对全国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把自己如何下乡的经历简要的写出来，是想告诉人们，我所经历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



我认为，面对当时国家经济的危机四伏、社会秩序的混乱动荡，学生无法升学就业的局面，出现了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缓解了各方面的压力，仅就这一点讲，知青是有功的。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战天斗地、改变农村旧面貌的事迹，体现着我们这一代人改天换地的豪迈气概。知青精神是一种为国分忧的民族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无私奉献的主人翁精神；执着进取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过去需要，今天需要，明天更需要，我愿知青精神发扬光大，永不衰减。

“知青”这个专有名词，48年来，一直紧随着我，伴我走过了坎坷的人生路。回想起我走过的路程，它包含了多少苦涩和自豪。同时，我也深感付出的太多，失去的太多。48年来，虽然也取得过一些成绩，但未能成就骄人的事业，心中曾不是滋味，可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蹉跎岁月和努力进取，伴随我走过了前多半生。一路成长的艰辛，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懂，因为我们对生活的忠诚，有自己的深度和过程。生命道路坎坷而曲折，再多苦难我们也承担了，岁月中的苦涩、苦难，造就了我们丰富的人生。缺憾也许是一种美，因为它是用信仰来支撑的。

我想，我们的知青朋友们是要总结过去，但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更好地、更切实地规划一下未来的生活，如何健康、快乐、积极地走完我们后边的人生路！

我常跟我的朋友们讲，这也是我当前的生活态度：昨天已经属于过去，不必得意，也不必追悔；明天还未到来，无法想象，也无法把握；只有今天常在，努力过好每一个今天！

2015年10月9日



(此图片为网络下载)

把乡土文化引进课堂

王小平

一、茂县的乡土文化课让我激动

2015年3月28日，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凤仪镇小学大教室。

一班穿着羌服的孩子跟着余晓蓉老师的朗诵在教室前的空地上表演，女孩子们戴着树枝样的头冠，怀里抱着小羊，男孩子的羊皮背心上系着草绳，挑着担子，他们时而像遇到了暴风雪，孩子们聚作一团，时而像遭遇了强大的敌人，挥舞着树枝左冲右突。最后，孩子们一起唱起来了，他们手持鲜花，作驱赶羊群状，作耕作土地状，作修建碉房状，然后，羌红飘起来了，绣着羊角花的头帕舞起来了，云云鞋飞起来了——我们看明白了：这是一群迁徙的人们，经过艰苦的努力，来到了自己的家园，开始了新生活。音乐，朗诵，孩子们的表演，扣动了所有人心弦。

这是茂县凤仪镇学校四年级的羌族乡土教材《沃布基的故事》中的一课《云朵上的家园》的示范课。这一课表现的是有“云朵上的民族”之称的羌族迁徙的历史。余老师带着孩子们把这段表达羌族历史的特点表现得活灵活现。

接下来的是同样生动的示范课《羊角花的故事》——一个表现天神用羊角花使羌族人建立伦理秩序的古老民间故事。羊角花，就是杜鹃花，它是羌族人心目中最美丽的花。

还有《穿在身上的风景——羌族服饰》《我们的碉房》和羌族民歌《母格得特》（一首迎接远方客人的原生态民歌）。这一课课，学生和教师充分互动，让我们看到了羌族的丰富文化：为适应自然环境和劳作需要，且又表达自己情感和满足自己审美需求而逐渐形成的各种式样的美丽羌族服饰；因地制宜的壮丽民居——碉房；羌族人民族性最明朗表现的羌歌；还有羌族人的历史，羌族人和自然环境相互融合的生活……上课的羌族孩子们，也开始明了并永远铭记自己何以是个羌族人了吧。



那一天，我坐在台下，始终热泪盈眶——我们的努力终成正果——天下溪十年推广乡土教材的努力，天下溪建立的乡土教育的理念和方法，成就了这个事实，我们成功地使乡土文化教育进入了课堂。



湖南湘西州凤凰县三拱桥小学的乡土教材课——唱苗歌“嘀格调”

从 2005 年开始，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开始了编写和推广乡土教材的项目，目的是要使乡土文化的传承进入课堂。作为天下溪的核心项目之一，十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在乐施会、赛门铁克、阿尔卡特—朗讯基金会和郭氏基金会的陆续支持下，稳扎稳打地，开始在一个又一个项目地，和当地教育局或学校合作，编写出版了云南拉市乡纳西和彝族、湖南湘西土家族和苗族，以及四川阿坝州羌族、嘉绒藏族和安多藏族等区域的小学乡土教材——《我爱拉市海》《美丽的湘西我的家》《湘西乡土教材教师读本》《沃布基的故事》（阿坝州羌族地区小学）《夏嘉莫查瓦绒的小洛让的故事》（阿坝州嘉绒藏族地区小学）《我的草原我的家》（阿坝州安多藏族地区），和羌族中学教材《云上的家园》，还有羌族

教材和嘉绒藏族教材的教师参考书。让这些地方的文化逐渐走进了课堂。（部分书影）



二、《沃布基的故事》是怎样走进课堂的

2009年6月，已经在云南拉市海和湘西州做了四年乡土教材项目的天下溪团队决定到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开始新的项目开发活动。我和我的小助手刘林到茂县去时，乘坐的是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从成都到茂县的长途汽车开通的第一班车。过了都江堰我们就看到一路上满目疮痍，垮塌的山体倾泻着流沙，被巨石砸毁的房屋，扭曲得不成样子的车辆，停停走走拥堵不堪的路面，叫人感觉灾祸似乎还在路边张开血盆大口等着我们。这时羌区的灾后重建工作还在紧张地进行中，我们要到茂县去，在震灾之后的百废待兴中，去做一个重要的复兴工作——文化复兴，我们要去和茂县教育局合作，编写羌族的乡土教材，让即将被湮灭的羌族文化走进学生课堂，成为他们必须学习的一门课程，让课堂成为传承乡土文化的平台。我们知道，羌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也是一个在历史上不断被摧毁而又不断重生的伟大民族。羌族丰富多彩多姿的文化，应该在这次灾后重建中复生成长，成为这个地区持续发展的内在力量。

那一天，因为路况极差，在不断的剧烈的颠簸中，我们大约七个半小时后才到达茂县县城。

那一次我们在茂县呆了大约十天，最大的成绩是终于和茂县教育局确定了合作关系。我们要共同编写一部包含羌族文化、羌语教学的乡土教材，天下溪负责组织文化部分的作者、写作和进度及质量的组织工作，茂县教育局负责羌语教学部分的写作和今后进入课堂的组织工作。

初步的成功，是在 NGO 伙伴的帮助和我们成熟的乡土教材编写理念和方法的基础上取得的。

茂县是中国最大的羌族聚居区，也是羌族文化最深厚的蕴藏地，那里羌族文化人才济济。在当地 NGO 伙伴的帮助下，我们结识了一大批羌族情怀深厚丰满的文化人，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如数家珍，提到羌族文化的衰落痛心疾首，听说要编写羌族乡土文化教材高兴得像要过节。他们成了我们在茂县开展工作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在当地做了初步的文化调查，在黑虎乡黑虎寨、三龙乡合心坝，我们进入了传说中的神奇碉楼，还惊奇地发现了屋顶上的祭祀台——白石堆；我们听到了黑虎乡为纪念自己的英雄黑虎将军戴万年孝的故事，也亲眼见到了黑虎寨的妇女身穿羌服头包白帕的身姿；岷江边上牛尾巴村老书记董大爷吼出的多声部羌歌震撼得我泪崩，两河口妇女们放情的莎朗使我笨拙的脚步也跃跃欲试，松坪沟岩窝年过半百的杨秀芳（羌名雅基别）生命力爆棚的羌舞令我惊异得闭不上嘴，沟口王天明家漂亮的手织布也叫我爱不释手；我们吃了土豆粑粑，喝了开坛的第一吸咂酒，亲近了那些芳香宜人的花椒树，品尝了甘甜爽口的青翠李；在那段时间和出发之前，也恶补式地阅读了大量的与羌族相关的书籍：《氐羌源流史》《羌族简史》《羌地游览》《羌在藏汉之间》《寻羌》《羌族民间故事》……，再加上每次席间，羌族朋友们都会放声高歌，甚至随手把餐巾拿上舞蹈起来，那时，蕴藏于他们血脉之中的丰富多彩鲜活奔放的羌族文化，如滔滔江水般冲击着我们。



岩窝的杨秀芳在吹口弦



两河口乡的莎朗



在岩窝王天民家听他讲故事



松坪沟的手织布

在这同时，我的大脑在不停地思考着这本教材的结构和提纲。经过三易其稿，我拿出了羌族乡土教材的编写大纲。这个教材的对象是羌族地区小学四年级学生。

通常我们编写小学教材如果只有一本教材的资金的话，我们都会定位为小学四年级学生使用。这是因为，我们工作的原则是雪里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所以一般我们选择的项目地都是相对偏远的地方，甚至大多是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方的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三年级以下的儿童接受能力还不行；而五年级以后，由于要小升初，学生的负担会逐渐加重，时间又紧了，所以四年级是一个加入乡土教材课的合适年级。

编写大纲规定了这本羌族乡土教材的教学目标，课程设置的原则、内容和写作、包括呈现方式，确立了基本框架并规定了每一课的内容及具体写作要求。作者需要做的就是按大纲的要求撰写一个命题作文。大纲表明，本教材运用现代教育理念和认识视角，呈现羌族文化中代表祖先生活智慧和民族精神，且能为四五年级小学生接受的民族民间文化现象和传统。教材中设计了一个十岁的羌族小男孩沃布基作为全书的主导人物，通过以他为主角的一个个生活故事，展现羌族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当地人民的生活生计方式，代表当地文化精神的节日和文化符号。让孩子建立认识家乡的理念和掌握认识家乡的方法。

教材还设计了关于羌族文化的阅读材料和便于学生参与的游戏和活动。

童趣、互动、生活化以及图文并茂是这本教材呈现形式的一个必要特色。

这个大纲得到了茂县教育局的欣赏信任和认可。当时，主持这项工作的副局长正痛风在家，他半卧在沙发上读着这份提纲，读着读着，他坐正了，之后，他放下提纲，郑重地说：“王老师，我们合作！这个提纲太好了，这个思路是我们搞不出来的，我们就要这样的教材。”但是，合作是有条件的。他提出，教材中

一定要有羌语教学的内容。因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羌族的精英们一直都在痛惜羌语的衰落。现在，县城里 40 岁以下的人基本都不会说羌语了。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就是彻底失去了自己精神的根基。他们决心扭转这种现象，要在新一代中普及羌语。在人们的印象中，羌语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在羌族古老的传说中，有关于古羌文被羊吃掉的传说，所以羌区传统的民间知识分子——释比们，在诵经时要不遗余力地敲打羊皮鼓，意味使羊把吃掉的文字吐出来。1992 年，为了保护羌族文化，中央民委组织社科院民族所的专家和羌族地区的知识分子一起，创制了新羌文，并在那之后培养出了一批羌语教师。现在这批教师都已经是各个学校的骨干力量，他们渴望能开设羌语课，把羌族自己的语言传承下去。这个条件正中我们下怀，我们当然举双手赞成。旋即我们决定，立即由州教育局和天下溪共同成立乡土教材编写领导小组和编委会，天下溪和茂县教育局分别负责文化部分和羌语教学部分，在教材的 16 课中，每一课都有羌族地区文化和羌语教学两大部分。计划成立了，实质的行动就立即开始了，2009 年 6 月底，教材编写正式开始。

教材文化部分初稿的作者都来自当地的文化界，最后由光明小学教师坤吉定和八一中学教师何江两人完成终稿。教材三易其稿，每一稿我们都会组织一次范围广泛的讨论会审定稿件，当地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都被请来参加讨论。参加稿件审定的人恪尽职守，他们弘扬和捍卫自己文化的决心溢于言表，他们对每个文化细节都严防死守，精心推敲，必保严谨准确。所以常常有非常戏剧的场面。记得在第二稿讨论时，作者刚刚朗读完他的《我和阿达去耕地》那篇稿件，我正要表态肯定，那篇稿子不论是文字表述，还是选材构思，都很不错。不料，我的嘴还没张开，好几个人要求发言，他们的手还没举过头顶，意见已经出口了。几个老同志争先恐后地说：“不对！不对！我们羌族人耕地很少吆喝牛，我们是唱牛歌的。我们用牛歌指挥牦牛干活，牛听着我们的歌向前走，拐弯，向后转。”啊？牛歌，这是什么样的歌呢？我正疑惑着，茂县文工团的歌唱家何王全已经站起来唱了，那歌声抑扬顿挫，婉转豪放，立即把我带到了田野上。何王全在唱，陈维康就解释，这是让牛向前走，这是让牛拐弯，这是让牛调头……，啊，真是醉了，羌族人是歌乐着生活在云朵之上啊。羌族人的文化传统也在大家的讨论中复原了。这些细节的推敲，把每一次讨论会都变成了一次羌族文化展示，来参加讨论的人不仅带来意见，带来热情，还带来道具，羌笛、羌服、羊皮鼓，都在我们的讨论会上出现过。人们那些浓浓的文化自觉带来的是写作的严谨、考究、一丝不苟，和千方百计的高标准严要求。



第一次汇稿会全体作者合影

年底，稿件完成了。还收集到几个学校的孩子们画的有关自己的生活的图片，四川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陈锦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照片，风景人物碉房歌舞样样俱有，羌语部分的稿件也编好了。州教育局副局长、羌文化专家王树全和羌语专家陈维康老师一丝不苟地审阅了全部稿件。2010年4月，四色印刷图文并茂的羌族小学四年级的乡土文化教材在四川美术出版社的无私支持下出版了，封面就是茂县东风本田励志学校五年级学生王旭琴画的春耕图。5月，我们在茂县召开了教材发布会，茂县、汶川、理县、松潘的老师们都来参加。那一天，茂县九顶山酒店里喜气洋洋，穿着节日盛装的同学们老师们像迎接自己的亲人一样接受了天下溪赠送的乡土教材《沃布基的故事》，他们说这是羌族有史以来第一本有羌语的正式出版物。两天的会议，除了讲述教材的理念和使用方法外，天下溪还带着参加会的全体人员做了教材中的一些游戏，羌族迁徙历史、生计调查、风土人情常识等等，都可以在这些游戏中展现出来。原以为那些平时很有身价的局长们不会参与游戏的，没想到所有的人——局长、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校长、教师，和同学们——都热情地投入到活动中去了，老师们一边做游戏，一边说，真有意思，原来课也可以这样上。

会议最后，州教育局要求各校成立乡土教材教学团队，把乡土教材课排进课表，保证每周至少有一节课，并相机安排教师间的教学交流。这个要求会后又以州教育局文件的形式下发到了各县各校。

羌族学生拿到了乡土教材



服饰示范课



那一次在离开茂县的路上，我不断接到教育局、文化局和一些老师打来的电话，他们迫不及待地感谢天下溪帮助他们出版了这本乡土教材，表示一定要上好这门课，和学生们一起传承自己的文化；州教育局和县教育的局长在各种感谢之后，是由衷的感慨，他们说，“王老师呀，这个活动搞的太好了，总说新课程改革，新课程改革，到底怎样做才是新课程改革，这次参加了天下溪的这些活动，我们才有点摸门儿。王老师，以后这样的活动多搞一些吧！”一直参与这个工作的州教育局王树全副局长说：“王老师，你放心，我们会把乡土教材这门课上好，也会把这些教学方法运用到其他课程里去的。”

这些话让我收获了成就感。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

三、天下溪的乡土教材是什么样的

天下溪的教材一直得到教育界和文化界的肯定。

因为天下溪的乡土教材贯穿着两条线：一条是乡土文化的传承，一条就是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和方法的推广和应用。这是我们主导的乡土教材的基本原则。

传承性乡土文化，那什么是乡土文化呢？我们认为，在我们倡导乡土文化教育的时候，我们把乡土文化界定为：在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本社区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下来的人文智慧和文化精神。这些智慧和精神应该是活着的，有生命力的，能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是正能量的。

而对于乡土教材本身，我们有一个刚性原则，就是教材绝对不是死的乡土知识汇编，而是有灵魂的，它承担着引导学生发现家乡，发现先祖的生活智慧和人文精神的职责，是孩子们融入家乡文化的引路人。并且它应该是亲切的，有趣的，好玩的，符合孩子们的天性，让他们喜欢的，因此它应该是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形式活泼并融入孩子们的生活之中的。同时，这部教材应该提倡新的学习方法——

—以学生为主体的、参与与互动式的学习，也就是要体现出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和方法。

在孩子们司空见惯的生活中提炼出生活智慧和文化精神，这是乡土教材呈现方式的思路。因此在课文设计时，我们强调，每一篇课文都必须是学生熟悉的生活场景。它的出发点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和我的历史就是我们民族的历史，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民族精神就蕴含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展现我们的日常生活，发现并掌握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是使人成长和确立自己独有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过程。这其中体现以下几个原则：

- 1、乡土文化的学习，是在生活中学习，再去指导生活。
- 2、乡土文化的学习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让学生自己发现生活中的文化。
- 3、乡土文化学习的目标，是使学生在本民族的智慧和民族精神滋养下成长，成为一个有自信的、有能力的、会生活的人。
- 4、乡土文化学习是活的学习和在活动中的学习。我们的教材设计了很多不同形式的、学生参与性很强的活动，让学生在玩中学，在活动中学。

每部教材包括本地乡土文化的基本构成——地域和历史，生计与生活方式，文化遗产：手艺、服饰、民俗、艺术、节庆、自然以及发展与变化等，在其中，我们将选取那些日常生活即可体现的、与本地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相关的、有特色的、智慧的、有生命力并利于今后发展的内容。（目录照片）

通常我们的小学教材都包括课文课和活动课两部分，每个课文课又包括课文、活动和阅读材料三部分。每一课都制定了清晰的教学目标。课文是以学生视角呈现的，是他们最熟悉的日常生活的模拟。活动分专门的活动课，和在普通的课上设计的活动，这个活动包括课堂活动和课后活动两部分，课堂活动和课后活动都是对教学目标的强化，也是学生参与能力的强化。阅读材料是文化营养的补充。

课文的设计是我们的创新，也是我们教材最突出的特点：每一篇课文都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要求口语化的表达，它的主角和听众都是学生。这个故事是包含民族文化精神的日常生活故事。在这个故事里蕴藏着一条由近及远的认知路径——由“我”开始对自己家乡文化的认识——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和谁在一起，我怎样生活，我为什么这样生活，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些变化。

我把这类故事称为强调关系的叙事，它强调日常生活中体现出的关系：一，我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及我们的历史的关系；二，我与他人（家

人、亲友、社会、世界）的关系；三、今天与过去和未来的关系。我们认为，这些关系中蕴含着智慧、伦理和民族精神，这些关系就是文化。这些都是价值观的基础。在理解和认同这些关系的过程中学生即可确立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比如，在我们所有的乡土教材中都会讲到民居。不同的地区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同，民居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比如，在湘西的教材里我们介绍了吊脚楼。通过故事的讲述说明湘西地区由于“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们在河岸或山脚下建筑了吊脚楼形式的民居，是为了搭建出有平面的房屋，同时就地取材，利用当地出产的木材和桐油做建筑材料，建成防潮、防止虫子、野兽进入的建在地面之上的房屋。而羌区所住的碉楼，则是因为羌族居住在高半山上，风大寒冷，还有部族之间的征战和野兽的侵袭，所以就地取材，利用山上的石块和黄泥做建筑材料，建成挡风御寒、还有防守作用的碉楼。关于食物、服装等的介绍也是以这样的思路展开的。那些课文编写的都很有趣耐读，再加上大量的配图（有的学生都可以在里面看到自家的房屋），不仅学生爱看，家长们都读的津津有味。湖南省教科院对湘西州的教材《美丽的湘西我的家》做第三方评审时，有的家长就向他们反映：“我们从小在这里上学长大，但对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知道得很少，小时候做学生也读语文历史地理课文，但我们很少知道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当小家伙回家拿给我看他们学的这本书时，我发现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真的不懂，他们下一代学习这些我们作家长的肯定很高兴，也很自豪，我也喜欢读这本书，可以跟着他们了解一点自己民族的文化。”有些学校或教育局还把这些教材当作文字导游，作为礼物送给来访的外地朋友。

在课文之外，我们还设计了很多活动课，这也是我们教材的重要特色。

活动方式有调查、游戏、表演、团体绘画、手工、行动设计、生活仪式模拟等几种形式。它吸引学生最大限度地参与到学习中去，是学生自我学习的过程。这些活动可以培养学生多种途径的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继承和选择的能力，行动的能力，最重要的是生活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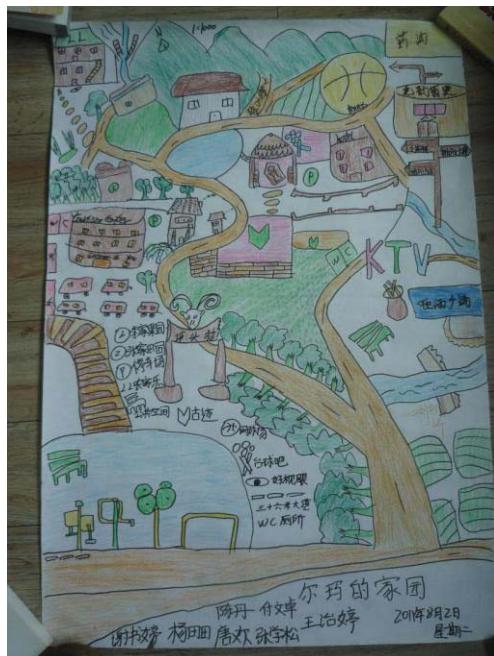
比较有代表性的活动是村寨图和家族树。

村寨图是让学生画出自己居住的村子的文化地图。这需要学生观察自己村寨的路径、地形和各种建筑及其他地上物的位置，并选择出自己村寨中自己最喜欢或和自己关系最密切的一些地点，比如你经常玩耍的地方，你最喜欢的亲朋好友的家，你觉得村子里最重要的地方等等，然后将这些内容画在村寨的地图里。这个活动一是锻炼了学生的观察力和发现力——花一树、一草一木、一屋一舍、一石一水都会进入自己的视野，很多学生会发现细节！二是锻炼学生选择的能力——在看到的当中选择这个花这个树，这个屋这个场，需要想想怎么选和为什

样选；三是表达能力——用你自己的方式把你的选择表达出来。画出村寨图后，学生们会觉得原来因熟悉而被忽视的村寨竟然有这么多值得记忆的东西，那种亲切感会油然而生。相信画过村寨图的同学，不管将来他走到哪里，在自己村寨里的童年记忆将会永远铭刻于心。

家族树是让学生对自己家族的调查的和表达。要求学生画出自家三代以上的家人的树枝图，对图中出现的每个人都要写出他的姓名、年龄、特点以及和自己的关系。这个活动一是要学生了解自己的家庭，了解才会有更深的感情，二是学会认识人的特点。比如奶奶，平常自己就认为她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她会有什么特点呢？她可以做饭特别好吃，绣花手艺好，和邻居关系好，甚至扫地扫得非常干净，都是她的特点呀。这样引导学生掌握认识他人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与家长有很好的沟通。

夏令营活动中茂县学生画的坪头村地图



羌绣课



活动中还有一些生计调查和家乡面貌调查等，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关注变化，并学会判断什么变化是好的，什么变化是不好的，是什么原因带来了这些变化。

在我们的小学教材中，都有童谣这课。我们认为童谣是民间生活中典型的表达，也是亲近母语、建立家乡感情、增进童年记忆的载体。童谣课很受欢迎。在湘西花垣二小的观摩课上，老师发动学生在家里采风，把课文里的一个歌谣搜集到了 17 个版本。学生们在课上一会用方言说歌谣，一会用普通话说歌谣，歌谣里那些朴素的价值观和风趣的民间往事会很深刻地记忆在学生们的心里。

天下溪的目标，是关注人的成长。在我看来，我们的每一种乡土教材，都是根植在孩子们心中的自信和力量。我们希望教材中体现的那些生活智慧和人文精神在同学们身上得到继承。我们希望，那些将来走出家乡的同学，能因为了解和掌握到自己家乡的丰富文化而充满自信，并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能力和方向。我们希望，那些留在家乡的孩子能够以自己家乡的文化为资源规划自己未来的发展。我们也希望那些开展了乡土文化教育的地区的孩子们，能够留在家乡，丰富本地文化自觉的力量，开发自己家乡的文化资源，保证可持续发展，并因此少一些空巢的村落。

四、推广乡土文化教育是我们的使命

乡土教材项目是我所在的机构——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的核心项目之一，这个项目的目标就是希望将乡土文化教育引进课堂，让所有的孩子都得到家乡文化的滋养，成为自知、自信、自强、自立，有文化，会生活的人。十几年来，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一直在努力。

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是一个公益教育机构，成立于 2003 年。机构早期主要做自然教育活动，在长期的自然教育和环境调查的过程中，我的年轻的同事们发现，所有乡土文化醇厚的地方，都是自然生态环境保持得较好的地方。这使大家看到了乡土文化的宝贵。同时，大家也痛心地看到，这些年来，在商品经济的裹挟之下，在主流文化势头强大的冲击下，地方文化在快速地失去自己的个性，甚至逐渐消亡。大一统的学校教育，使孩子们远离传统生活仪式，地方文化传承即将走入绝路。

多元文化是文明发展的基石。现在已经到了挽救中国多元文化发展的最后时机。孩子们是最好的乡土文化传承人，孩子们也应该继承和发展自己的乡土文化，这关系到他们的自信心，关系到他们的创新能力，而课堂是传承乡土文化最有保证的平台。

2005 年，天下溪开始做乡土教材，那一年，我作为一个退休的资深编辑成为这个项目的志愿者，第二年，我们的第一本乡土教材——《我爱拉市海》在云南省丽江地区拉市乡诞生了。十年来，这部教材一直在拉市乡中心学校及其下属的七所学校使用，从此，我也开始了恶补教育理论和理念，学习和研究教育改革的历程，并成为这个项目的主力。

2007 年我们开始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做第二种乡土教材，2008 年，《美丽的湘西我的家》出版。当年，我们在凤凰召开了有 140 人参加的第三届全国乡土教材研讨会。在这些年里，天下溪一直在推广乡土文化教育进课堂的领域里默默前行，如我们机构的名称那样——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但是，我

们知道，在我们的身后，有越来越多的 NGO 伙伴关注并且进入了这个领域，也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加入了乡土文化教育的队伍。我经常接到来自遥远地方的老师打来的电话，和我商讨如何在自己的学校里开设乡土教材课，如何编写他们自己的乡土教材。这些问询有的来自海南，有的来自黑龙江，有的来自内蒙古，有的来自新疆，还有甘肃、湖南、湖北、福建、四川等等不少地方。我们的小溪正在汇聚成河流。这给了我不少力量。

使我常常感到欣慰的还有：在每一个项目地，不管那里有多偏僻，不管那里有多少困难和阻力，总会有一些情种让我遇到，那是些对自己家乡文化满怀深情的情种，听说我是来做乡土教材的，这些情种们便率先激情万丈起来，他们论述的种种必要性和重要性，胜过我的言说。他们才是乡土教材项目的中流砥柱。有了他们，我们的乡土教材项目就可以有长远的计划，未来，肯定会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有更多的地方，开设了乡土文化课，孩子们在关注着他们的家乡，理解并热爱着他们的家乡，这些有根的孩子们会用丰富的本土文化繁荣起他们的家乡。

而且，我们的机构一天下溪一是乡土教材项目最坚强的后盾。乡土教材编写出版之后，还有两个标配的活动——教师培训和夏令营，才能完成乡土教材进课堂的准备。这些活动每次都是天下溪全体成员合力完成的。她们精心准备的培训课程，给教材使用提供了更多可能。我的年轻的同事们操办的项目地的夏令营，为乡土教材的使用起到了先锋连的作用，也给项目地学校留下深刻的印象。2015年，时隔八年我再到拉市海去的时候，当年夏令营的营地美泉小学，还张挂着夏令营的照片，老师们说，那次的夏令营是他们学校生活的美好回忆。



夏令营：展示海报

夏令营：戏剧表演

乡土教材的使用也给项目地的学校和教师带来进步和荣誉。2014 年，我们获悉拉市海的教材已经用光了的消息，在 NGO 伙伴川和公益的帮助下，众筹到一笔经费，重印了 3000 册教材赠送给当地学校，在举行捐赠仪式的时候，我们欣慰地知道了，这部教材获得了云南省教育厅评选的优秀校本教材一等奖。



和拉市海的老师们座谈

湘西教材投入使用后，当地教师积极研发课程方案。如：龙山二小的刘秀娟开发的《走进西兰卡普》获得全省说课比赛第一名；项目骨干教师李开奇老师因为其突出表现被评为湘西州美术学科带头人；吉首民族实验小学陈磊老师被评为吉首市美术学科带头人。

2009年2月，湘西州有4所学校被推荐为“全国语文特色学校”，其中参与乡土教材项目的实验学校占了3所，分别为龙山二小、花垣小学、吉首市实验学校。3月，龙山二小承担了“湘西州科研兴校现场会”主会场，三位教师同上《美丽的湘西我的家》教材上的“湘西童谣”这一课，采用三种不同的教学设计和教法，分别展示了三种不同的风格，让到会的所有领导和教师赞叹不已。

回首十年，我在乡土教材推广的路程上，走过了拉市海，走过了湘西，走过了阿坝的草原和河谷，也攀过岷江边上的高山，我被所有这些地方残存的文化的风采所打动。我坚信我的工作是有意义且必须继续坚持的。我是一个爱好旅行的人，2014年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和一伙队友自驾穿过欧亚大陆，游历了19个国家，我羡慕人家的文化还在生机勃勃，也体验到那里的文化让我们感受到的风情和魅力，也看到那里人们的力量和信心。我深深感到，自己的、独特的文化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在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的集市上，铁匠们、织女们、大厨们的传统作品琳琅满目，吸引着游客，给那里的人们带来了骄傲。那时，我更痛惜，我们的呢？于是，我更加觉得，乡土文化的传承对于我们迫在眉睫，势在必行。让更多地方的乡土文化教育进入课堂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记得在一次稿件讨论会圆满结束后，阿坝州的教育专家嘉央扎西老师兴奋得很，他在微信上把惠特曼的诗歌《啊，船长》的摘句送给了我。那微信上这样写道：航船闯过了每一道难关，我们追求的目标已经达到！啊，船长，快起来，我们的船长！我也很兴奋，但是，我想我不是船长，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我要带着泥土的芬芳，飘洒到每一处乡土，让那里的文化生长，让那里的文明开花，让那里的孩子伴着家乡花草的芳香自信地成长。

给女儿的一封信：我希望你是女权主义者

段玉



女工歌手段玉和她的女儿

亲爱的女儿：

你的妈妈，我，出生在辽宁，是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也是个“80后”妈妈。妈妈小时候家庭不是很富裕，所以也没有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而选择了学费较低的幼师。有时候我觉得读书也在浪费家里的钱，于是没有考虑自己的未来，对未来也没有什么目标。那时候，你的外婆，我的妈妈让我学个幼师，以后当幼师吧，我也就随着这个安排走下去。

毕业后，我阴差阳错的到北京打工，值得的是庆幸我还读了个文凭，可以有些选择权。我渐渐接触到了很多的女工，看见很多女孩子并没有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很多家庭不是认为女孩读书没什么用，就是因为要让家里的男孩读书而辍学。好多女孩都是这样被家庭逼着放弃了学业，到外面打工，供弟弟或哥哥读书。她们的兄弟也认为，姐妹供他们读书是理所当然的，她们只是一个牺牲品。

我希望你未来能得到公平的教育，获得更多学习的机会，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清楚自己要走的路。我也希望我们的教育环境有所改善，本土教育水平有所提升。还有在外面的流动工人子女，能够更容易进入公立学校，而不是被贫困和户籍所拒绝。当然，这些希望也可能会破灭。作为妈妈，我就只能自己去做一些尝试，多一些家庭内学习，而不是完全靠学校。我想发现你的闪光点，给你更多

选择。当你面对选择时，你要知道我永远是你的坚强后盾，无论你做什么，我都希望你是健康的、快乐的。再者，现在助学贷款也有很多，没条件我就寻找各种条件，让你不会因为环境和贫困而牺牲自己。

你知道吗？在成长过程中，妈妈一直被称为“假小子”，也许是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有留过长发，打扮也偏运动风。虽然我常常被这样称呼，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周围的人说多了，见没有什么作用，就放弃继续说我了。所以这个形象就一直伴随着我成长。你外婆是个很爱美的女人，我小时候总看到她和周围阿姨的各种时髦服装，但也许是司空见惯，我并没受到她们的影响，反而一贯都打扮成运动风，直到现在。

后来我长大了，被你外婆说穿着不像女孩，行为举止不是淑女。现在想来，很多妈妈都比较喜欢淑女这个类型的女儿吧，但却忽视了哪个才是女儿自己喜欢的样子。有时候妈妈按照自己的审美打扮孩子，孩子就多了一丝的束缚。我想只要你穿着得不是特别怪异和暴露，我还是要去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的，不能把自己的审美强加于你身上，把你变成我理想当中的孩子。

我想我不会教育你说“女孩子要怎么怎么样”，我会尽量鼓励你，做你喜欢的样子，让你尝试各种体验。男孩子喜欢做的事情，女孩子也可以去尝试，不能说某某事情一定是男孩做就好，女孩就不能做。我想给你尽量多的选择，帮助你分析事物，理解看待不同的东西。

有时候女孩子长大了，不少妈妈爸爸一方面会担心她早恋，但另一方面，如果她超过了 25 岁，妈妈爸爸又要操心她怎么还没有男朋友。在我 27 岁时，你外婆终于开始逼迫我去相亲了，她怕我成为没人要的老姑娘。所以我也艰难地度过了一段被逼婚的状态。你长大了以后我绝对不会逼你结婚。在我的身边，很多女孩子长大了就去结婚生子，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被教育成这样的。除了结婚，其实我们还有更多的选择。世界之辽阔，生活之精彩，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而不用把结婚生子作为终极目标。

你外婆经常举例子说，某某女孩子嫁了、有孩子了很幸福，但我看到，在我身边很多女孩的生活很艰辛，甚至还有被家暴过。人们不说女人被家庭捆绑，却总是在说婚姻多么美好，但也许我是悲观主义者，或我自身也被捆绑不得挣脱，我感觉这一切那是他们设的局。也许他们认为这才是幸福，但幸福的概念不仅在此，女孩子有自己喜欢做的事，可以有爱的人，同时也拥用自己的独立精神。当然，如果你要做独身主义者，我也不会反对。

传统观念中，妈妈都是任劳任怨的：洗衣、做饭、带孩子，在我很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印象。现在我成为了你的妈妈，在家庭中要花更多时候要做家务，带孩

子，时间一长就成为习惯了，做家务就成为女人的专利。导致很多人印象里女人就是擅长做这些事。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认识，我们第一次做妈妈时，都是一样手足无措的，并不是天生就会做。而男人因为产假短，或者因为性别刻板印象，很多时候带孩子成了女人的事情。当然也有些爸爸很能参与到带孩子做家务的队伍中，但却还是少数呢。

我想告诉你，不要做家庭的唯一承担者，要把家务分类，分散到每个家庭成员身上，让每个人都承担家庭责任。当然这是最理想状态，但也可能你未来的老公真的很忙，没有一点时间的话，那就要考虑让他用结算家政工的方式来给自己付款……哈哈，有点异想天开。

当然，我祝愿你有一份自己喜欢做的工作，而不仅仅是做全职妈妈。家庭不是女性的全部，人们的悲惨不是她生活的有多么糟糕，而是她没得选择。传统观念似乎认为，女性一定是跟家庭和孩子捆绑在一起的，这本身就是对女性的束缚。一个女人如果离婚，那么她很可能会被人用有色眼光来看待，但是离婚的男人就不会这样。



段玉在工友中表演

我想告诉你，女人有时候会遇到很多让人不舒服的事情，比如职场对女性年龄的要求，比如你做个售货员他们还来要求你只能是 18 到 24 岁；大部分的女员工都是由男性来领导的；在同级的职位中，有些男同事会让女同事端茶递水、会拿女性开玩笑；很多男人会评论一个女孩的穿着、或者开一些黄色笑话来取乐。遇到这样的事情时，我真想一拳揍过去啊！不过我没有，我还得硬着头皮敷衍着。

女孩子在大街上走着，也有可能碰到骚扰者，你说我们是应该默默忍受还是无力的反抗？有时候，我们把大好的年华献给了社会建设，但是当年纪大了，我们要去哪里，也是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

我希望二十年后，我们能有一个更加平等的环境。我希望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同时我也希望每个女孩、每个人都是女权主义者。你想想，如果二十年后，政府部门有 50%的决策者是女性，每个不同的工作职位有 50%是女性，几乎所有都是男女各占 50%，那该多好啊！女性的自由也是男性的解放，女性解放可以让我们走向一个更平等更自由的世界，你期待吗？

我不想对着你赞美“母亲”这个词，因为有太多的赞美是在赞美牺牲。我也不想对你说“女性伟大”，那“伟大”正是对女性的束缚。我不想你活在牺牲和束缚当中。

我是女孩，我是女儿，我是母亲，我是女性，我不想要赞美，我也不想牺牲，我想自由行走在天地间，可以摘下天上任何一颗星星。

我亲爱的女儿，我祝愿你也拥有独立自由的灵魂，并且活在更加好的世界上。

你的妈妈 段玉

2016 年 5 月 7 日

写于母亲节前夕

给“情怀”找一片土壤

邢雯

刚上大学时，我还是个懵懂的愤青，常以女性主义者自诩，没有理论基础也没有实践经验，空有一腔打破男权社会格局的热血。加入到和平妇女以后，渐渐发现和平妇女并非一个孤立的机构，女性问题也并非一个孤立的问题，有很多散落在乡村的和平妇女或传承、推广传统手工艺，或组织建立合作社，或发展生态农业，她们从不大谈“女性主义”，她们关心的是自家的粮食和蔬菜，是每一个家庭的粮食和蔬菜，甚至后辈人的粮食和蔬菜。我的视角也因此打开，接触到乡村建设、生态农业、自然教育等彼此关联的理念。大三的时候，我去参加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开锄节，有的孩子在学做木制玩具，有的孩子学做染布，他们在田间奔跑，摔倒了，拍拍身上的土又继续疯跑，很快活。而来我家做客的几个10岁左右的小朋友却各自玩着iPad / 电脑，即使是联机游戏，也并不能全然代替现实游戏中孩子们沟通互动的意义。孩子们对大自然的好奇心与生俱来，由于对各种事物都没有具体的概念，诸如“益虫”“害虫” / “脏”“干净”，全凭个人喜好和想象力去感受一虫一草。渐渐地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事业理想——有一个农业与教育结合的小农场。曾经激烈昂扬又有几分盲目的大情怀在一次次实践和学习中找到了一个与之契合的小载体，这小载体也正是情怀的归宿，情怀于此落地生根，枝叶温润繁密、绵绵不绝。

大学毕业之际，我去泰国做汉语教师志愿者，这是我第一次以教师的身份参与到教育实践中。两年的任期让我对教育有了更多认识和感触。

来泰国做老师的第一个月我就体会到了教育“不变中的变”，每个班都有自己的特色，中文水平，兴趣点各不相同，所以授课方式 / 教学进度都要不一样。今年教了一整年幼儿园三年级，感触根深，我在教学日记里清楚地写着第一节课后的感想，

“3/3 3/2 水平较好，来泰国做教师的第一个月我就有了新的认识，每个班都有自己的特色，中文水平、兴趣点各不相同，自然授课方式、教学进度也会不一样。今年做了一整年幼儿园三年级的中文老师感触更深。不仅每个班各有差别，且皆在变化之中，不能急于定论。我在教学日记里清楚地写着



第一节课后的感想，“3/3 班,3/2 班水平较好，3/1 班,3/5 班水平很好，3/4 班水平较差。”我对 3/4 班印象尤其深，前几次上课，教师很安静，大多数小朋友带着一种怀疑又胆怯的眼神观察我这个新老师，他们回答问题时声音很小或者干脆沉默。大概过了一两个月，3/3 班就成为了这五个班中进度最快的，无论是游戏、小组比赛、唱歌跳舞、写字还是画画，他们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积极配合我。甚至很多时候，他们能激发我的灵感，帮助我在课堂上临时想出更有趣有效的教学方法。每次走进他们班，孩子们就兴奋地喊“老师来了”，然后一一过来温柔地拥抱我。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也是一种微妙的人际关系，学生信任了教育者，才会愿意和教育者有进一步的互动。每个班的孩子们期待的老师的样子是不一样的，如果没能找准那把打开学生心门的钥匙，再多努力都是徒劳。3/3 班学生喜欢活泼有趣的老师，我一开始并没有发现这点，这个班越来越骚乱，又有几个极其要强的女生常因我先叫了她们中的任何一个而闹脾气，我一度觉得这个班无药可救。直到有一次我扮手偶戏，孩子们竟鸦雀无声，全神贯注地看着我，我意识到需要调整教学方法，3/3 班学生热衷跳舞，每次上课都问我今天跳舞吗？，回答问题时往往害羞，会了也不愿作答。于是我设计了一些结合歌曲动作教中文的方法，如《十二生肖歌》《春天在哪里》等等，效果很好。学生相信我是个有趣的老师、会让课堂变得生动以后，她们的课堂纪律好多了。每次看到我走进教室都充满期待。然而我也并不是每节课都带着她们蹦蹦跳跳，毕竟拼音还是要学的，练习册也要写，即使是这样有些无趣的课堂，他们也不再抗拒了。尤其是我给他们的练习册打分数以后，他们写得更认真。3/1 班的学生很有创造力，母亲节的时候，我发给每人一张简笔画卡片，上面画着妈妈和小男孩，有小姑娘就跑来问我“老师你是不是喜欢男孩儿”，“我能不能把他画成女孩儿”，我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应该找一张既有男孩儿又有女孩儿的图片，或者干脆让他们自己画。不过很多女孩儿已经改造了小男孩儿的头发，画成了马尾、羊角辫，涂上了黑色、黄色、棕色还扎上了蝴蝶结。然而我始终没能调动起这个班学生的积极性，无论用什么方式讲课，他们都会很快没了兴致，只有几个学生会回应我。3/5 班学生酷爱小组比赛，很多中文词语都是在比赛中学会的。每个个体的学习状态也常在变化，有一位学生第一学期的时候很积极，基本能掌握我教授的知识，第二学期的前两个月，她开始沉默不语，我提的问题也很少能回答上来，再后来又开始了积极，但常常因为听写的时候写错而哭泣，有一次她跑过来对我说“我喜欢中文，可是好难啊，我学不会”。无论是对外汉语老师还是语文老师，都有必要关心学生微妙的情绪波动、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关注他们对身边人与事的态度。

从和平妇女志愿者到汉语教师志愿者，我并没有像自己当初期待的那样，帮助别人、贡献社会。相反，一次次实践活动让我认清了自己。生活不在别处，而在不经意处，而这不经意处里自有天地。

倾听沉默的另一面

——百万和平妇女故事及伙伴征集启事

一、从千名和平妇女到百万和平妇女

2003年瑞士国会议员 Ruth-Gaby Vermot 文高博士发起了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活动，获提名的是来自150多个国家各种背景、各种领域的1000名为和平奋斗贡献的妇女。藉着这项提名，妇女和平建设的工作引起了关注、得到认可、获得支持的运动展开了。虽然，诺贝尔和平奖没有颁给千名和平妇女，但2005年底每一位和平妇女的事迹都被记载下来，通过国际刊物、记录片、环球展览和媒体报道的形式呈现在全球公众面前。2015年，为了纪念和平妇女活动十周年，总部在瑞士的“全球和平妇女联合会”倡议开展寻找并撰写百万和平妇女的计划。

“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活动在中国启动以来，数以百计的高校学者、大学生、作家、记者等社会力量参与支持，出版了书籍《多彩的和平——108名妇女的故事》，纪录片《让世界看见》、《不可能之可能》、《通往大山的路》、《染绿毛乌素》等。全球和平妇女中国办公室举办了多次国际和国内的和平妇女交流研讨会、图片展等活动，组织志愿者们书写和搜集更多平凡而坚韧的女性故事，积累了大量的妇女发展经验与一定的社会资源。在此基础上，我们期望通过发现身边的妇女为和平所做的贡献，推选出更多平凡而伟大的“百万和平妇女”，搜集她们的故事并发布到维基和平妇女网上，以推广和平妇女的理念及各地实践经验。

“百万和平妇女”就在你我的身边——包括我们的祖母、母亲、姊妹，尤其是扎根土地和生活的女性们何以生，何以活，何以在琐碎的日常生活、劳作与梦想追求中磨砺出自己的经验与智慧？倾听妇女内心的声音，发现沉默的另一面；书写妇女的生命故事，也是书写时代变迁的社会生活史！

二、提名和撰写百万和平妇女故事时间表：

2014年9月—2015年6月，计划推广阶段：

1. 拜访各地相关志愿团体、公益机构、妇女组织，建立和平妇女伙伴关系；

2. 推广“百万和平妇女计划”并举办“纪念全球和平妇女十周年”系列活动；
3. 与各团体的工作结合推进，鼓励各团体将已有的妇女案例及故事发掘推荐出来。

2015 年 6 月—2016 年 12 月，实施阶段：

1. 推荐人（自荐人）填写《百万和平妇女提名表格》或整理“妇女事迹+图片”发送：和平妇女办公室 globewomen@163.com；
2. 办公室初步筛选，对符合条件的《百万和平妇女故事》进行跟踪完善；
3. 上传《百万和平妇女故事》中文版到中文网站 <http://www.1000peacewomen-cn.org/> 及维基和平妇女 www.wikipeacewomen.org 中文版；
4. 办公室组织志愿者对《百万和平妇女故事》进行英文翻译校对；
5. 上传《百万和平妇女故事》英文版到维基和平妇女 www.wikipeacewomen.org 英文版。

2017 年 1-6 月，展示阶段：

1. 继续征集故事；
2. 与各团体合作组织生命故事分享会、图片及故事展览等；
3. 分主题编辑妇女故事案例集；
4. 组织百万和平妇女交流研讨会；进行妇女能力建设。

三、提名和撰写百万和平妇女事迹指引

妇女为和平的付出与奉献包括(但并不局限于)以下方面：

- 倡导和维护人权
- 保护老幼病残，保护各种弱势群体
- 消灭各种形式的贫困
- 维持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态环境
- 对抗制度暴力和歧视（包括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族裔歧视、阶级歧视等）
- 建立公平公正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 保证资源为大众所用

- 提倡和平谈判与冲突调解
- 推动健康和教育工作
- 研究危害和平的机制
- 记录战争罪行和践踏人权的行为
- 反对一切武器（特别是小型武器）的扩散

以下为和平妇女的主要标准条件：

- 面对冲突、制度不公和不平等的环境，从事积极、非暴力的行动
- 贡献是持久的、有效的
- 作为楷模，展现出道德勇气和责任感
- 工作具有典范性，是效仿学习的榜样
- 为的是和平事业，非为政治或个人所得
- 行为透明坦荡，宽容忍耐
- 服务的对象兼容并蓄，不分彼此

供参考的和平妇女故事，请访问以下网站：

中文：<http://www.1000peacewomen-cn.org/>

英文：<http://www.1000peacewomen.org>

多种语言：<http://www.wikipeacewomen.org/>

提名表格

- 1、此表格由两部分组成，由被提名人与提名/撰文者共同撰写完成。此表作初步筛选之用；
- 2、若有其他资料，可另附详细故事及照片。

一、百万和平妇女被提名人

注：加粗字体为必填项

姓名		是否健在	
所属国家		籍贯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		电邮地址	
职业/职务		所属机构	
联络电话		现居地址	
是否需匿名			

二、提名/撰文者

注：1、若为自荐，此表不填；2、加粗字体为必填项。

姓名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微博或个人网页链接	
您如何接触到被提名者的工作		她是否知道自己被提名	
她是否同意被提名		是否愿意收到本网站的月报	

注：若填写邮址，我们会给您回复邮件确认，并在需要时联络您，此信息不会被公开。

【提名获接受后，以下文字将在和平妇女网站上发表】

(A) 背景 100 字——重点为基本背景，如面对的社会环境/氛围，从事什么和平工作、时间、所属团体、成果等简单介绍。

(B) 事迹 800-3000 字——生平及事迹介绍，请写成有可读性的完整文章。重点是立体的人物故事，如突出其生命故事、工作情况、动力来源、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对社会或社群的贡献，等等。

(C) 对被提名者的赞词或她本人的警句—— 尽可能引用被提名者说的话或文句(30-50字)

(D) 100-300 字 和平愿景——建议如何推进和平的策略或范例，以下 3 方面供参考：

- 1) 她认为她的活动改变了什么？
- 2) 她如何理解她的活动与和平的关系？
- 3) 她理想中的和平生活是一幅怎样的图景？

(E) 被提名者的工作或生活照片（电子版），与她相关的文章剪报、单张刊物的扫描，视频链接等。PDF 格式或 Word 格式的文章请以附件形式提供。

(F) 被提名者的和平工作属于以下哪几个范畴（10 项中最多选 3 项）：

1. Reconcili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和解与重建
2. Women's rights-human rights 女性权益与人权
3. Struggle for survival: minoritie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少数族裔和原住民的生存奋斗
4. Economic rights and livelihood 经济权益和民生生计
5. Justice and peace 正义与和平
6. Stopping the hidden war against women: women, health and peace 女性健康
7. A thousand ways to educate for a global culture of peace 教育与文化
8. Women's efforts on behalf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环境正义与生态安全
9. A cultural conception of peace 和平的文化理念
10.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政治与管治

主编：刘健芝

执行主编：赵玲

编辑小组：靳培云、欧阳丽娟、邢雯、王大洋、马久菊

美编：靳培云

邮箱：globewomen@163.com wiki.peacewomen@gmail.com wikiwomen@126.com

东亚联络处：香港 新界 屯门 岭南大学 林炳炎楼 112 室

联系电话：+85 26167671、26167672

全球和平妇女中国办公室

© 2017

全球和平妇女中国办公室

PeaceWomen Across the Globe - China Office

总干事：赵玲

电话：+86 170-8836-2597

副总干事：林子敏

电话：+86 132-4195-7873

电邮：globewomen@163.com wiki.peacewomen@gmail.com wikiwomen@126.com

网站：www.1000peacewomen-cn.org

<http://wikipeacewomen.org/wpworg/>

东亚联络处地址：香港新界屯门岭南大学林炳炎楼 112 室

联系电话：+85 26167671、26167672

北京办公室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33 号公寓 6 层 608 室

邮编：100080

微信公众号：和平妇女 peacewomen

新浪微博：和平妇女



微信扫一扫关注该公众号

